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版（季刊）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2018年第3期（总第137期）

主管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编辑出版：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发行单位：本刊编辑部

编辑部电话：029-88493140

电子邮箱：shekexuebao@nwpu.edu.cn

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

邮编：710072

印刷：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陕西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52-187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2447

国内统一刊号：CN 61-1352/C

定价：8.00元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战军 邬大光 刘献君
杨叔子 潘懋元

主 任
万小朋

副 主 任
尹晓煌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社教 万小朋 王海燕
车阿大 尹晓煌 边燕杰
任宗哲 刘第红 李 辉
杨云霞 张 军 张近乐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杨 丹 陆 风 刘 怡
田 锦 王 鹏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年9月

目 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研究分析与述要
/ 余双好 董梅昊 1
- 心理学视野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内涵与特征
/ 姚利民 贺光明 10
- 共享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
/ 罗克全 15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和实践路径
/ 樊明方 门超 21

高等教育研究

- 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现状及其对教学效能感的影响分析
/ 周海涛 郑淑超 28
-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
/ 赖绍聪 39

“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新思潮

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提升路径研究	/ 王辉耀 苗 绿	43
新视野下的“莫须有”故事	/ 李裕民	49
宋代历史述论	/ 周生春	59
“一带一路”视阈下非洲历史文化再认识	/ 刘成富	72

西北联大专栏

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定位西北办学思想与抱负的形成	/ 姚 远	80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合分成败论	/ 余子侠 王海凤	92

法律与经济前沿论坛

新业态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预防对策	/ 刘丹冰 黄菁茹 代水平	101
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风险及法律防控	/ 张 敏 李 倩	108

观点摘编

汲取大学精神力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 张岂之	116
传承优秀教育文化、体现西北联大之魂	/ 傅恒志	118

CONTENTS

Analysis on the Exposi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bout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i>/She Shuanghao Dong Meihao</i>	1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Psychological Vision <i>/Yao Liming He Guangming</i>	10
Sharing Development: Distribution Jus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Luo Kequan</i>	15
Governing Role and Practice Path of Political Building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i>/Fan Mingfang Men Chao</i>	21
The Status quo of Teacher's Work Ability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It's Influence on Teacher Efficacy <i>/Zhou Haitao Zheng Shuchao</i>	28
The Learner: the Principal Part in the Classroom <i>/Lai Shaocong</i>	39
Analysis on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Think Tanks <i>/Wang Huiyao Miao Lv</i>	43
Analysis of "Mo Xu You" or Trumped-up Charge on A New Horizon <i>/Li Yumin</i>	49
On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i>/Zhou Shengchun</i>	59
Re-understanding of Af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by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i>/Liu Chengfu</i>	72
The Formation of Northwest-oriented Mission of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and Its Successors . <i>/Yao Yuan</i>	80
On the Association and Division of National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i>/Yu Zixia Wang Haifeng</i>	92
Influence of New Forms of Business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Suggested Precautions <i>/Liu Danbing Huang Jingru Dai Shuiping</i>	101
Security Risks and Lawfu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 Application <i>/Zhang Min Li Qian</i>	108
Draw Mental Strength from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to Achieve the Great National Rejuvenation <i>/Zhang Qizhi</i>	116
Inherit Excellent Educational Culture and Embody the Soul of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i>/Fu Hengzhi</i>	11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研究分析与述要

余双好 董梅昊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论述是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遵循。自从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以后,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研究日益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并且随着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领域深化,对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总体综合阶段、专题深入阶段以及综合构建阶段,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论述研究也呈现出研究数量急剧增长,研究领域发展不平衡和主题随领域发展等特点,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本身的意义和特点,主要内容和领域,途径和方法等方面,对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论述研究有待于进一步从本体论出发,加深宣传思想工作总体构建和领域深化,提升科学水平,提升理论研究对实践工作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习近平; 宣传思想工作论述; 分析; 评述

中图分类号: D2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3-0001-09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以高度兴趣和极大热情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理论和实践展开研究,特别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党中央治国理政重要论断和重大战略部署开展研究。党的十九大以后,学术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开全方位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也得到高度关注,取得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如果我们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以后,作为全面展开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研究的起点,那么学术界对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总体综合研究阶段,时间范围大致是2012—2014年区间,本阶段学术界关注的

重点主要从总体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阐述,比如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党性与人民性、正面宣传和舆论斗争、总结经验和改革创新、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党动手和部门负责等问题展开,主要从思想内涵和总体特征上领会和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体现的思想观点;第二阶段为专题深入研究阶段,时间范围大致是2015—2017年区间,本阶段伴随着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各个具体领域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分别就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等问题发表系列讲话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的途径、载体和方法研究”,项目编号:12&ZD037;教育部思政司重大委托课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

作者简介: 余双好,男,湖北天门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董梅昊,女,安徽安庆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论述，特别是还针对宣传思想工作专门领域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领域涉及文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党校工作、网络舆论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从2016年开始，学术界对宣传思想工作问题的关注进入到专题研究阶段，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研究论文和著作急速增长，开始从专题角度阐述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基本领域、途径方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管理等问题，涉及各具体领域意识形态建设、新闻舆论工作、党校工作、网络舆论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领域；第三阶段为综合构建阶段，本阶段时间范围从2017年开始至今，主要以党的十九大召开为新起点，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党的十九大以后，特别是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发表讲话，全面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深刻巨大变迁，充分揭示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应遵循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指明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对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

是新时代推进宣传思想工作强起来的又一次大动员。学术界对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研究又形成新的热潮，并进一步开始以独立的形态对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发展过程、基本内涵、理论观点、基本内容以及途径和方法等问题进行系统探讨，探讨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内在关系，并且形成更具系统性的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观点。

一、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研究分析

课题组以“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或“意识形态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网络舆论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外宣传工作”为主题词，以2013年为起点，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进行主题精确匹配检索，截至2018年8月，共得到相关文献2677篇。研究文献类型与研究涉及领域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文献的来源及数量

来源 \ 数量	宣传思想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	新闻舆论工作	网络舆论工作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对外宣传工作
期刊	280	293	572	70	526	99
博士论文	3	1				
优秀硕士论文	5	30	13		21	4
报纸理论文章	301	73	179	109	73	25

从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文献的总体情况来看，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及相关领域研究呈现出以下发展特点和趋势。

第一，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研究随年度发展呈现出增长趋势。

如图1所示，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研究自2013年以来呈现出总体递增的发展趋势，虽然2015年最低，仅有169篇相关文献，但2016年跃升至767篇，2017年上升至890篇。可以预知，2018年及以后的全年文献研究也会呈现增长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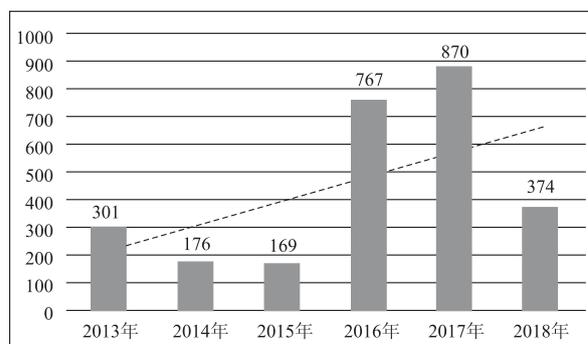


图1 研究的年趋势变化

第二,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的相关领域研究并不平衡。

如表1所示,在文献的类型中,期刊类和报纸类文献研究居多,而硕博士论文数量相对比较少;从具体研究领域来看,关于新闻舆论工作(764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620篇)和宣传思想工作(589篇)研究较多,而关于意识形态工作(397篇)、网络舆论工作(179篇)和对外宣传工作(128篇)的文献相对较少,存在着研究领域的不平衡性。

进一步分析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各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其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特点(如表2),它与当年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领域重点存在着密切关系,比如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研究,2013年研究论文数量最多,以后2014、2015年呈递减趋势,但到2016、2017年以后,又进入到新的增长阶段;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研究,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以后,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7年进入峰值;关于高校思

表2 各领域研究的年趋势变化

年份 \ 数量	宣传思想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	新闻舆论工作	网络舆论工作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对外宣传工作
2013年	203	42	26	8	9	13
2014年	85	33	10	13	17	18
2015年	41	32	22	12	46	16
2016年	122	67	419	71	54	34
2017年	92	152	201	54	364	27
2018年	46	71	86	21	130	20

想政治工作研究,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以后,很快在2017年达到峰值;关于网络舆论研究和对外宣传研究,也呈现出与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密切关系。

第三,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各领域研究主题内容呈现不同特征。

如表3所示,课题组将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研究具体主题分为基础理论研究(本质、特点、原则、意义、作用等),内容研究(基本架构、队伍建设、制度等)以及途径研究。从研究主题的特点来看,在主题研究中,关于宣传思想工作途径(含路径、方法等)研究的最多,共1298篇;其次为基

础理论研究,共861篇;再次为内容研究,共518篇。从各具体领域研究主题来看,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基础理论,其他各领域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途径研究。各个领域对内容研究得都比较少。

第四,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研究主题呈现变化特点。

如图2所示,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研究主题的年份呈现变化趋势,各主题研究均随时间变化都有一个递增趋势,其中途径和方法研究增长率先到达峰值(2016年435篇),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内容研究也在增长,表现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态势。

表3 研究主题的领域分布

研究主题 \ 数量	宣传思想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	新闻舆论工作	网络舆论工作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对外宣传工作
基础理论研究	207	156	176	61	218	43
内容研究	121	99	125	18	119	36
途径研究	261	142	463	100	283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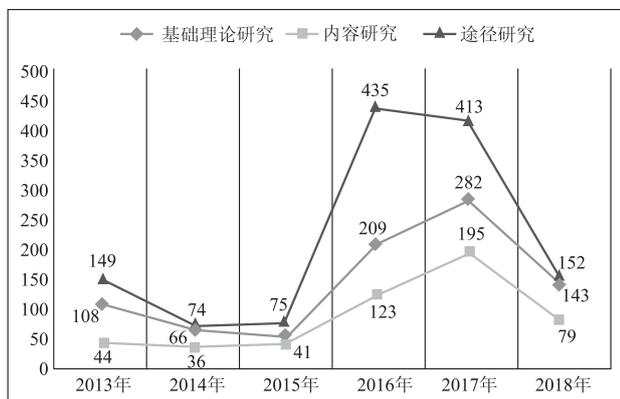


图2 研究主题的年变化趋势

二、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研究述要

从上述文献计量分析情况来看,对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主要涉及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意义和特点、基本领域和内容、基本途径和方法等方面。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 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总体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事关宣传思想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遵循。讲话统揽全局、思想深刻、蕴含着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是一篇纲领性文献^[18]。这是新形势下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指南,对于提高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225}。“它开启了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新时代,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论新战略的明确信号,宣告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发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打好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攻坚战号令,是一份向宣传思想工作发出了打好意识形态主动战的动员令,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2]。”

有研究者从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演变过程,总结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观点的形成发展过程,认为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观点形成有一个从萌芽到全面勾勒,到路径拓展,再到具体领域深化的过程。如果说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中的讲话,是习近平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起点。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习近平对党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阐述。如果说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等论述,是新形势下宣传思想的思想内容的深化与内涵的拓展。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党外统一战线、党校、新闻舆论工作、互联网、哲学社会科学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则是宣传思想工作观点在各领域的具体化和深化^[3]。

有研究者对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特点进行分析,认为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主要特点是整体性,是价值整体性、理论整体性和策略整体性有机统一的思想体系,应从整体性原则和“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层结构进行考量^[4]。还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论述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智慧,体现着物质和精神的辩证法,党性和人民性的辩证法,时、度、效的辩证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辩证法^[5]。也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论述的关键特点是政治引领性。如发挥政党交往优势,突出中国制度“正能量”,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立足“中国价值观”引领国外舆情民意等方面^[6]。还有不少研究者认为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突出特征是“问题意识”,是问题倒逼而“破”与顺势而“立”的问题意识^[7]。是一种对问题的“忧患意识”^[8]。

也有不少研究者关注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讲话、论述体现的艺术性,认为习近平的论述注重细节、善讲故事,崇尚简洁、倡导新风;善用俗语、朴实无华,巧用典故、彰显厚重,区分对象、讲求效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9]。也有研究者把它

归纳为在“讲”一种注重“群众风格”的语言^[10]。

(二) 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基本领域和内容的探讨

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领域的论述的展开,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各领域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具体,从总体上来看,这些领域论述主要围绕新闻舆论工作、网络舆论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外宣传工作等。

关于新闻舆论工作论述,研究者们主要探讨了“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观”的基本内容。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新闻舆论观可以概括为时代论、人民论、社会主要矛盾论、依法依规论、全人类襟怀论^[11]。还有研究者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地位、职责使命、根本原则、重点任务、基本要求、队伍建设等方面,来概括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内涵^[12]。也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观基本内容是:对新闻及新闻事实的认识,对“新闻学”与“政治”的关系及新闻学科的认识,对新闻观及新闻教育的认识^[13]。

关于网络舆论工作论述,研究者们主要探讨了习近平网络舆论观的思想来源、现实背景、根本目标、方法途径等基本内容。大家普遍认为,习近平网络舆论观的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观、统一战线理论、群众路线理论,它产生的现实背景包括舆论主体上的话语权争夺、舆论内容上的“红”“灰”“黑”较量、舆论心态上的负情绪传染和舆论载体上的社会化动员^[14]。其根本目标是牢牢把握“两个巩固”根本方向不动摇。基本要求是紧紧抓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战略任务不放松。群众路线原则是切实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价值诉求相统一。方针政策是积极推动“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理念不松懈^[15]。具体来看,主要包括地位意义、目标任务、原则方针、重点关键、方法途径、阵地平台、责任使命、人才队伍、技术支撑、保障机制等多方面内容^[16]。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论述,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蕴含着丰富科学的理论内涵,体现了深邃广博

的思想精髓,深刻揭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为新形势下高校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重要指向,提出了更高的战略定位,提供了基本遵循”^[17]。有学者提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四服务”和“三培养”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中心环节”和“立身之本”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遵循;“三势”和“三因”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教师队伍建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加强党的领导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18]。还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具有丰富哲学蕴含,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体现深邃的矛盾观,厘清了矛盾的主从。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蕴含浓厚的人本观,彰显人文情怀。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折射自觉的发展观,重视事物的发展性。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应形成协同效应,展现辩证的系统观,注重多要素的合力推进^[19]。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指明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破解短板问题的正确路径,标示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履行育人育才职责的科学方法,规定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肩负办学治校使命的原则遵循^[20]。陈立思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深刻论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系;坚持和怎样坚持党对高等教育及高校的领导的问题,以及如何做好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21]。特别是余双好提出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紧迫任务^[22]。程奎,严蔚刚认为,只有强化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引领青年学生自信而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23]。

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论述,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对外宣传工作观内容丰富,包括治理理念引领论,价值观念传播论,文明交流互鉴论,形

象塑造展示论，传播能力建设论，讲好中国故事论^[24]。有研究者把它总结为“中国特色论”，包括宣传阐释中国特色、中国形象、中国梦、中国价值观念、中国现行的方针政策等^[25]。也有研究者归纳为“国家形象论”，以图示的方式解释对外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以争取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并努力在传播中寻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多元共识，并促进文化和文明的交流^[26]。

（三）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途径和方法的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从全局上和重点领域对宣传思想工作内容和任务提出明确要求，而且充分阐述宣传思想工作途径和方法，有研究者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宣传思想工作途径和方法的总体特征是多元并举，“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要通过榜样教育，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方式，各种规章制度、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仪式活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家风民风，政策导向，法治建设，社会管理等各种各样方式的综合运用。总之，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27]。

在宣传思想工作途径研究中，研究者涉及到的途径主要包括：一是思想引领途径，如有研究者认为宣传思想工作主要途径在于提高思想认识，厘清模糊认识，通过坚持党媒姓党，服务人民需求，把握正确导向，传播优秀文化，推进媒体融合，做强舆论阵地等原则做好宣传思想工作^[28]。有研究者提出，思想引领要善于议题设置，议题设置是对外宣传的核心和关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努力把握大势，把握规律，把握时、度、效，着力提高议题设置能力，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也传不开”的问题，理直气壮、全面准确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不断增强外宣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实现外宣工作新突破^[29]。

二是网络建设途径，如有研究者提出利用技术思维更新实践工作。借鉴用户至上的价值追求，创新宣传思想工作理念。借鉴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

互联技术，创新宣传思想工作手段。借鉴互动分享的实现途径，创新基层宣传思想工作^[30]。有研究者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对信息化潮流，只有积极抢占制高点，才能赢得发展先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要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建立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31]。

三是舆论引导途径，如有研究者提出舆论导向的内核是价值导向，舆论导向最终指向人们的价值观。新闻媒体要肩负起习近平所说的“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职责和使命，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殿堂^[32]。还有研究者根据多年一线工作经验提出必须牢牢做到四个坚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确新闻志向，坚持正确工作取向，不断创新传播方式，推出新闻精品，努力形成与党中央治国理政相适应的新闻品格和新闻力量^[33]。

四是话语更新途径，如有学者认为坚持群众为本，说有“魂”的话，创新宣传思想工作话语理念，根植群众实践，说有“根”的话，丰富宣传思想工作话语内容，汲取群众智慧，说有“趣”的话，优化宣传思想工作话语形式，增进群众交往，说有“情”的话，重构宣传思想工作话语语境^[34]。还有研究者提出牢牢掌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不让“马克思主义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关键在于加强思想政治话语主体建设。因此，筑牢话语主体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根基、增强话语主体的中国特色话语内容、完善话语主体可亲可信的话语形象、构建话语主体持续发力的话语平台是牢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四个关键^[35]。有研究者总结习近平话语引导特点，提出以讲述好中国故事作为对外传播的新起点，以传播好中国发展主旋律作为对外传播的新方式，以乐于接受的方式、易理解的语言作为对外传播的新要求，以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纽带为对外传播的新目标^[36]。还有研究者提出要首先以“中国梦”为旗帜，强调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的相通性，其次以提高“道义感召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取向，讲述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崛起的故事，再次以“国际视角”为主要特色，摒弃传统单向灌

输思维, 找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最后要以“全球一体化传播”为依托, 发挥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的联动效应^[37]。

五是基层工作途径, 如有研究者认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做宣传思想工作要与时俱进, 实现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 “要树立大宣传 work 理念, 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 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38]。还有研究者提出变“喊话”为“对话”, 变“被动”为“主动”, 变“压服”为“诚服”^[39]。有研究者针对基层工作创新, 认为宣传工作创新的一个重要关键点是春风化雨, 润物细无声, 未雨绸缪, 洞察秋毫, 加强预见性, 加强谋划, 把工作做在前面并做深做细, 是能够做到春风化雨的前提^[40]。

六是综合育人路径, 如有研究者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意识形态自身发展规律、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框架或方法论是“挑战—回应”模式: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 抓住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和危机; 二是针对挑战, 建构解决问题的回应机制, 从解释权、引导力、策略等三个方面探寻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路径,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41]。还有学者提出, 开展理论武装活动有助于人们对理论的认同, 但不同途径对提升理论认同的效果有明显的差异, 不同的途径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作用也有明显差异。因此在继续发挥原有途径积极作用的同时, 积极拓展实践途径、理论创新途径、间接途径、隐性途径、自主途径、对外宣传途径等, 实现理论武装深入人心路径的创新发展^[42]。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拓展学科领域、丰富学科内涵、增强学科特色、提升学科水平, 更好地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43]。

三、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研究走向

从总体上看, 党的十八大以来,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以后, 学术界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要看到, 由于本课题的研究时间依然

不长, 由于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实践依然处在不断的展开和深化之中, 由于一些重大的理论论断、思想观点依然需要不断的深化认识并廓清其理论和实践价值, 因此, 关于本课题的研究依然有很大的探讨和发展空间。

一是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整体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当前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研究较多关注宣传思想工作涉及的具体理论问题和涉及的具体领域工作,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较多涉及宣传思想工作的问题, 但目前还比较缺乏以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为主题的总体性研究。课题组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宣传思想工作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加强宣传思想工作采取了系列举措, 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论体系, 尽管这个思想理论体系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但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迫切需要从整体上把握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 探讨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关系, 探讨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工作思想、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思想的关系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 探讨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 以指导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实践。从这个意义上, 从整体上研究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是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主要领域依然需要深化和拓展。尽管学术界对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所涉及的相关领域已经有一些研究, 但从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各领域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 从目前情况来看, 无论是宣传思想工作所涉及的内容, 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培育, 还是宣传思想工作所涉及具体领域如意识形态建设、新闻舆论引导、网络舆论引导、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外宣传等, 都有进一步加强研究, 深化拓展的巨大空间。

三是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本身的研究质量和水平需要提升。由于本课题的研究还处于

起步阶段，还比较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从研究文献中存在的问题来看，目前的研究偏重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实务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内容研究较少，而基础理论研究中本质内涵研究和历史梳理较少，基本内容研究则显得较为零散，途径研究中“理论建构”过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有效途径研究较少；在具体领域研究中缺少整合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意识，存在一定程度重复低效现象；从研究思路和方法来看，本课题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视角较少，传统研究方法仍是主流，缺乏现代研究方法意识，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较少，文献研究也相对薄弱。这些都表明当前研究存在着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四是关于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实践研究需要跟进。研究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并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研究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落脚点和归宿是指导宣传思想工作实践。目前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宣传阐释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阶段，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在宣传思想工作部门落实情况如何，人们对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认识和评价如何，以及如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出推进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路径和方法，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十分有限，这给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十分巨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指导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纲领性文献[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
- [2] 余双好. 打好宣传思想工作主动战的动员令[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4）.
- [3] 余双好. 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思想形成过程探析[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5）：74-78.
- [4] 刘希刚，王永贵. 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整体性探析[J]. 江苏社会科学，2018（1）：9-17.
- [5] 韩华. 习近平论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法[J]. 思想教育研究，2017（11）：15-18.
- [6] 柴尚金. 新形势下党的对外工作“政治引领”的特色与优势[J]. 当代世界，2017（4）：12-15.
- [7] 李宗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新思想[J]. 社会主义研究，2016（2）：35-42.
- [8] 丁柏铨.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特色浅探[J]. 新闻与写作，2015（11）：43-49.
- [9] 郑保卫，王亚莘. 试论习近平的宣传艺术与传播技巧[J]. 新闻爱好者，2015（12）：10-14.
- [10] [34]张智，刘建军. 习近平的群众风格语言及其对宣传思想工作话语的启示[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3）：57-62.
- [11] 丁柏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作用[J]. 新闻与写作，2017（12）：49-54.
- [12] 王先俊，吴杰. 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J]. 毛泽东研究，2016（5）：104-113.
- [13] 叶俊，赵云泽. 习近平对于“新闻学”及“新闻学科”的重要阐述[J]. 编辑之友，2018（4）：54-57.
- [14] 罗昕. 习近平网络舆论观的思想来源、现实逻辑和贯彻路径[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7）：22-33，130-131.
- [15] 王永贵，岳爱武. 着力打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的重要论述[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1-8.
- [16] 田海舰. 习近平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研究[J]. 社会科学家，2017（10）：18-22.
- [17] 冯刚. 习近平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述的理论蕴涵[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70-180.
- [18] 顾海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境界[J]. 中国高等教育，2017（18）：4-7.
- [19] 张鹏程.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哲学意蕴[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16）：9-12.
- [20] 黄蓉生.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三因”要求论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10）：135-141.
- [21] 陈立思. 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3）：8-16.
- [22] 余双好. 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求索，2017（10）：37-45.
- [23] 程奎，严蔚刚. 习近平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探析[J]. 现代教育管理，2018（2）：6-9.
- [24] 文武英. 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国际传播战略——学习习近平对外宣传思想的体会[J]. 党建，2017（10）：39-40.

- [25] 武志军.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关于做好对外宣传工作的新思想新论断[J]. 党的文献, 2017(5): 28-33.
- [26] 孟建, 于嵩昕. 政治传播视野中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5(9): 75-76.
- [27] 余双好, 于欧. 新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风向标[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7(8): 13-16.
- [28] 刘斌. 厘清模糊认识, 坚定职责使命[J]. 青年记者, 2016(9): 20-21.
- [29] 崔玉英. 增强议题设置能力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J]. 求是, 2014(23): 4-5.
- [30] 曹峰. 借鉴互联网思维 创新宣传思想工作[J]. 红旗文稿, 2016(1): 37-38.
- [31] 刘亚琼. 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方略研究[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7(7): 106-108.
- [32] 陈伟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舆论导向[J]. 中国出版, 2016(7): 17-20.
- [33] 张玉. 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提升党报引导力[J]. 青年记者, 2017(30): 62-63.
- [35] 李丽, 李艳. 牢牢掌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J]. 思想教育研究, 2017(12): 65-69.
- [36] 张树军, 贾亮. 在当地主流媒体刊发署名文章: 彰显对外传播新理念新方法——习近平主席海外署名文章特色解读[J]. 中国记者, 2017(12): 53-58.
- [37] 刘滢. “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目标、实现基础和实施路径[J]. 中国记者, 2016(8): 42-44.
- [38] 严书翰. 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深入学习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的要点[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3(10): 38-43.
- [39] 冉龙江. 基层宣传要在三“变”上求突破[J]. 党建, 2013(12): 70.
- [40] 王连弟.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谈如何做好新时期宣传工作[J]. 中国出版, 2014(17): 29-32.
- [41] 唐爱军.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论[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4(6): 32-34.
- [42] 余双好.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路径选择[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18(1): 124-133.
- [43] 余双好.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价值指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17(1): 131-145.

Analysis on the Exposi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bout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She Shuanghao Dong Meihao

Abstract: The exposi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bout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is a guiding document and basic compliance for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Since general secretary Xi gave an important speech on 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on 19, August, 2013, research on the exposition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hot spot in the field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witnessed a systematic exploration through three stages, that is, overall integration, subject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However, those researches are characterized by sharp growth, imbalance in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excessive focus put on the meaning, feature, main content, field, path and method as well as field-oriented themes. The exposi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bout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awaits an analysis which starts from ontology to deepen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es in certain fields, and to enhance scientific level as well as the guiding role of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s practice.

Key words: Xi Jinping; Exposition about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 Analysis; Comment

心理学视野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内涵与特征

姚利民 贺光明

摘要: 心理学视野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是指: 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 按照不同教育阶段大学生的身心特点, 根据社会发展要求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科学构建各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適切与灵活选用教育方式方法, 充分挖掘大学生的积极人格特征, 满足学生多样化需要, 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其特征包括: 合规律性、民主平等性、情感互动性、自我内化性。

关键词: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心理学视野; 内涵; 特征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3-0010-05

对于教学有效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较多学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有学者认为, 有效教学是有效果、有效益、有效率的^[1]; 王孟芹认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是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产生效力和效用的特征, 亦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正向结果的效能属性^[2]; 张海洋认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包括大学生对教育者所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大学生思想政治意识内化过程的顺利完成、大学生思想品德意识转化为行动等三个层面^[3]。显然, 以上论述从不同视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界定具有不同的学理依据, 对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教育有效性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加强及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满足已有研究成果的借鉴与运用, 显然是不够的。因而, 从心理学视角论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内涵与特征, 是准确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力的逻辑起点。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内涵

心理学视野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内涵应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设立、教育内容的构建、教育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进行考量。

(一) 教育目标设立: 由成为社会公民转向成为社会公民与全面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显示, 思想政治教育并非人类诞生伊始就存在, 而是伴随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阶级和国家出现后, 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宣扬其政治观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 以达到巩固和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即使是起源于西方的公民教育, 主要致力于理想公民的养成, 但其最终的目的也在于通过对公民的教育和训导来促进政治共同体的持存和进一步发展。如美国的“美国公民”“合格公民”“民主公民”“好公民”等, 尽管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表述上不尽相同, 但实质都是强调学生具有美国的“国民精神”^[4]。从表面看, 美国所倡导的公民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焦点集中体现在道德规范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发展研究”, 项目编号: BIA120069。

作者简介: 姚利民, 男, 湖南安乡人, 教育学博士, 湖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有效教学研究; 贺光明, 男, 湖南耒阳人, 湖南大学博士生, 长沙医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副教授。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高校组织管理心理研究。

和行为准则上,但其实质是以隐蔽的方式体现其政治诉求,进而更好地维护和巩固其阶级利益和政治统治。

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先后经历了把教育对象培养成适应斗争需要的革命者、适应国家需要的建设者及适应社会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的变化^[5]。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要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这些理论、论断和成果推动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在注重“培养社会合格公民”,坚持社会目标为主导的同时,更致力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转变也蕴含着深刻的心理学理论。积极心理学作为20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一场心理学运动,以积极的情绪、积极的人格特征和幸福为对象,倡导人类要用积极心理学原理来对人的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作出新的解读,将工作重心置于培养人固有的积极潜力上,通过培养或激发每个人自身固有的某些实际或潜在的积极品质和积极力量,使人真正成为一个人健康并生活幸福的人^[6]。新时代大学生的“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亟待高校不断满足学生的需要,充分挖掘学生的积极潜能,培养学生积极的情绪体验和人格,提升学生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因而,有效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应让学生在充满希望、追求幸福、获得快乐的基础上促进其成为社会公民与获得全面发展。

(二)教育内容构建:由注重社会需要转向重视身心发展、个体需求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设计与构建,不是随心所欲的,首先必须与社会要求相符合。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

内容围绕“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目标,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核心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转变与调整,积极地服务和服从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等主张,与之相应,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相应充实与调整,积极融入“科学发展观教育”“和谐社会教育”“生态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国梦教育”等。

尽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一直处于充实、调整与变化之中,在各个时期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无论怎样变化,总与我党和国家每一时期主要任务的变化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始终以服务、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为重点^[7]。但是根据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出现了新变化,即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同时,还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这显然蕴含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仅要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需要,也要重视学生身心发展、满足学生需求。习近平同志也多次指出: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提高受教育者的心理健康素质,使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健康的情感、乐观的心态、坚强的意志等”。

至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从注重社会需要逐渐转向既注重社会需要又强调学生个人身心的全面发展和心理健康等内容。这一转变有重要的心理学理论依据。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包括基本需要和成长需要两大类,其中基本需要包括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的需要;而成长需要指个体自身的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趋向所激励的需要,它是在低层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出现的

高层次心理需要,也称为超越性需要,包括认知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8]。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载体,其应有的逻辑在于将社会发展的各种外化要求内化为学生的各种需要,推动学生基本需要的满足向成长需要的满足迈进,引导学生认知世界、理解世界,滋润人生、陶冶情操、丰富生活、增加乐趣,使完满人性得以实现、各种潜能得到发挥、人的个性得以张扬。因而,只有既注重社会需要又重视学生身心发展个体需求的教育内容才是最有效的。这也就是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效性的内容应由注重社会需要转向重视身心发展、个体需求。

(三)教育方法选用:由注重灌输说教转向适切、灵活

作为联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两者之间桥梁和纽带、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是由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决定的,唯有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目标、内容等相适应,才能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力。换句话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适切性、灵活性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力的决定因素之一。

综观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轨迹,灌输说教教育方法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不可否认,灌输说教在向受教育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受教育者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衍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弊端,如:过分重视理论灌输,忽视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过分注重整齐划一,忽视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和同一层次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过分注重教育者的“言传”,忽视“身教”等,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力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

随着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的变化,教育方法选用的适切性、灵活性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心理学认为,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学生在认知、个性、适应性、政治思想与品德、学习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智力水平、

认知灵活性、创新性、能力、性格、气质、兴趣、政治思想水平、品德水平、学习基础、学习动机、学习愿望、学习需要与学习风格等方面^[9]。个体客观存在的差异性既为因材施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选用适切性、灵活性的方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也就是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提高其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力、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必须基于具体的教育内容、特定的教育对象、实际的教育情景、不同教育对象不同的认知、个性、适应性、政治思想与品德、学习状况,采用适切、灵活的教育方法,有效引导学生充分认可、主动参与、积极进行情感体验,避免学生对教育方法的抵触、厌恶,提高教育方法的接受性、感染力与满意度,让教育方法受到学生的欣赏和喜欢,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转变既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展现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研究和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出了新课题和探索的方向。借鉴、充实和融合心理学相关理论理应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应然态势。因而,心理学视野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是指: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按照不同教育阶段大学生的身心特点,根据社会发展要求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科学构建各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适切与灵活选用教育方式方法,充分挖掘大学生的积极人格特征,满足学生多样化需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特征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人的活动,其关键在有效性。心理学视野下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研究与实践乃是基于心理学理论并在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研究与实践,心理学理论为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和基本遵循。笔者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特征可以概

括为:教育目标的合规律性、教育主客体的民主平等性、教育实施过程的互动性、教育结果的内化性。

(一) 合规律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人、培养人、塑造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的教育实践,同时也是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的教育实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规律性意味着其教育目标的设定、教育内容的设计与构建、教育方式方法的选择等要依据并遵循规律。除了要依据并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依据并遵循人的心理规律、大学生的差异性、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保证教育目标的正确性、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与针对性、教育方式方法的适切性与灵活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合规律性还意味着,要依据大学生思想品德心理结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原理,注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顺序和侧重点,首先要把社会要求的政治立场、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与准则通过科学合理的内容与适切灵活的方式方法教给学生,使大学生形成道德认识,并激发大学生的道德情感,使大学生通过自我体验、自我学习内化这些社会要求,锻炼道德意志,再外化为大学生的道德行为,达到有效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意识和提升大学生品德水平的目的。

(二) 民主平等性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较多的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主体性、主体间性的概念、本质、内涵、学理依据等涉及较多,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指导。如苏令银从主体间性视野出发,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平等的关系,他们共存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10]。笔者认同他的观点,同时,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学生观认为^[11],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特征之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平等性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把受教育者——大学生作为与自己平等的生命个体存在,关注大学生个体的情感需求和生命体验,充分尊重大学生的独立人格和价值尊严,并把这种情感需求、生命价值、独立人格和价值尊严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相融合,调动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积极性,促使他们配

合、参与、投入,发挥他们自主的、主动的教育作用,而不要把他们简单视为被动的教育客体、灌输说教的对象,让他们通过接受教育、主动思考、自我教育、体验与锻炼,形成正确的思想政治意识,提升思想品德水平,实现全面发展。

(三) 情感互动性

作为教育活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教育者与大学生双向互动基础上的交往活动。心理学认为,情绪情感和认知相辅相成,在认知基础上产生情绪情感,情绪情感又对认知产生影响,因为认知是在一定的情绪情感背景下进行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活动,是建立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情感基础上的活动。俗话说,爱其师,信其道,乐其教。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特征之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情感互动性意味着,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大学生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道德知识、品德知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授受时,情绪情感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注重建立融洽、和谐、信任的人际关系,唤起大学生的情感共鸣,显示对大学生的理解、关心、爱护、支持、欣赏、鼓励,与大学生进行有关意义、情感、价值观的分享与交换,实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用心灵感动心灵,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相互认同、共同提高的目的,使大学生真切感受到教育者是可亲的,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自己和有针对性的,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适切的、灵活的、有感染力的,其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是入脑入心的、有效的。

(四) 自我内化性

心理学的知、情、行原理告诉我们,三者既紧密相关,又有差异,相互协调与统一是最高境界。同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把外在的思想意识、道德认识与观念、行为规范内化为大学生内在的思想情感品德再外化为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化起着基础和关键性的作用。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就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目的,其有效性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立论基础和实践土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特征之一的自我内化性意味着,大学生在教育者和其他社会教育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通过自身的积极主动参与,不断将社会要求的政治观点、思想体系、道德规范转化为自己的个体意识,自觉认同、接受和遵守社会的思想政治、道德要求,并自愿将这些外在要求作为自己的价值准则与行为依据。自我内化性还意味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和合作,遵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规律和内化逻辑进程,提高大学生的内化能力,优化内化模式,以情感互动为中介,以培养大学生需要的氛围、激发需要的动力、规范需要的方向为重点,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生理内驱力和心理内驱力,最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入心”“践行”“体验”和“成体”^[12]。

综上所述,本文就心理学视野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心理学视野下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还需要探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现状、问题及提升策略,关于此,笔者将另文论说。

参考文献

[1]姚利民.有效教学涵义初探[J].现代大学教育,2004

(5):10-13.

[2]王孟芹.系统论视野中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D].北京:中国石油大学,2010.

[3]张海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1.

[4]赵义良,金蓉.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界定与辨析.思想教育研究[J].2017(11):29-33.

[5]邱吉,梅雪.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历史考察[J].教学与研究,2014(5):90-97.

[6]任俊.积极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8.

[7]上官苗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系统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7.

[8]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120-122.

[9]黄正夫.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10]苏令银.主体间性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11]陈琦,张建伟.建构主义学习观要义评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1):61-68.

[12]王荣发.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机理和内化逻辑[C].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丛(第三辑),2013(10):198-200.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Psychological Vision

Yao Limin He Guangming

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psychological vision means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make a scientific arrangement of content in each stag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well as a proper and flexible choice of educational methods in a bid to explore th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maximally, meet the students' all kinds of needs and promote the student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moral character, th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ducation,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total goal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Regularity, Democratic equality,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Self internalization.

Key word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Psychological Vision; The Connot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共享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

罗克全

摘要：“共享发展”要求在公平正义的社会合作体系中，保证社会发展的质量。“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观，是“劳动—所得”，即“按劳分配”的正当性和社会合作“道德应得”的善的结合。同时，它还体现和践行着中华“和”文化本质特性。“共享发展”是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不同时期分配原则总结与反思的结果：从“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目的，到“共享”作为发展的前提。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共享发展”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的跨越，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动力之源。体现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强决心。

关键词：共享发展；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新时代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3-0015-06

“共享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五大”发展理念最关键，甚至可以说是最核心的内容。因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的目的与根本归宿就是“共享”。“共享”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正义分配的基本要求、国家政治认同的拱心石，是社会互利合作、诚信友善的力量之源。“共享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义分配原则。“共享发展”的主要内容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①。这种分配正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达。

同时，“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分配原则历史发展的自然延伸，更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社会正义原则。它解决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公平中求效率，使发展有质量——既具有道德上的“正当”同时具备效果上的“善”，因而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正义。中国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其中，我们所经历的分配原则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再分配强调公平”“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要强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到今天中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共享发展”作为我们的分配正义原则。

“共享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的根本要求，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分配原则的总结，更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新时期面对新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与实践回应。

一、“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的中国化表达

“共享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原则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享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溯源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6YJA710016。

作者简介：罗克全，男，湖北蕲春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相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与实践。它首先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配原则——“劳动—所得”（即“按劳分配”的正当原则）和社会合作“道德应得”的善的原则，即“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如果社会的主体制度不是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有，那么“劳动—所得”即“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前提就不能成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他的劳动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就成为财富的源泉”^②。

另一方面，“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阶级剥削所提出的分配原则：资本家的财产源自于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只是由于资本家占有资本，有权力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使预付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而工人的劳动力是唯一创造资本主义财富的源泉，这是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区别（例如，亚当·斯密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是社会财富的来源^③）。这就是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非人性化制度中，马克思对未来正义社会的分配基本要求是“按劳分配”。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强调的那样，“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们劳动的机会。”^④也就是说，劳动所得的社会产品不能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从马克思主义的正义分配原则中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论证：社会中每个人的资质和机遇并不相同，如果仅仅从“劳动—所得”原则去理解、去分配社会产品，那么有可能就会陷入把社会产品当作个人权力而导致人的异化。所以，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还有一些前提条件，诸如，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⑤。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还指出，一切劳动都是社会合作的结果，只有通过社会合作，劳动才能成为社会财富^⑥。

与马克思主义正义的分配原则相一致，“按劳分配”是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先决条件，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效率之所在。然而，所有的个人都是因为参与到社会合作体系之中，他的个人能力

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社会合作和社会稳定是实现个人潜能、发挥个人能力的基础与前提。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我们仅仅把“劳动—所得”作为我们的唯一的分配原则，漠视社会合作体系的基础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前提，就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出现。其结果是财产通过私人占有成为统治社会或他人的权力，如果任其发酵，必然会产生“物对人的异化”和社会合作体系的崩溃。在我国，这种异化现象（尽管其原因并不能从根本上归结为“按劳分配”）和社会不合作已经成为我们发展中的障碍，阻挠和干扰着社会稳定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

“共享发展”理念针对的和要求避免的就是贫富差距的出现，同时注重社会合作的道德要求。因此，它又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应得”分配原则的中国实践——“共享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原则新的时代表达。

那么，如何理解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所得”和“道德应得”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的分配原则呢？首先，它是由人的“类本质”特性所决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作为“类本质”而存在的，即“自由人联合体”。人类的正义追求决不是建立在个人发展使其他人受损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相互冷淡的个人之间的无害原则基础上。相反，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是，人的“类本质”追求是“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⑦。

其次，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执政理念的根本要求：消灭把人的劳动或劳动者看成单纯社会财富的手段，即要求“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⑧。每一个个体都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社会同样是每一个个体的“类本质”（我们认为“精准扶贫”也应当是其中应有之义）。

再次，如果没有“劳动—所得”就没有发展（效率）；如果没有“道德应得”同样也不会有公平的社会合作。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固守于“劳动—所得”，那么，当所得的结果形成贫富差距，

必然会使财富成为权力去统治和剥削他人的劳动时，不仅牺牲的是公平、造成社会共同体的分裂，最终连发展（效率）也不会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贫富差距巨大的南美逐渐失去效率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原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发展与公平相谐行的分配正义。

二、“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分配正义原则

“共享发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原则，又是对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不同时期分配原则总结与反思的结果，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的跨越。

自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以来，针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我党适时提出了接续继承、公平递进的一系列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共享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的分配原则。

回顾历史，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我国的分配方式只能按照行政指令进行分配（尽管其分配方式是有其目标原则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⑥。”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状况，我们只有努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才能“有蛋糕”可分。“先富带动后

富”，最后走向“共同富裕”。一方面，只有同质的差异才能产生效率；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共享。也就是说，如果收入的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分裂，那么社会发展必然会损害其效率；只有把收入差距控制（通过税收和再分配）在合理范围之内，才能保持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效率。

以前，关于“先富”“后富”问题的争论，除了我们在当时的确存在某些管理不善之外，还有我们思维方式转变，即道德评价标准的转变：“好和坏”的事实判断与“对和错”的价值判断，至今为止仍在影响和干扰着我们一些人对问题的理解。在解决了价值判断的问题之后，我们应当注重解决事实判断的问题。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注：到十八大召开之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被世界各国所瞩目和重视。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这就需要我们用中国的话语方式、中国发展成就，特别是正义的社会原则展示中国的大国形象。当然，我们也需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解决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的问题。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其中，“共享发展”作为其它一切发展理念的目的与归宿是实现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要求，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以“共享”为前提的发展，而不只是为了共享而发展。

“共享”是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但决不是消灭合理差别的平均主义。它是以扶贫开发的方式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早在201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就提出“精准扶贫”思想。此后他还多次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等观念，我们应当理解为：在基本生活保障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我们都能得

到和自己的能力与意愿^⑩相一致的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步骤。举例说明，如果我们每个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用为1000元（每月费用在这个数字以下收入的为贫困），如果通过扶贫开发、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我们每个人所得的保障性收入为每月3000元，甚至更多。此时，尽管我们还存在着收入的差别，但是，那是在小康生活水平基线以上的差别。这种差异就是我们个人能力与意愿的差异，它让我们每个人认可自己的能力或机会与他人的差别，甚至认可自己的兴趣、爱好或专业与他人获得社会产品在量上的差别。然而，因为有差异，社会合作体系仍然保持着效率与发展。并且，这种差异的存在就是使人们产生希望的动力。

与此相一致，“共享发展”同样是我们中华传统的“和”文化在新时代分配正义原则的实现与深化。中华文明以“和”为贵，“礼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变不可行也^⑪”“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⑫”。“共享”的目的不是追求平均，而是脱贫，实现全面小康。在此基础上使我们的社会在发展中增进人民的福祉，使每一个人在社会合作体系中获得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从“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目的，到“共享”作为发展的前提；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共享发展”；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切表明：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质的跃迁。

三、“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未来指向

“共享发展”是解决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为完成不同时代特定的历史任务所必然产生的中国民生问题的原则和目标。“共享发展”的贯彻实施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新时代，为中国未来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首要的历史任务就是维护和保证国家主权的独立。为了维护国家独立，我们

必须进行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工业、能源、交通、通讯等一系列相互配套的设施建设。而这一切建设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与维持它们的运行，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调动广大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采取高度集体化方式，为维护国家独立的国防体系提供最大限度的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支持。那时所采取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全力支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生产，导致了本来就存在着很大差距的城乡之间进一步扩大。尽管在改革开放以后和各个不同时期，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但是，城乡差距仍然存在。

当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完成以后，保证和提高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就成为突出的社会发展要求（当然，到底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之后再发展民生，还是民生发展才能保障重工业的发展，需要专题进行严格的学术论证。这里，我们只能从历史事实出发谈论这一问题）。日常生活的需要是无法完全通过中央计划完成的，它需要通过市场方式才能满足，这是由市场经济的特点所决定的。计划经济是以政治需要为目的（国家独立），各经济单位（企业）不以效率为原则，它的特点是自上而下地完成计划指令。当然，计划经济是无法完整地、真实地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一般说来，市场经济形成的是与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相一致的生产与交换，市场主体必须以效率或人们的生活需要的满足为目的。市场的开放性要求我们必须改革当时单一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我们的经济发展对世界开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就是为了促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从以往敌对的前沿转而变成改革开放和外商投资的前沿。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在东南沿海兴办的独资、合资等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基本上都与我们当时短缺的日常生活需求紧密相关。这些投资少、见效快的企业，并且在投资、税收等方面享受了国家和地方政府所给予的政策优惠，再加上吸纳大量从内地转移过去的农村劳动力，促进了东南沿海迅速发展。而内地则由于开

放较晚、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等多种原因的影响,发展相对缓慢,导致地区之间产生差别。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生了行业收入的差别。还有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教育等重要的民生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发展方式的转换,逐步突显。

“共享发展”就是适应我国新时代、针对以上出现的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首先,它是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中国实践;其次,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体现;更重要的,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表达。

“共享发展”就是在“共享”但不损失经济与社会进步效率的前提下发展;发展但不导致贫富差距或社会合作体系被破坏条件下的“共享”。如果采取平均主义的方法,不但损害发展,造成“共同贫穷”,最后连“共享”都无法真正实现。相反,在新时代条件下如果仅仅依靠发展而不共享,那么,发展也最终会因为社会分裂而失去动力支持。所以,“共享发展”决定了我们以市场社会主义的方式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可持续性。

我们所面临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等问题的产生,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问题的浮现,需要我们从中华民族完成近现代历史使命的合理性中去理解和从未来发展中去解决。“共享发展”正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格局中去面对历史、解决历史问题。以“共享”为原则的公平正义社会合作体系解决我们现有的社会问题,恰恰是中国社会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目标作为立党之本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时起就自觉地担负起并坚持着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只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条件下首先应完成国家独立与富强的历史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共享发展”以正义的社会分配原则,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贫困差距和解决民生问题。在“共享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里实现人的解放,体现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强决心。

总之,“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原则的中国话语方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共享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进程的总结和中华智慧的传承与发展。它使我们能够在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的同时,保持社会发展。“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在中国的实现,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的承诺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表征。它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尊重感、获得感和存在感。

注释

-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3版,第15页。
- ③亚当·斯密则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是财富的源泉。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及其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252-254页。
-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第6版,第40页。
- ⑤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第6版,第43页。
-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3版第16-17页;亦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81页。
- 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91页。
-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04页。
-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116页。
- ⑩能力与意愿的差异:一是,每个人因为专业、兴趣或爱好的差异,它建立在个人幸福意愿基础上;二是,每个人认可自己能力与机会不同,所得与他人的差异。
- ⑪《论语·学而》。
- ⑫《国语·郑语》。

Sharing Development: Distribution Jus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Luo Kequan

Abstract: Sharing development requires a high qua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fair and just social cooperation system. As 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ising from Marxist distribution justice, sharing development is a combination of labor and gain or in other words, of legitimacy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nd good of moral due in social cooperation. Meanwhile, it also embodies and carries ou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harmony-loving culture. Sharing development is born of the summary and reflection to distribution principles in all stag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which turns from the development purpose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the development premise of sharing. The shift from efficiency comes first with justice in mind to sharing development shows a successful he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a new era, fueling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which presents the sheer determination of communists remaining true to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ing thei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Key words: Sharing Development; Marxism; Distribution Justice; Development Concept in A New Era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和实践路径

樊明方 门超

摘要: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必须充分发挥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统领作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和改善党内政治生态,大力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及党性锻炼,进一步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提高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在反腐败斗争中切实解决党内政治腐败问题。

关键词: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作用;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3-0021-07

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强化领导地位和政治属性的本质要求,是在新形势下应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巩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重大举措。

一、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涵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是运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全党的思想意志、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的政治实践活动。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一个重大命题,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第一,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内涵是坚持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1]62}。”这一论述指出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所在。全党必须贯彻落实这一首要任务,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增强党的政治优势和领导能力,巩固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和核心地位,发挥党中央对全党的领导作用,促进党内的团结稳定,有效整合党内政治资源,确保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和代表性。作为现今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拥有8956.4万名

党员和457.2万个基层组织(截止2017年底)”^[2]。管理如此庞大的党员队伍和基层组织,如果党内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没有树立党中央的政治权威,党就会丧失凝聚力和向心力,造成党的组织体系涣散、领导能力弱化,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和领导地位,严重威胁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迫切要求,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3]。

第二,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规范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发展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能够有效调节党内政治关系,提高党员的政治生活质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把加强思想理论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三会一课”制度,严格执行党内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实效性。党内政治生态集中反映了一个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环境,体现了一个政党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员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以及人生态度,交织融合而形成的生存和发展环境^[4]。”只有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环境

作者简介:樊明方,男,陕西千阳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政治史研究;门超,男,陕西咸阳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和党内人际关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才能把党的政治建设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第三,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之举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是党内主流价值观的集中反映和内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5]。”由此指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发展方向,明确了它所具有的思想基础、主体结构 and 鲜明特质。党内政治文化是发展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文化基础。开展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有效针对党内庸俗腐朽文化和党员错误思想的治本之举,能够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与政治认同,促进党员价值观念的整合和政治品格的提升。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必须积极弘扬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克服各种错误文化思潮的影响,抵制各种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侵蚀,坚决清除党内隐藏的“两面派”“两面人”。不断培厚党内优良政治生态的土壤,积极引导和教育各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自觉提高思想觉悟、政治品格和文化修养。

第四,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是增强广大党员的党性锻炼,尤其是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政治能力。党员的党性锻炼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克服党员队伍中消极腐败现象的重要举措。全面增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必须在党的理论指导下、在党内规章制度的规范下,全力抓好党性教育,高度重视理想信念培育,不断加强党的理论学习和党性实践锻炼。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提高党员干部思想上的政治觉悟和实践中的政治能力。政治觉悟是广大党员干部在政治生活实践中领会政治问题、明辨政治是非、坚守政治信仰、防范政治风险的意识。“政治能力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就是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6]。”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必须在实践工作中积累政治经验,在严肃纪律中强化政治素养,大力加强党性锻炼和理论修养,不断锤炼政治本领和坚守政治立场。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实际工作中,坚定执

行党的政治路线、努力改进工作作风,在深入调研和联系群众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能力。

二、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命题,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7]。”由此表明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建设在地位和作用上并非并列的关系,党的其他建设需要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来展开。

(一) 政治建设明确思想建设的政治方向

党的思想建设注重的是党员的理想信念、政治信仰、思想道德教育,着力解决党员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思想建设,明确了思想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2018年8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8]。”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的根本方向,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在关系和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正确的政治立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9][80]}。”党的思想建设过程中需要明确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持续开展理想信念、基本理论、宗旨意识、组织纪律、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思想工作,着力培养全体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准政治立场和政治要求。党的思想建设还必须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文化思潮的影响,切实纠正党内存在的“四风”问题,不断增强全体党员的政治信仰、政治理想和政治忠诚,大力增强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为坚定政治方向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

(二) 政治建设体现组织建设的政治标准

深入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需要使政治建设的内容作用于组织建设之中, “这是党的政治诉求、政治要求在组织层面的体现, 是实现党的政治意图、政治目标的组织手段和组织形态”^[10]。党的政治建设统领组织建设, 就是要把政治性融入到组织建设中, 着重强调党组织建设以及选拔、任用党员干部方面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要求。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 必须坚持贯彻党的决议、维护党的权威, 积极宣传党的政治理论、政治路线、政治主张, 提高党的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的质量和效果, 加强基层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建设, 不断提升政治上的领导力、组织力和凝聚力。在选拔任用各级党员干部时, 必须坚持正确的选拔任用原则和政治标准, 健全和完善党员干部选拔录用机制。在考察党员干部时, 要看重是否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过硬的政治素养、出色的政治能力。在考核评定党员干部时, 关键要看个人是否具有鲜明的政治担当和政治定力, 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中管干部、省管干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以及金融单位的党员干部, 必须加强党组织的监督和约束, 不断督促党员干部坚定政治信仰、提高组织能力、强化政治担当, 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三) 政治建设强调作风建设的政治表现

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规范和约束党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作风, 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必须把正风肃纪作为主要任务, 以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根本要求, “坚持以上率下, 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 继续整治‘四风’问题, 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1166]。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和核心内容,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尊崇党章、遵守党的纪律规范, 不断加强高中级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 “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1163]。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党风廉政建设之中, 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以优良的党风、学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凝聚起党心和民心。

(四) 政治建设凸显纪律建设的政治规范

纪律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中新增的内容, 充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在党的纪律建设中, 首先要强调的是党的政治纪律, “它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11]356}。因此, 全党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和规则体系, 在开展纪律教育中自觉提升纪律意识, 在严肃的监督问责中不断增强政治纪律的约束。“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 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12]。要通过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以“五个必须、五个决不允许”为重点, 持续开展党内政治巡视和监督检查, 严肃追究党内违纪违法人员的政治责任。在监督执纪工作中, 坚持把查处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问题作为主要任务, 已取得了很大成效。“2017年,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存在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案件1.2万件, 处分1.2万人, 比2016年增长了181%, 为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供了纪律保障^[13]。”党的纪律建设必须充分体现政治上的标准和要求, 不断提高约束力和实效性。2018年8月, 在中共中央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简称《条例》)中, 新增或修订了诸多纪律规范条例, 为全面从严治党划出了新的纪律“底线”。例如, “在《条例》的第二条中增加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且有实际不当言论或造成不良后果的惩处办法; 第四十九条增加了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政治生态恶化的惩治措施; 等等”^[14]。

(五) 政治建设增强制度建设的政治保障

党内的制度建设是保障党员权利、体现价值共识、凝聚组织合力的根本举措。要通过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党内监督体系, 进一步增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法定化、党内活动程序化、自身建设规范化和领导决策民主化。党的政治建设是加强制度建设的政治保证, 能够充分发挥政治支撑和引领的作用, 体现党的政治理性、政治意图和价值导向。党的制度建设服务于政治建设, 目的是通过一

系列制度安排,推动党的政治领导、党内权力监督、党内反腐倡廉等方面的制度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责任设计制度,围绕制度构建体系,强化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做到责任清晰、主体明确、制度管用、行之有效,并加强同党内其他法规的衔接,把制度框架确立起来^{[15]209}。”这实质上是运用法治思维和刚性手段来管党治党,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规范来解决党内问题、调解党内矛盾和规范党员行为。党要坚持把政治建设融入到制度建设之中,要通过修订和建立一系列党内制度、条例和规则,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及各项制度,坚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和党内巡视巡察制度等,不断提高党内的民主决策能力,有效保障党员的政治权利,以完善的党内制度法规和监督机制约束和治理党内出现的政治生活不严、政治生态恶化、政治文化庸俗等问题。

三、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路径

党的政治建设要突出其重点内容、发挥其统领作用,必须以党的各项建设作为有效的实践路径来使其落到实处。

(一) 在全党范围内深入贯彻落实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政治原则

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以及最新修改的党章中,都旗帜鲜明地指出:“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1]584}。”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推进会等会议上,习近平多次强调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性,提出了维护党中央核心领导地位的根本要求。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引导全军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要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武装官兵,铸牢部队对

党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16]。”在贯彻落实《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8—2022年)》推进会上,赵乐际强调:“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纲’和‘魂’。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守政治巡视职能定位,自觉承担‘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责任^[17]。”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在实际行动中坚决维护这一原则,绝不容许违反。

(二) 全国各级党组织必须着力增强政治生活的“四性”,积极营造健康的政治生态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11]62},充分体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本质特征和时代要求。增强政治性是把“旗帜鲜明讲政治”纳入到党内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政治理想和政治立场,维护党的政治领导。增强时代性是在党内开展政治生活中,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深刻把握党内政治生活面临的新要求新特征,创新和利用多样化的方式开展党员教育管理、民主评议等活动,及时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新问题。增强原则性是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循各种政治规范和所提供的各项基本准则。它不仅能决定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而且为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和解决各种矛盾提供了遵循依据。“增强战斗性,是要在党内基本原则指导下,通过在组织认定的、正常范围内的党内斗争,特别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做到敢于直面问题、敢于批评对方和自身缺点,从而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的^[18]。”在党内不断增强政治生活的“四性”,才能使全体党员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

党内营造优良的政治生态要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上加以优化,要规范党员行为、发扬党内民主、规范党内组织生活,要以党内制度法规作保障,加强党务公开、党内监督和权力制约。十九大以来,全国各级党组织把营造党内健康政治生态作为重要任务,以多种方式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在重庆市市委召开的五届四次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意见》《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

熙来王立军流毒的意见》和全会决议”^[19]。全国其他一些地区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为新气象的出现感到鼓舞,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任务是艰巨而复杂的,必须坚持不懈,长期奋斗,党内政治生态才可能有大的改观。

(三) 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 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

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摆在中心位置,牢固树立“人民性”的政治思维和主体意识,把“人民立场”作为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在推动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牢固树立“人民立场”,坚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确保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发言权和监督权,尤其是党员干部在政治上过不过关,最终还需要经过人民群众的检验和评判”^[20]。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必须始终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党执政的根基所在,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和权利。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在党的理论指导和党章规范下,抓好全体党员的党性教育,不断增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在开展党性教育方面,要加强思想理论教育和党史国史教育,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在加强党性锻炼方面,要教育全体党员强化责任意识,坚定对党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认同。在加强党性修养方面,“一是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来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意识;二是加强党内监督来提升新时代党性修养”^[21]。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必须严格遵守“四个服从”和党的组织纪律,坚决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请示报告制度,增强党员的组织纪律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党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9]766}。”加强党内监督必须突出重点监督环节和内容,健全党内监督机制,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和创建监督平台。

(四) 进一步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政治生活中根本的组织原则,能够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有效调节党内关系、强化党员干部的组织领导力、科学配置和约束党内的权力运行。在党的建设长期历程中,

建立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具体制度,“形成了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委员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员权利保障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22]。这些制度的建立推进了党的领导权力配置的制度化,也提升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化、规范化。党内民主集中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发展,需要确立党员教育培训的常态化机制,构建民主公开的运作机制,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以及探索实施决策议题预审机制和健全决策执行机制等,形成有效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方法。党的民主集中制在进行制度化建设的同时,还需要增强执行意识,不断强化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意识、制度意识、责任意识和作为意识,正确处理党内民主与集中、组织与个人、团结与批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关系。

(五) 提高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 大力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

党的政治领导力强调的是各级党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把握政治方向和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党的政治领导力突出政治性、方向性,要依靠宣传、说服、引导、示范带动等手段。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需要坚定政治信仰。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定政治信仰,引导全社会树立“四个自信”;坚定“四个意识”,带动全社会拥护中央权威;坚定责任担当,推动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功能。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需要党员领导干部强化政治担当,提高政治素养;提高法纪意识,遵守党纪国法;加强廉洁意识,带头拒腐防变。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合理诉求。党的政治领导力是衡量各级党员干部政治觉悟、政治能力的根本要求。在党员干部的选拔任用过程中,要着力突出政治性在党内选人用人中的导向作用。要以政治表现作为考察党员干部的依据,大力提拔和重用政治素养高、政治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注重政治培养和党性修养,引导和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困难的地方砥砺政治品质、增长本领。

提高全党同志尤其是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能力必须锤炼政治品格、提升理论素养、加强党

内生活锻炼、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和群众工作本领。锤炼政治品格和加强党性锻炼是提高政治能力的基本要求。对党忠诚是党员政治品格的重要表现,主要体现在: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站稳政治立场,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忠诚于党的组织,加强党员个体的组织纪律性,提高党性修养和政治本领。提升理论素养是提高政治能力的必要条件。提升理论素养首先要强化党员的理论学习和文化修养,深入学习党的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和基本方略,深刻领会党的历史使命、奋斗目标、战略布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和群众工作本领是提高政治能力的重要内容。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勤奋学习,深入实际,随时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解决事关大局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及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能力。

(六)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强化党内监督机制和反腐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党内的政治腐败问题

近年来,党内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住了腐败蔓延的势头,取得了压倒性态势和丰硕成果。2017年10月,中纪委的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218.6万件,处置问题线索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人^[23]。”“2018年上半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68.3万件,处置问题线索74万件,谈话函询15.4万件,立案30.2万件,处分24万人,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湖北省纪委监委查处涉及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领域案件361件、国土资源领域案件193件、司法领域案件98件、能源领域案件18件、金融领域案件11件。青海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71件,同比增长200%;处理507人,同比增长225%^[24]。”

然而,我们在取得反腐败斗争重大成果的同时,必须深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还有许多问题和困难需要解决和克服。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反腐难度和成本不断增大,腐败行为的隐蔽性更强,腐败问题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一些党政部门对于反腐败斗争的制度建设和相对滞后于形势所需,有效预防腐败的措施和方法还需完善。在反腐败斗争中值得警惕的是,很多落马的党员领导干部出现严重的违纪违法和贪腐行为,追根溯源都是政治上首先出了严重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出现了党的领导弱化、组织纪律涣散、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等不良倾向,导致政治生活不正常,政治生态恶化;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缺失、政治立场动摇,热衷于拉帮结派、做“两面人”,大搞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等违法乱纪行为,表现出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双重问题,严重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政治稳定。

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切实解决党内政治层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缺陷。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能够从政治层面解决党内腐败的根源,惩治党内腐败的问题,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这是反腐败斗争取得实际成效的前提条件。当前,党内反腐败斗争需要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突出执纪审查的政治性,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和群众监督,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形成反腐败巡查机制和激励机制,铲除滋生党内腐败的土壤,积极营造清正廉明的党内政治生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2] 中共中央组织部. 2017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N]. 人民日报, 2018-07-01(2).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35.

- [4]齐卫平.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科学化的思考[J]. 理论与改革, 2018(1): 9-19.
- [5]曲青山.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7-01-11(5).
- [6]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8: 312.
- [7]习近平.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N]. 人民日报, 2018-07-01(1).
- [8]习近平.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 人民日报, 2018-08-23(1).
- [9]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10]李书林. 党的政治建设: 演进、动因、方略[J]. 理论探索, 2018(2): 51-58.
- [1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12]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181.
- [13]徐令义. 政治生态的“七看”“七着力”[N]. 学习时报, 2018-04-04(1).
- [14]新华社.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N]. 人民日报, 2018-08-27(1).
-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209.
- [16]习近平. 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 为开创强军事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N]. 人民日报, 2018-08-20(1).
- [17]赵乐际.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N]. 人民日报, 2018-05-15(1).
- [18]刘汉峰.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7(1): 106-112.
- [19]杨帆, 张珺.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N]. 重庆日报, 2018-04-11(1).
- [20]胡洪彬.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论析[J]. 探索, 2017(6): 184-192.
- [21]任晓伟.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思想及其时代特征[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144-148.
- [22]裴泽庆.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 172.
- [23]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30(1-2).
- [24]毛翔. 持续保持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8-08-15(1).

Governing Role and Practice Path of Political Building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Fan Mingfang Men Chao

Abstract: To give top priority to the political buil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governing role of political building should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To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building of the Party, we should uphol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carry out intraparty political activities which are highly ideological, updated and well-disciplined for combating any challenge and improve the party's political ecosystem. We need to vigorously raise party consciousness of our members, to improve the democratic centralism of the party, to enhance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administering ability of party leaders and officials and to earnestly tackle intraparty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Key words: New Era; CPC Political Building; Governing Role; Practice Path

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现状及其对教学效能感的影响分析

周海涛 郑淑超

摘要:教师工作能力是教师顺利完成工作任务必备的综合能力,直接影响教师工作的质量效率和教学效能感,研究工作能力现状及其对教学效能感的影响有助于民办高校教师策略精细化。在对我国62所民办高校4307位教师调查发现: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总体水平较高,其中教学能力较高,科研能力较低;收入、性别、学校层次、职称、学历等特征变量对教师工作能力水平有显著影响;教师工作能力水平与教学效能感及其各维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建议聚焦不同性别、学科、学历、职称、职务、通勤时间和收入等教师的能力制约因素,有针对性采取多样化的能力提升措施;紧扣民办高校的应用型特性,优化教师在工作中实践、在实践中提升的环境条件;围绕工作能力和教学效能感的内在共生关系,促成良性互动的正效循环;全方位统筹工作能力建设,聚集各方联动、相互支持的强大合力。

关键词:民办高校;工作能力;教学效能感;影响分析

中图分类号: G64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3-0028-11

一、问题提出

“人”是教育工作的主体,“人才”是高校的第一资源。提高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关键在于提高教师队伍质量,本质上是强化教师的工作能力和教学效能感。民办高等教育已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增强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和教学效能感是关涉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核心要素。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水平关系到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业成效,同时也影响着教师教学效能感,进而影响教师能否满意职业环境,高质量地投入工作。哪些因素影响了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水平?工作能力水平与教学效能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性?如何增强工作能力,提高教学效能感?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理解和促进民办高校教师队伍整体建设。

(一) 概念界定

1. 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Work Ability)^[1](Tuomi, 1991)是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解决和应付劳动任务的总体表现,包括体力能力、脑力能力和社会能力^[2](Nygard, 1991)。具体来说,工作能力是职务对劳动者的能力要求,包括必备知识、专业技能、一般能力;即由外显的知识层,内隐的知识与技能层,沉淀的认知、价值、品质和个人特质层构成^[3](王勇, 2003)。工作能力是劳动者的从业基础,直接影响着做事的质量和效率^[4](Ilmarinen, 1991)。

2. 教师工作能力

教师工作能力(Teacher's Work Ability)是指教师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必备的综合能力,是教师的核心素质。林崇德^[5](1996)认为教师工作能力至少包括职业理想、知识水平、教育观念、教学监控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政策实施跟踪与评估研究”,项目编号:16JZD048。

作者简介:周海涛,男,陕西汉中,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政策、高等教育研究;郑淑超,女,浙江温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从事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研究。

能力、教学行为与策略; 欧盟将教师工作能力分为工作网构建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培训能力、管理能力^[6] (Kristiina, 2009); 张波^[7] (2000) 指出教师工作能力包括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创造能力, 四种能力结构体系完整统一、相对独立并交相辉映^[8] (2007); Molenaar^[9] (2009) 认为高校教师工作能力有教学领域、组织级别和能力构成三个维度; 徐继红^[10] (2013) 提出我国高校教师能力结构包括能力构成领域、工作领域和活动过程领域; 李海健^[11] (2016) 指出高校教师工作能力包括终身学习能力、反思教育能力、运用网络资源能力。

可见, 相关研究将教师教学活动过程能力作为教师工作能力的重点, 也提及团队合作、工作网建构、能力构成、运用网络资源等通用的工作能力, 此外是组织能力、监控能力、反思教育能力等相关管理能力, 还提及高校教师的重要工作之一——科研工作。本文的教师工作能力包括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管理能力、科研能力等四个维度。

3. 教师教学效能感

教师教学效能感 (Teacher Efficacy) 是教师对自己完成教学任务、影响学生成就的信心^[12] (Gibson, 1984), 是教师对自身组织和推进课堂以实现预期目标能力的信念^[13] (Moran, 1998)。教师教学效能感是教师职业特征的敏感指标, 可预测教师教学工作^[14] (辛涛, 1996) 和学生学业成就^[15] (屈卫国, 1999), 与教师职业满意度^[16] (McLennan, 2017)、幸福感^[17] (翟瑞, 2014) 显著正相关, 影响教师职业倦怠^[18] (Skaalvik, 2010), 是教师自主发展的重要内在推动力^[19] (Hui Wang, 2015)。

可见, 教师教学效能感是一个感知性的综合概念, 本文包括教学策略、课堂管理和学生投入三个维度。

(二) 研究基础

工作能力与劳动者职业经验、心理状态、工作动机等方面密切关系^[20] (张磊, 2003), 研究已扩展到各行各业, 包括刑警、医生、工人等, 但对教师工作能力的研究占比仍较大。

在工作能力四个维度上, 通用能力^[21] (彭聃

龄, 2001) 是直接影响活动效率, 使活动顺利完成的身心特征的统称; 与人们所从事的活动紧密相关, 是完成所有活动任务的身心可能性或必要条件, 包括交际能力、沟通能力等。教学能力^[22]

(Wang, 1980) 是指教师准备、完成、反思教学全过程的能力, 是教师顺利完成教学活动所需的职业素质^[23] (杨文华, 1996)。管理能力^[24] (罗树华, 2000) 是指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管理教育活动, 为实现教育目标充分占有教育信息、合理运用时间、调控自己的情绪、搞好自我管理等的的能力。科研能力^[25] (高扩昌, 2009) 是指教师具有较强科研意识, 能够准确选定课题和研究对象, 熟练运用合适的方法与手段, 有效地探索教育教学规律, 科学、规范地表达研究成果的能力。在工作能力水平测量上, 国内常用《综合性工作能力指数量表》 (Comprehensive Work Ability Index, CWAI)^[26], 它基于芬兰职业卫生研究所提出的工作能力指数法 (Work Ability Index, WAI)^[27] (Ilmarinen, 1992), 中文WAI在2000年发表^[28], 信效度良好^[29] (马来记); 此后张磊等评价了WAI的稳定性^[21] (2003), 并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编制出有良好稳定性、信效度^[30] (2008) 和同质性信度^[31] (2006) 的CWAI。

有研究发现, 教师工作能力与应对资源正相关, 应对资源越强, 教师工作能力越高^[32] (王治明, 2001); 与职业紧张负相关, 职业紧张度越高, 教师工作能力越低^[33] (曾繁华, 2002)。教师工作能力还与心理健康相关, 心理状态越差, 工作能力越低; 与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满意度越低, 工作能力越低 (刘继文^[34], 2001; 李富业^[35], 2008)。

综上, 研究教师工作能力现状及影响, 对提高教师工作能力及策略有积极指导作用。基于某省四所高校200位教师工作能力的调查认为, 多数高校教师专业知识尚可, 个人特质基本满足需要, 但专业发展意识不足, 教学技能缺乏创新^[10] (徐继红, 2013), 即高校教师科研能力、通用能力较强, 教学能力、管理能力相对薄弱。但基于全国的大样本研究文章未见发表, 对民办高校教师的研究屈指可数, 迄今未见工作能力与教学

效能感的相关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项目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编制的信效度符合心理学要求的教师工作能力量表, 调查全国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现状, 并探索其与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关系。

(一) 研究对象

向全国西、中、东部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62所民办高校发放问卷, 回收4362份, 其中有效问卷4307份, 有效率98.74%。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2991人, 专科及高职教师1316人; 男教师1420人, 女教师2887人。所取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 并达统计要求。

(二) 研究工具

教师工作能力量表: 研究保留16项, $X^2/df=1.74$, $KMO=0.942$, Bartlett球形检验 $P<0.001$, 模型拟合优秀; 四因子解释总变异量73.19%, 符合预期结构设定; 主成分提取后Kaiser标准化倾斜旋转并6次迭代后收敛, 每个维度4项, 各维度按内涵命名为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管理能力、科研能力; 各项维度负荷值为0.757—0.909; 总量表及四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934, 0.868, 0.806,

0.838, 0.904。

教师教学效能感量表: 沿用Moran^[14] (2001) 的教师教学效能感量表, 包括教学策略、课堂管理和学生投入三个维度。研究保留18项, 所有题项间相关度0.462—0.742 ($P<0.001$), $KMO=0.973$, Bartlett球形检验 $P<0.001$; 三个因子解释总变异量71.38%, 主成分提取后Kaiser标准化倾斜旋转并7次迭代后收敛; 各自维度负荷值为0.756—0.884, 维度间相关值为0.702—0.742, 模型拟合优秀; 总量表及三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0.963, 0.915, 0.908, 0.924。

三、数据与结果

(一) 工作能力整体水平

我国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均值3.656 (见表1), 显著高于理论中值3 ($P<0.001$)。表明我国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总体水平较高, 满足高校工作对教师的能力需求。其中, 四维度均值大小为: 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管理能力>科研能力, 差异显著 ($P<0.001$), 事后检验四维度间两两比较均差异显著 ($P<0.001$)。科研能力相对较低, 显著影响工作能力均值。

表1 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均值表

	教学能力	通用能力	管理能力	科研能力	总均值
M±S	3.922±0.563	3.728±0.604	3.719±0.640	3.356±0.759	3.656±0.538
中值差异	$t=107.457^{***}$	$t=79.165^{***}$	$t=63.442^{***}$	$t=30.820^{***}$	$t=80.077^{***}$
维度差异	$F=658.341^{***}$				

注: 1. 所有分析均经Levene方差齐性检验 ($P<0.001$); 2. $*P<0.5$, $**P<0.01$, $***P<0.001$; 下同。

(二) 不同特征变量下教师工作能力水平

研究收集多种特征信息, 以探讨这些变量与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的关系。方差分析发现: 性别、学科、学校层次、职称、职务、收入、通勤时

间对工作能力有显著影响 ($P<0.001$), 学历对工作能力影响也显著 ($P<0.05$)。身份、年龄、教龄、学科、承担课程门数、周课时数、本校工作年限对工作能力影响不显著 (见表2)。

表2 各特征变量对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的影响差异性

学校层次	性别	身份	年龄	教龄	通勤时间	学历
$B=39.096^{***}$	$F=102.654^{***}$	$F=0.691$	$F=1.114$	$F=0.951$	$F=10.675^{***}$	$F=3.734^*$
职称	学科	承担课程	周课时数	工作年限	收入	职务
$F=7.848^{***}$	$F=10.089^{***}$	$F=1.363$	$F=2.032$	$F=1.205$	$F=7.436^{***}$	$F=8.014^{***}$

注: B为Levene检验方差不齐性时, 采用Brown-Forsythe值; 下同。

对表2分析检出教师工作能力的影响显著项再进行方差分析,以探讨具体影响。

1.不同学校层次教师工作能力水平

不同学校层次教师工作能力四个维度差异均显著 ($P<0.001$);专科/高职教师的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管理能力、科研能力均显著高于本科及以

上教师均值 ($P<0.001$),见表3。

2.不同学科教师工作能力水平

不同学科教师工作能力水平差异显著 ($P<0.001$),其中艺术学教师的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管理能力、科研能力较高,农学教师的工作能力水平在所有学科中相对最低,见表3。

表3 学校层次、学科对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的影响差异性

		教学能力	通用能力	管理能力	科研能力
层次	本科及以上	3.896±0.564	3.695±0.603	3.571±0.651	3.329±0.762
	专科/高职	3.981±0.558	3.802±0.598	3.728±0.640	3.419±0.748
		$F=20.827^{***}$	$B=39.096^{***}$	$F=55.259^{***}$	$B=13.293^{***}$
学科	理工	3.893±0.579	3.700±0.624	3.649±0.640	3.374±0.772
	文科	3.901±0.564	3.750±0.607	3.526±0.678	3.350±0.746
	艺术	4.075±0.544	3.877±0.561	3.796±0.530	3.551±0.684
	农学	3.733±0.729	3.302±0.805	3.314±0.716	3.070±0.835
	医学	4.006±0.533	3.723±0.551	3.606±0.523	3.204±0.697
		$B=5.401^{***}$	$F=6.632^{***}$	$F=12.448^{***}$	$B=8.946^{***}$

3.不同性别教师工作能力水平

不同性别教师工作能力水平差异显著 ($P<0.001$)。男教师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管理能力、科研能力均高于女教师,差异极其显著 ($P<0.001$),见表4。

4.不同学历教师工作能力水平

不同学历教师工作能力水平差异显著 ($P<$

0.05)。教学能力上硕士教师较高,专科及以下教师较低,差异显著 ($P<0.05$);学士教师通用能力最高,硕士教师最低,差异显著 ($P<0.01$);博士教师管理能力较高,专科及以下教师较低,差异不显著;科研能力总体较低,博士教师较高,学士教师较低,差异显著 ($P<0.001$),见表4。

表4 性别、学历对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的影响差异性

		教学能力	通用能力	管理能力	科研能力
性别	男	4.000±0.600	3.832±0.638	3.757±0.647	3.504±0.781
	女	3.884±0.540	3.677±0.579	3.551±0.626	3.284±0.737
		$B=38.069^{***}$	$B=60.259^{***}$	$B=98.626^{***}$	$F=81.877^{***}$
学历	专科及以下	3.702±0.916	3.728±0.909	3.597±0.834	3.343±1.054
	学士	3.920±0.586	3.814±0.610	3.642±0.623	3.309±0.790
	硕士	3.929±0.535	3.696±0.580	3.607±0.636	3.363±0.733
	博士	3.908±0.797	3.747±0.892	3.750±0.803	3.750±0.759
		$F=4.053^*$	$F=5.115^{**}$	$F=2.871$	$F=7.854^{***}$

5.不同职称教师工作能力水平

不同职称教师工作能力水平差异显著 ($P<$

0.001)。教学能力上副高职称教师较高,无职称教师较低,差异不显著;通用能力上正高职称教师较

高, 中级职称教师较低, 差异显著 ($P < 0.001$); 管理能力和科研能力随着职称的上升而增高, 差异显著 ($P < 0.001$), 正高级职称教师的管理能力和科研能力显著高于其余教师 (见表5)。

6. 不同职务教师工作能力水平

不同职务教师工作能力水平差异显著 ($P < 0.001$)。在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科研能力上, 院系领导、学校中层干部较高, 校领导较低, 差异显著 ($P < 0.001$); 在科研能力上专职教师和科研人员较高, 校领导较低, 差异显著 ($P < 0.001$) (见表5)。

表5 职称、职务对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的影响差异性

		教学能力	通用能力	管理能力	科研能力
职称	无	3.839±0.608	3.820±0.600	3.553±0.667	3.280±0.789
	初级	3.897±0.556	3.738±0.605	3.572±0.613	3.321±0.775
	中级	3.937±0.547	3.679±0.599	3.608±0.646	3.333±0.661
	副高级	4.030±0.498	3.762±0.553	3.814±0.556	3.546±0.869
	正高级	3.948±0.828	3.857±0.810	3.870±0.811	3.828±0.759
		$F=1.710$	$F=9.453^{***}$	$F=7.649^{***}$	$F=10.725^{***}$
职务	教师、科研	3.955±0.527	3.821±0.582	3.681±0.587	3.627±0.614
	院系、中层	3.978±0.558	3.847±0.616	3.958±0.545	3.539±0.681
	校领导	3.500±1.302	3.525±1.352	3.325±1.219	3.425±1.219
	辅导员及其他	3.771±0.667	3.725±0.622	3.557±0.655	3.595±0.817
		$F=4.617^{***}$	$F=5.280^{***}$	$F=14.960^{***}$	$F=8.359^{***}$

7. 不同通勤时间教师工作能力水平

不同通勤时间教师工作能力水平差异显著 ($P < 0.001$)。在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管理能力、科研能力上, 通勤时间0.5—1小时内教师均较高, 通勤时间2小时以上教师均较低, 差异显著 ($P < 0.001$, 通用能力 $P < 0.01$), 见表6。

8. 不同收入水平教师工作能力水平

不同收入水平教师工作能力差异显著 ($P < 0.001$)。在教学能力、通用能力上, 收入不足的教师均值较低, 很富余教师均值较高 ($P < 0.001$) (见表6); 在管理能力上, 随着收入水平增加而增高, 差异不显著; 在科研能力上, 随着收入水平提升而

表6 通勤时间、收入对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的影响差异性

		教学能力	通用能力	管理能力	科研能力
通勤时间	0.5小时以内	3.912±0.571	3.736±0.601	3.643±0.638	3.370±0.768
	0.5小时—1小时	3.952±0.538	3.758±0.593	3.665±0.621	3.410±0.746
	1小时—2小时	3.938±0.540	3.704±0.600	3.574±0.630	3.313±0.737
	2小时以上	3.773±0.692	3.605±0.668	3.383±0.729	3.148±0.805
		$F=10.294^{***}$	$B=4.732^{**}$	$F=10.050^{***}$	$F=7.536^{***}$
收入	很不足	3.889±0.637	3.688±0.661	3.455±0.723	3.204±0.820
	不足	3.883±0.516	3.673±0.570	3.570±0.575	3.295±0.706
	持平	3.952±0.517	3.763±0.556	3.722±0.573	3.447±0.698
	略有富余	4.014±0.557	3.856±0.589	3.848±0.614	3.611±0.737
	很富余	4.298±0.954	4.292±0.953	4.238±0.895	4.167±1.107
			$F=4.719^{***}$	$F=9.875^{***}$	$F=2.433$

表7 不同特征变量对教师工作能力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R	R ²	F	Beta	t	sig
收入	0.185	0.034	151.865***	0.175	11.518	0.000***
性别	0.236	0.056	98.451***	-0.154	-10.328	0.000***
层次	0.26	0.067	54.163***	0.122	8.026	0.000***
职称	0.263	0.069	7.895**	0.038	2.465	0.014*
学历	0.265	0.070	5.789*	0.037	2.406	0.016*

增高, 差异显著 ($P < 0.001$)。

将不同特征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发现, 依次进入教师工作能力方程的为: 收入、性别、学校层次、职称、学历, 表明这5项特征变量不同的教师, 工作能力间差异最显著。

(三) 工作能力与教学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发现 (见表8): 教师工作能力与教师教学效能感显著正相关 ($r=0.697$, $P < 0.001$); 回归分析发现, 工作能力解释教学效能感48.6%的变异, $R=0.697$, $R^2=0.486$, $F=4074.068$ ($P < 0.001$), $Beta=0.697$, $t=63.828$ ($P < 0.001$)。

工作能力各维度与效能感各维度间正相关, r 值范围0.450—0.663, 差异显著 ($P < 0.001$); 表明教师工作能力越强教师教学效能感水平越高。其中, 相关性大小为: 教学能力 > 通用能力 > 管理能力 > 科研能力; 回归分析同样发现, 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管理能力先后进入方程, $Beta$ 值分别为0.405、0.300、0.102 (P 值均 < 0.001), 科研能力最后进入方程, $Beta$ 值为0.041 ($P < 0.01$); 表明教师教学能力对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影响最强, 其次是通用能力、管理能力, 科研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弱。

表8 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与效能感之间的相关

	工作能力	教学能力	通用能力	管理能力	科研能力
效能感	0.697***	0.674***	0.632***	0.550***	0.510***
教学策略	0.668***	0.663***	0.591***	0.534***	0.482***
课堂管理	0.634***	0.609***	0.599***	0.498***	0.450***
学生投入	0.650***	0.615***	0.582***	0.509***	0.493***

1. 工作能力与教学策略效能感

工作能力与教学策略效能感显著正相关 $r=0.668$ ($P < 0.001$)。其中, 工作能力四维度与教学策略效能感相关性强弱依次为: 教学能力 > 通用能力 > 管理能力 > 科研能力; 回归分析发现, 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管理能力三项解释教学策略效能感变异量50.2% ($P < 0.001$), $Beta$ 值分别为0.432, 0.255, 0.122 (P 值均 < 0.001); 教学能力对教学策略效能感影响最显著。

2. 工作能力与课堂管理效能感

工作能力与课堂管理效能感显著正相关 $r=0.634$ ($P < 0.001$)。其中, 工作能力四维度与课堂管理效能感相关性强弱依次为: 教学能力 > 通用能力 > 管理能力 > 科研能力; 回归分析发现, 教学能力、通

用能力、管理能力三项解释课堂管理效能感变异量45.6% ($P < 0.001$), $Beta$ 值分别为0.349, 0.330, 0.093 (P 值均 < 0.001); 教学能力对课堂管理效能感影响最显著。

3. 工作能力与学生投入效能感

工作能力与学生投入效能感显著正相关 $r=0.650$ ($P < 0.001$)。其中, 工作能力四维度与课堂管理效能感相关性强弱依次为: 教学能力 > 通用能力 > 管理能力 > 科研能力; 回归分析发现, 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四项解释学生投入效能感变异量45.6% ($P < 0.001$), $Beta$ 值分别为0.356, 0.264, 0.085, 0.083 ($P < 0.001$); 教学能力对学生投入效能感影响最显著。

四、分析与讨论

(一) 不同特征变量对工作能力的影

特征变量中, 年龄、身份、教龄、工作年限等工作能力影响不显著。年龄对工作能力的影响不显著, 与林嗣豪^[36] (2005) 研究一致。范卫^[37]

(2003) 认为年龄是影响工作能力的主要因素, 王治明^[28] (2001)、杨新伟^[38] (2004) 研究发现教师工作能力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 40岁开始下降明显, 而Klomuller^[39] (2000) 认为50岁以后工作能力才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本研究发现教师工作能力随年龄增长而增高, 青年教师最低, 60岁以上教师最高, 表明我国民办高校教师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持续精进。此外, 兼职教师工作能力稍高于全职教师, 这可能由于民办高校兼职教师均为公办高校教授。教龄、工作年限对工作能力影响不显著, 但均值差异与李富业^[31] (2008) 研究一致, 即随着教龄增加教师工作能力增高; 教师工作能力随着本校工作年限增长而增高, 这可能是与教龄的相关。教师工作能力差异显著的特征变量有学校层次、学科、性别、学历、职称、职务、通勤时间和收入, 其中进入工作能力回归方程的特征变量依次为收入、性别、学校层次、职称和学历。

1. 收入对工作能力的影

收入影响教师工作能力, 与工作能力显著正相关, 收入越高教师工作能力越强, 与范卫^[38] (2003) 研究发现一致。且收入可解释工作能力变异量3.4%, 收入越高, 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越高, 越有提高自身工作能力的动力; 反之, 工作能力提升能为教师带来更高收入, 可形成正向良性循环。

2. 性别对工作能力的影

性别与工作能力相关, 不同性别教师之间的工作能力差异显著, 男教师工作能力显著高于女教师, 与王治明^[28] (2001)、李富业^[31] (2008)、连玉龙^[40] (2011) 等研究发现一致。与男教师相比, 女教师在高校工作的同时, 还要分不少精力和时间兼顾家庭,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教师工作能力水平。

3. 学校层次对工作能力的影

专科/高职教师的工作能力高于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 且差异显著。访谈发现, 这可能由于本科及以上学历民办高校教师的能力预期更高, 补充新教师有一定挑战, 同时高水平教师向公办高校的流动频繁; 而专科/高职院校更重视实践与应用, 教师流动少、聘请专业行业人士及兼职教授的途径较多, 工作能力整体水平较高。

4. 职称对工作能力的影

职称与工作能力正相关, 对工作能力影响显著。访谈发现, 工作能力水平本身是职称晋升的决定性因素; 职称越高的教师, 通用能力、管理能力、科研能力越高; 中级职称教师的通用能力较低, 无职称教师的教学能力较低。

5. 学历对工作能力的影

学历与工作能力正相关, 对工作能力影响显著, 学历越高教师工作能力越高, 与杨惠芳^[41] (2004)、王治明^[28] (2001)、杨新伟^[39] (2004)、李富业^[31] (2008) 等研究发现一致。这表明, 学历教育中的教育科研训练对教师工作能力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6. 学科对工作能力的影

不同学科教师工作能力水平差异显著, 其中艺术学教师工作能力最高, 农学教师最低。访谈发现, 这可能由于艺术学的技能性更强, 有明晰的入职门槛; 农学的实践性较强, 而民办高校的年轻教师比重大, 从高校毕业后就入职, 尚需要一定的实践积累期; 教师从教学学科的特性不同, 工作能力之间有相对差距。

7. 职务对工作能力的影

不同职务教师的工作能力水平差异显著。在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科研能力上, 院系领导、学校中层干部均较高, 差异显著。访谈发现, 这可能由于院系领导、学校中层干部多为“双肩挑”, 工作覆盖面广, 职务定位与教师定位有机融合, 且一直在不断实践, 工作能力较高。同理, 相比于校领导致力于学校管理工作, 专职教师和科研人员专注于业务工作, 在科研能力上相对较高。

8. 通勤时间对工作能力的影

通勤时间不同, 教师工作能力水平差异显

著,具有适当的通勤时间,教师工作能力更高,超过2小时教师工作能力相对降低。访谈发现,这可能与教师精力阈值有关,阈值之内的通勤,可与业务工作形成适当调节的互补效应;通勤时间过长,教师用来提升工作能力的时间越短,工作能力相对较低。

(二) 工作能力影响教师教学策略

1. 工作能力影响教师教学策略效能感

工作能力与教学策略效能感显著正相关,工作能力越强,教学策略效能感越高,其中教学能力影响最为显著。访谈发现,教师教学能力越强,教师拥有更科学的教学理念、掌握更先进的教学技术,教师所组织课程内容更容易被吸收消化,学生有更好的学业成就表现,教师在提高学生成绩上的教学策略效能感更高。

2. 工作能力影响教师课堂管理效能感

工作能力与课堂管理效能感显著正相关,工作能力越强,课堂管理效能感越高,其中教学能力影响最为显著。访谈发现,教师在维持良好的班级秩序和课堂常规上,教学能力影响依然最突出,教师教学能力越强,越会采用更优的教学模式,课堂互动更多,则课堂氛围更好,课程内容更吸引人,课堂上睡觉、“溜号”的学生更少。

3. 工作能力影响教师的学生投入效能感

工作能力与学生投入效能感显著正相关,工作能力越强,学生投入效能感越高,其中教学能力影响最为显著。访谈发现,教师的教学能力反映了教师是否拥有本专业完整的知识体系、知晓本领域的前沿发展,能否在学生知识建构中提供指导,这决定了能否激发学生学习内在动机并维持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教师的学生投入效能感。

五、对策建议

民办高校教师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教师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学校质量的提升。我国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水平总体较高,在四维度均值上,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管理能力>科研能力,教学能力最高,科研能力较低。从实际出发,民办高校教师工作能力提升可采取差别化的系统性策略。

(一) 聚焦不同性别、学科、学历、职称、职务、通勤时间和收入等教师的能力制约因素,有针对性采取多样化的能力助长措施

不同特征变量教师的工作能力水平不同,女教师、农学教师、无职称教师、通勤时间超过2小时的教师、低收入教师工作能力较低,学士学位教师的科研能力较低;应在教师工作能力的提升及培养体系中提供针对性、多元化措施,为教师工作能力的提升给予最高效的针对性支持。

一是增强女教师的工作便利化支持,在评优评先、职称评聘中平等对待女教师,并给予更多机会。二是适当增加农学等学科的课程实践机会,增加无职称教师、青年教师的科研机会,促进他们在实践锻炼中提升自身工作能力。三是健全完善继续教育的津贴补助等政策,鼓励低学历教师访学进修、提高水平。四是提供校内住宿周转房、临时招待所等,节省通勤时间较长教师的上下班时间,保障有足够的工作精力。五是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减少校领导行政事务,确保其参与教学、科研工作,深度把握教师工作特点,有效推进教学改革和队伍建设。

(二) 紧扣民办高校的应用型特性,优化教师在工作中实践、在实践中提升的环境条件

情境学习是工作能力形成的重要途径,Morrison^[42](1986)指出,个人的主要发展源是工作经历而不是正式的培训;在王勇^[3](2003)的调查中,93.3%的个体认为自己工作能力的形成主要源于工作中经验积累和自我学习。民办高校多定位为应用型高校,实践既是最直接的锻炼方式,更是最真实的问题场所,促进教师在工作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是教师工作能力提升的最佳路径。

一是继续深化民办高校内部治理改革,让更多教师有更多行政、教学、科研的实践锻炼机会,让非中层职务教师深度参与管理,让低职称教师参与教学、让低学历教师参与科研。二是增加教育教学培训与实践机会,并纳入绩效考核,通过创新制度机制,激发教师参与的积极性。三是提供人、财、物条件,让教师充分在教学、课堂管理的实践中提升自身的工作能力。四是常态化开展各类交流活动,邀请本领域专家进行前沿学术交流,激励本校

教师零距离介入,提升工作能力。

(三)围绕工作能力和教学效能感的内在共生关系,促成良性互动的正效循环

教师工作能力显著影响教学效能感,与教学效能感及其各维度显著正相关,能解释教学效能感50%左右的变异;其中,教学能力对教学效能感的影响最显著。班杜拉指出,在动机激活、维持与强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即教学效能感反过来激发和调动教师工作动机,影响教师工作积极性和努力程度,进而决定教师工作能力,应着力促进二者的良性循环,互进互利、共同发展。

一是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过程给予指导,教学能力对教学效能感影响最显著,不仅创造机会并鼓励教师参与,更要给予适当的指导与干预,增加教师成功体验,提升教学效能感;教学效能感越高,教师工作动机越强、工作积极性更高,愿付出更多努力提升工作能力。二是建立长效多元评价机制,助推教师包括教学能力、通用能力、管理能力和科研能力等全面提升;工作能力越强,教师教学成效、学生学业成就越好,获得评价越积极,教学效能感越高。

(四)全方位统筹工作能力建设,聚集各方联动、相互支持的强大合力

能力发展是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横向拓展和纵向提升,这需要教师、高校、社会三方共同努力,打造教师奋进、高校支持、社会促进的能力发展局面。教师不断努力,高校推进实践,社会提供资源,教师工作能力在这种联动与支持中不断向前发展。

一是民办高校教师是发展的主体,收入、教学效能感、工作绩效等与自身能力发展有关;同时,一代人有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代人的担当,教师自身不断强化使命感,激发起持续奋斗、精心从教的激情。二是民办高校发展不断跨越,只有提升本校实力才能吸引更多优秀师资,进而提升学校整体的教学、科研质量。三是社会支持更上层楼,除

了高校更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外,更需要社会开放产教融合渠道、探索校企合作机制,形成社会教育收益增加、高校整体声誉提升、教师自身水平提高的共赢局面。

参考文献

- [1]Tuomi K, Ilmarinen J, Eskelinen L, et al. 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rates of diseases and work ability in different work categories of municipal work occupations [J]. Scand J Work Environ Health, 1991(17):67-74.
- [2]Nygard C H, Eskelinen L, Suvanto S,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functional capacity and work ability among municipal employees [J]. Scand J Work Environ Health. 1991(17):122-127.
- [3]王勇. 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知识工作者有效工作能力的确定、评价与发展[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3.
- [4]Ilmarinen J, Tuomi K, Eskelinen L, et al.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of the Finnish research project on aging workers in municipal occupations [J]. Scand J Work Environ Health, 1991(17):7-11.
- [5]林崇德, 申继亮, 辛涛. 教师素质的构成及其培养途径 [J]. 中国教育学刊, 1996(6): 16-22.
- [6]Kristiina V, Seppo H, Rasmus F.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VET professions: Handbook for practitioners [M]. Helsinki: 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2009:3.
- [7]张波. 对当前我国中学教师能力素质状况的分析与思考 [J].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0(4): 106-110.
- [8]张波. 论教师能力结构的建构 [J]. 教育探索, 2007(1): 78-80.
- [9]Molenaar W M, Zanting P, Beukelen V W, et al. A framework of teaching competencies across the medical education continuum [J]. medical teacher, 2009(5):390.
- [10]徐继红. 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结构模型研究[D]. 长春: 东

- 北京师范大学, 2013.
- [11]李海健. 高校教师核心能力建设发展与平台构建[J]. 教育观察, 2016(15): 40-41.
- [12]Gibson S, Dembo M. Teacher Efficacy: A Construct Validation[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84(76): 569-582.
- [13]Tschannen-Moran M, Hoy A W, Hoy K. Teacher efficacy: its meaning and measure[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8(2): 202-248.
- [14]辛涛, 林崇德, 申继亮. 教师教学监控能力与其教育观念的关系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7(2): 36-40.
- [15]屈卫国. 教师效能感与教学效果的关系[J]. 教育科学, 1999(4): 42-44.
- [16]McLennan B, McIlveen P, Perera H N. Pre-service teacher's self-efficac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career optimism[J]. Teaching & Teacher Education, 2017(63): 176-185.
- [17]翟瑞, 沈潘艳, 顾倩, 等. 高校教师职业效能感对幸福感的影响: 职业倦怠的中介作用[J]. 四川精神卫生, 2014(4): 13-16.
- [18]Slaalvik E M, Skaalvik S. Teacher self-efficacy and teacher burnout: A study of relations[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0(26): 1059-1069.
- [19]Hui Wang, Hall N C, Rahimi S. Self-efficacy and causal attributions in teachers: Effects on burnout, job satisfaction, illness and quitting intentions[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5(47): 120-130.
- [20]张磊, 王治明, 王绵珍, 等. 工作能力指数量表的评价研究[J].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3(1): 1-5.
- [21]彭聃龄. 普通心理学[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22]Wang M C. Adaptive instruction: building on diversity[J]. Theory Into Practice, 1980(2): 122-128.
- [23]杨文华. 论师范生的教学能力培养[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2): 19-22.
- [24]罗树华, 李洪珍. 教师能力学[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38-60.
- [25]高扩昌, 任桂婷. 普通高校青年教师科研能力的现状与对策[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9(1): 153-156.
- [26]张磊, 王治明, 王绵珍, 等. 综合性工作能力指数量表的编制[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8(6): 350-354.
- [27]Ilmarinen J, Tuomi K. Work ability index for aging workers. Aging and work[M]. Haikko, 1992: 142-147.
- [28]马来记. 工作能力指数(WAI)调查表[J]. 劳动医学, 2000(2): 128-129.
- [29]马来记, 周彤, 金泰广, 等. 工作能力指数表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J]. 劳动医学, 2000(2): 70-72.
- [30]张磊, 王治明, 王绵珍, 等. 综合性工作能力指数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评价[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8(6): 355-360.
- [31]张磊, 王治明, 王绵珍, 等. 综合性工作能力指数量表的同质性信度评价[J]. 职业卫生与病伤, 2006(3): 4-7.
- [32]王治明, 兰亚佳, 王绵珍, 等. 教师职业紧张和工作能力相关分析[J].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1(4): 200-202.
- [33]曾繁华, 王治明, 王绵珍, 等. 医师与教师职业紧张水平及工作能力的比较[J].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2002(2): 70-73.
- [34]刘继文, 王治明, 王绵珍, 等. 石油作业工人心理健康状态与工作能力关系的研究[J]. 中国职业医学, 2001(5): 31-32.
- [35]李富业, 刘继文, 刘斌, 等. 乌鲁木齐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及工作能力调查[J]. 中国公共卫生, 2008(8): 49-51.
- [36]林嗣豪, 王治明, 王绵珍, 等. 医务人员工作能力及影响因素的研究[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5(6): 445-447.
- [37]范卫, 马来记, 周彤, 等. 不同职业人群的工作能力及其影响因素[J].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2003(29): 96-99.
- [38]杨新伟, 王治明, 兰亚佳, 等. 不同个体特征职工职业紧

- 张和工作能力变化的研究[J]. 卫生研究, 2004 (1) : 5-8.
- [39] Kloimuller I, Karazman R, Geissler H, et al. The relation of age, work ability index and stress-inducing factors among bus drivers[J]. Int J IndErgon, 2000 (25) : 497-502.
- [40] 连玉龙, 宁丽, 张晨, 等. 环境紧张因素对中小学教师工作能力影响[J]. 中国公共卫生, 2011 (9) : 97-99.
- [41] 杨惠芳, 王绵珍, 王治明, 等. 化工工人工作能力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四川大学学报 (医学版), 2004 (35) : 255-257.
- [42] Morrison R F, Hock R R. Careerbuilding: learning from cumulative work experience[J]. Career development in organization, 1986(1).

The Status quo of Teacher's Work Ability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It's Influence on Teacher Efficacy

Zhou Haitao Zheng Shuchao

Abstract: Teacher's work ability, an essential comprehensive kind for teachers' successful teaching, bears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efficiency of teacher's work and teacher efficacy, thus making it necessary for us to explore its status quo and influence on teacher efficacy for the sake of refining the strategy of teachers in private colleges. A survey of 4307 teachers in 62 private colleges gave rise to the findings as follows: a relatively high work ability in teaching rather than research owing teacher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factors like income, gender, college level, professional title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 on work ability of teachers; a remarkabl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work ability and teacher efficacy as well as among all kinds of dimensions. Cultivating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in final: Take targeted and diversified promotion measures focusing on the capability constraint factors of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gender, subject, college level, professional title, education background, position, commuting time and income;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teachers to practice and improve in practice following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ivate colleges; Promote positive efficiency circulation centering on the inner interactive symbiosis of work ability and teacher efficacy; ordinating a construction of work ability all-round gathering strong forces of interaction and mutual support..

Key words: private colleges; work ability; teacher efficacy; impact analysis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

赖绍聪

摘要: 大学课堂教学应该以学习者为主体,只有在充分尊重学习者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教师对课堂教学的精心组织与策划,课堂教学才能够真正实现知识、能力、情感三大教学目标。本文结合作者自身35年从事高校专业课程教学的经历,从教育理念、教师角色、学习者角色以及课堂教学内容凝练和教学策略选择等方面阐述了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探讨了当前我国高校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方向。

关键词: 高等教育; 课堂教学; 学习者; 主体地位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3-0039-04

教学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人类经验传授的活动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将需要传授的内容,经科学的选择,依据知识构成的逻辑顺序和学习者获取知识的认知规律形成教学体系。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课堂教学体系中,教师通常高度关注了“知识构成的逻辑顺序”,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一般会尊重学科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内容的构建关注了学科知识构成的逻辑顺序。然而,这样看似十分合理的“学科知识逻辑顺序”(章一节一点)与学习者“获取知识的规律”并不一定是完全吻合的。正是由于这样的教育理念,使得长期以来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应该拥有的主体地位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知识”仍然主宰着一切,学科知识逻辑顺序引领着课堂的进程,教师代表知识的权威,掌控课堂的主导权,居于课堂的主体地位。而学习者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从属地位。

高质量的课堂教学要讲究方法,要引起学习者的兴趣,引发学习者思考。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真正站在学习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打破以

教师的“教”为主要的传统课堂,转变为以学习者的“学”为主要的课堂,让每堂课深入人心。

一、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其核心理念是将课堂教学的功能定位为“促进学习、学会思想、生成智慧”,而绝不是局限于传递知识。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充分尊重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将学习者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聚焦点,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高度关注学习者的感受,关注他们在学习什么?怎么样学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学习?学习者目前的学习内容是否能够为他们将来的终生学习做准备^[1-5]?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并不反对教师专门知识的有效性,也并不忽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组织策划作用,而是更加强调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双边互动。因为,教学是教与学的统一,教为学而存在,学又要靠教来引导,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作为教师,我们的核心任务不仅仅是传递知识,而是要通过课堂教学的精心组织与策划,培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理科地质学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编号: J1310029、J1210021。

作者简介: 赖绍聪,男,四川安岳人,西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获奖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地质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从事地球科学理论研究。

养学习者终生学习的技能,以及使用这些技能的信心,并最终实现由“教知识”向“教技能”和“教智慧”的转变。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重视培养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倡导学习者在兴趣的驱使下主动获取知识。注重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提升学习者的综合素质。而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为学习者引领学习方向,培养学习者观察、发现、分析、研究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打破了以教师为中心的被动接受式、以记忆为主的机械学习和单纯的知识学习;而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主动参与式学习,以深刻理解为主的意义学习,包含知识、方法、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多方面发展学习者的学习。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在教学目标中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在活动的设计上考虑到学习者相关能力的培养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在时间安排上让学习者从课堂的“看客”成为“参与者”;在组织形式上给予学习者自主学习、自由讨论的课程形式;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习者参与到活动中来,鼓励学习者发表观点^[1-5]。

二、教师角色的转变

当课堂教学以学习者为主体时,教师的角色将发生显著的转变。教师不再仅仅是内容的专家或者课堂上掌控进程的权威,不再仅仅通过提高复杂的传授技能去改善教学。教师主要起指导和促进学习的作用,教师将成为学习经验的引导者、激励者和设计者,教学行为的标志性特征是“促进学习”。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主导者和表演者,而是将聚焦点转向教育教学理论研究、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以及精心细致的课程教学设计。包括对教育理念、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策略的精心设计,以及对学习者的经验分享、互动活动、阅读理解、作业与思考等方面的精心设计。教学设计的目的是要让学习者通过这些活动、思考、分享、讨论等等来学习内容。教师还

要在学习内容时提供引领、指导、解释、批评和鼓励。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指导、评价、综述和建设性的批评将能够促进学习者下一次的学习活动。

三、学习者角色的转变

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教学中,学习者已经习惯于教师主导和控制学习进程,并将教师的权威视为理所当然。多数学习者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只要不被教师点名,他(她)们就不会在课堂上发言,他(她)们都已经习惯了等待教师明确地告诉他(她)们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教育对于他(她)们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强制性过程^[6-12]。

当课堂教学以学习者为主体时,学习者从被动的依赖性的学习者转变为自主的积极的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学习者。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不会自动完成,也不会一下子完成,而是需要一个自我觉醒的逐渐成长过程。笔者认为,就我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以及当前高等教育现状而言,学习者的这种自我觉醒和主动学习、自我管理意识、理念的转变将是一个艰难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比教师角色的转变更为漫长和困难。

四、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内容凝练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1],教学内容与学习者之间的核心关系是通过教学内容的学习和研讨,逐渐构建学习者自己的知识体系、能力体系和情感体系,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也就是说,知识不能简单地给予学习者,而是要通过知识学习让学习者构建起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关于知识的意义。这样的“知识”才能够成为学习者自己的、能够被学习者灵活运用的、能够为学习者提出问题和质疑论点时提供论据的有效知识。

在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学习者完全掌握了基本技能后再去接触教学内容,而是应该鼓励学习者去主动探索、逐步掌握内容,并尽可能地将教学内容与学习者的亲身经

历相联系。无论学习者已经具备了什么水平的专门知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应该积极鼓励他们對教学内容提出质疑与挑战。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内容凝练应该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1]:首先,教学内容应该能够被学习者用作发展知识的基础;其次,教学内容应该能够被用来发展学习技巧。能够帮助学习者掌握学习策略、方式和技能,使学习者在类似科目的学习中可以有效运用;最后,教学内容应该能够被用来提升学习者自我学习的意识,培养学习者处理学习任务的能力和自信心。

五、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策略选择

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策略具有五大显著特点^[1-5]:一是教师利用讲解、板书和各种媒体作为教学手段传授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二是教师是主动的施教者(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三是学生是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者、知识灌输的对象;四是教材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的内容;五是教学媒体则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的方法、手段。显然,这样的传统学习理论和教学策略已经不能够适应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活动。

当课堂教学以学习者为主体时,教学策略的选择将紧紧围绕突出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引导学习者思考、分析、探究,提出发散、扩展、升华学习者思维的问题。因此,教学策略选择的原则是:激发兴趣、促进学习,养成学习者主动学习的意识,逐步形成学习者自我管理的能力。

具体来说,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策略多种多样,而且仍然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然而,一般情况下常见的教学策略大体有以下一些^[1-12]:情境创设策略;探究性学习策略;合作学习策略;自主学习策略;STSE策略(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Environment);科学史教学策略;概念图教学策略;网络探究性学习教学策略。

以合作学习教学策略为例,它更加强调教师与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面对面互动,以及学习者的分组学习。探究式学习教学策略则强调任务驱动下的思考、分析、讨论和探索。而所有

这些教学策略的设计均体现了一个明确的指向,即以学习者为主体。

六、结语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改革已经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这种理念已经提出多年,并在教育界已有较长时间的研究与探索历史。然而,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这样的改革还远远不够深入,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仍然在大学课堂教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尤为突出的是,学习者主动学习、自我管理意识的觉醒任重而道远!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线教师,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不断加快探索与改革的步伐,通过我们不懈的共同努力,积极推动新的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为培养一流创新型人才,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为实现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型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玛丽埃伦·韦默.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 [2] 戴扬, 鄢浩.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化学工艺学教学上的探索与实践[J]. 广东化工, 2018(8): 246-251.
- [3] 王明利, 韩振丽, 范力茹. “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物理》课程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J]. 教育教学论坛, 2018(18): 103-104.
- [4] 卫建国. 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的理念与策略[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4): 66-70.
- [5] 窦祥胜. 以学生为中心的经贸类专业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8(5): 42-44.
- [6] 赖绍聪. 创新教育教学理念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J]. 中国大学教学, 2016(3): 22-26.
- [7] 赖绍聪. 建立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J]. 中国大学教学, 2014(10): 56-61.
- [8] 赖绍聪. 地球科学实验教学改革创新[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0.
- [9] 赖绍聪, 华洪. 课程教学方式的创新性改革与探索[J]. 中

国大学教学, 2013 (1) : 30-31.

育出版社, 2017.

[10]赖绍聪. 如何做好课程教学设计[J]. 中国大学教学, 2016 (10) : 14-18.

[12]赖绍聪. 寓教于学 寓教于研[J]. 中国大学教学, 2017 (12) : 37-42.

[11]赖绍聪. 岩浆岩岩石学课程教学设计[M]. 北京: 高等教

The Learner: the Principal Part in the Classroom

Lai Shaocong

Abstract: The learner should be given the principal status in the college classroom. The three key targets including knowledge, ability and emotion in the classroom could be achieved by carefully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but which must be based on the respect of learner's predominated status. Combined with teaching experiences of 35 years in college, this paper elaborated the learner-centered model in the classroom in the view of educational ideal, role of teacher and learner, concision of teaching content in the classroom and strategy of teach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discussed the issues and reform direction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es in the college classroom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Learner; Principal status

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提升路径研究

王辉耀 苗 绿

摘要: 在全球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迫切需要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不仅有助于满足决策需求,更是提升一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保证。从国际智库实践和经验来看,能够从本土成功走向世界的智库,一般都具备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能够以前瞻性的新思想、新观点为政府决策提供新思路,成为政府决策的有力支撑,同时,重视对智库研究成果的国内国际传播,影响国内国际舆论。结合中国智库现状,文章认为可以从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五个维度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 智库; 研究; 传播; 人才; 国际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 C9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3-0043-06

智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和公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1]。在全球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迫切需要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提供智力支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不仅有助于满足决策需求,更是提升一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保证。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7全球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拥有的智库数量居全球第二,但是,在全球百强智库中,中国仅有7席,并且在前30强中没有一家中国智库上榜^[2]。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七个区域13个地区的政策话语中心里,大洋洲与亚洲智库的话语中心分别为: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日本东京,中国无一城市上榜”^[3]。这些都说明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一流智库还有较大差距。吴璜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智库总体上可以根据国家战略重点选择议题、发出声音,一部分中国智库和专

家已开始在国际社会具有影响力,但其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和国际话语权仍有待提高。中国智库对一些重大国际国内议题,比如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梦的传播,以及对全球治理、环保等全球性议题的设置上,未能积极主动地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声音。一些对中国负面倾向明显的国家、负面事件的高频出现,也表明中国智库在全球新闻中主动设置议程的能力仍显不足^[4]。针对智库国际化问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研究,比如James G. McGann从政策网络与治理角度,总结智库在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建立智库网络化的解决方法^[5]。陈开敏对我国智库国际化转型中存在的资金困难、国际性人才引用机制不健全、独立性不高、国际话语权不高等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建议^[6]。黄日涵提出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借助国际化传播手段积极推动成果输出,塑造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7]。任福兵^[8]、沈进建^[9]等对智库国际化路径进行了探索。本文认为,国际化是全球智库发展的重要趋势,发达国家智库在国际化方面有多

作者简介: 王辉耀,男,四川成都人,博士,教授,全球化智库(CCG)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从事智库发展、中国与全球化发展、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研究;苗绿,女,四川成都人,博士,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研究员。从事智库建设、全球化理论、企业全球化、华人华侨、中国海归与留学发展及国际人才、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思潮研究。

积累, 可以为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 本文基于发达国家知名智库国际化的案例总结出智库国际化的特点, 结合中国智库的实际情况, 提出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的路径。

一、发达国家智库国际化现状与特点

从世界范围来看, 国际影响力卓越的智库集中分布在美欧等发达国家, 根据《2017年全球智库报告》, 欧美智库在全球智库十强中占了九席, 其中美国智库独占五席。除了布鲁金斯学会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智库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分别占据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位。全球智库十强中剩余五席被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比利时的布鲁盖尔研究所、英国的查塔姆社、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及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占据。总体来看, 智库发达与国家发达关联明显, 发达国家智库在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远在发展中国国家智库之上^[10]。发达国家智库国际化可以总结为网络、人才、研究以及传播国际化几个方面。

(一) 网络国际化

“单一存在于某一国家必然会限制其视野, 在当今世界中, 智库的使命既然是要贡献于全球安全、稳定与繁荣, 就需要保持跨国的存在与跨国的视角^[11]。”国际知名智库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聘用海外研究人员, 与国际智库、大学、研究机构等合作建立起国际化的研究网络, 以国际化视角开展研究, 提升国际影响力。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北京、莫斯科、贝鲁特、布鲁塞尔设立海外中心, 通过聘用当地学者及工作人员, 有过当地工作经验的政府官员、商界精英, 凭借他们对政策制定、实施的了解及熟练的语言能力开展研究, 很好地实现了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在海外成立研究中心是国际智库的普遍做法, 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在北京、多哈、新德里设立研究中心。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在北京、上海、纽约、伦敦、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北、首尔、马尼拉、莫斯科等城市设立分公司, 收集相关政治、能源信息, 掌握海外市场动态。

除了设立实体研究机构, 国际智库还积极搭建全球研究网络。美国企业研究所与全球300多所大学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与全球130余家科研机构及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与全球100多个智库建立合作关系。巴西瓦加斯基金会(FGV)与全球约40个国家的16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

(二) 人才国际化

智库研究人员构成的国际化是智库产生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国际知名智库非常重视智库研究人员的多元文化背景, 一般秉承开放的思想, 吸纳世界各地的人才参与智库研究。比如兰德公司的近两千名雇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共掌握世界上的70多种语言。布鲁金斯学会常年提供研究经费邀请各国访问学者到华盛顿总部开展研究工作, 并为学会提交研究报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通过“青年学者项目”(Junior Fellows Program)每年选取10至12名优秀毕业生担任助理研究员。查塔姆研究所成立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学院(The Queen Elizabeth II Academy for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提供国际事务领导力培训, 拓展人脉网络。墨西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社会服务项目”为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提供参与国际会议的途径, 近距离接触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

(三) 研究国际化

国际知名智库的研究课题早已不再局限于国内问题, 他们积极开展对全球性公共议题和他国问题的研究, 以此提高对全球问题的影响力, 确立对全球性议题的国际话语权。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课题涉及亚洲、欧洲、非洲、中国、中东、日本、朝鲜半岛、土耳其、俄罗斯与泛欧亚等地域问题, 还包括宇宙空间安全、人道主义援助、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议题。布鲁金斯协会成立了东亚政策研究中心、李光耀东南亚研究中心、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萨班中东政策中心等开展区域研究并通过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开展关于如何提升全球经济合作、对抗世界性贫困问题的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对象涉及格鲁吉亚、马里、也门、摩

尔多瓦等在内的47个国家和地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开展对灾害预警、灾害援助及重建的研究,并协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成果共享,广泛参与防灾救灾国际议题设置,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威尔逊中心的极地倡议项目(Polar Initiative)积极探讨极地地区环境安全、多边合作、航线、基础设施建设、极地投资等议题^[12]。

相较之下,中国智库研究选题很多缺乏前瞻性且基础性研究积累不足。各智库没有实现很好的研究领域划分、研究领域相互重叠,以致追逐热点、泛泛而谈,浅尝辄止的成果多^[13]。对于影响国家未来战略的议题,难以提出有前瞻性的宏观思考。

(四) 传播国际化

国际知名智库非常重视对研究成果的全球传播,比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与世界知名媒体进行深度合作,包括英国的《卫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法国的《世界报》、德国的《明镜周刊》、比利时的《欧盟观察家》等;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同多个国家的图书馆签订交流协议,将研究论著、出版物分送给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其中该研究所的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年鉴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在互联网时代,国际智库纷纷花重金打造自己的网站,并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实现研究成果的全球传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官网提供英语、中文、法语、俄语、阿拉伯语、德语,兰德公司官网提供英语、中文及阿拉伯语等,以此来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众需求。

二、“五力模型”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从国际智库实践和经验来看,能够从本土成功走向世界的智库,一般都具备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能够以前瞻性的新思想、新观点为政府决策提供新思路,成为政府决策的有力支撑。此外,他们也重视对智库研究成果的国内国际传播,影响国内国际舆论。结合中国智库现状,本文认为可以从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五个维度打造国际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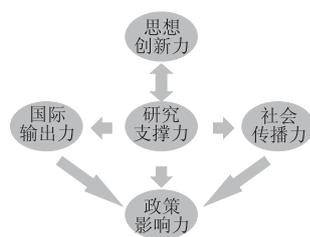


图1 “五力”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一) 思想创新力

“在决策者看来,智库的最大作用就在于产生新思想并以此来改变决策者对世界的认知与反应。新颖的观点可以改变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影响政策优先排列顺序,影响规章制度的制定^[14]。”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火箭技术尚在研究阶段、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还未问世,兰德公司就发表了《试验绕地飞船的初步构想》,有预见性地提出绕地空间站战略构想。美国次贷危机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西蒙·约翰逊提出“银行太大不能破产”问题,为美国政府制定金融机构改革方案提供了重要思路。在中国,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最大短板。体制内智库虽然拥有雄厚的财力和人才队伍,但缺乏灵活性与自主性,倾向于揣摩和迎合决策者的喜好,习惯于完成“命题作业”。社会智库虽然具备独立性与灵活性,但大多数社会智库由于资金、人才等所限,无法及时准确了解政府需求,其思想创新力也必然大打折扣。

中国智库思想创新力的提高,首先,需要在“智力资本”上下功夫,打破国际高端人才流动壁垒,打造“国际旋转门”,创造有利于国际人才流动的环境,吸引优秀国际人才到中国智库工作。同时,鼓励国内优秀学者专家走向世界,比如输送智库研究人员到国际知名智库访问交流。其次,需要为研究人员提供自由、包容的思想环境,为多元声音争鸣提供平台。鼓励并支持包括社会智库在内的多元智库发展,为体制内外的智库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形成平等的竞争机制,保证具有思想创新力的智库可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为新观点、新思想的产生创造土壤。

(二) 研究支撑力

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国际知名智库生存的基

础和声誉的保障。兰德公司认为,高质量研究需要符合10个标准:问题应该清晰准确表述,研究目的应该非常清楚;研究方法应该很好地设计并严格执行;研究应该显示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掌握;充分掌握数据和信息;研究的假定应该明确合理;新发现应促进知识积累并对解决重大政策问题有所助益;政策含义和建议应该符合逻辑,得到新发现支持,并且用适当说明给予透彻解释;报告文本应该易懂,结构清楚,而且语气平和;研究应该引人关注、有用,且与利益方和决策者密切相关;研究应该客观、独立且均衡。只有经过内部审查机制被认为符合这10条标准的研究成果才能以兰德公司的名义按照特定程序呈交委托方^[15]。

本文认为,智库研究成果的优劣与研究定位、研究选题以及研究基础有直接关系。

研究定位首先要基于时代背景,在全球化时代,智库在立足国内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还应加强对贸易自由化、公共外交、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国际重大问题的研究。其次,研究定位需要充分了解自身掌握哪些人力资源、社会资源、信息资源等,在时代的背景下做出取舍,选择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例如兰德能成为军事战略领域的权威智库,与其最初为美国军方提供服务的背景有直接关系。智库的研究选题,不但要关注重大紧迫的现实问题,更应该从战略高度对国家的未来提供前瞻性的宏观思考。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们大概用60%的时间进行长期战略问题研究,40%的时间进行应急课题研究。

丰富且充足的知识资源是智库研究的基础保障。智库的知识资源可以分为显性知识资源与隐性知识资源。其中,显性知识资源主要指来自图书馆、数据库等渠道的信息资料,这些知识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智库自身的历史研究积累,同时也可以来源于外部合作。比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从1968年起就为研究人员建立了图书馆,拥有书籍和杂志大约五万种,主要涉及国际安全、武器装备以及裁军等领域。研究所与世界上400多所研究所签订了交流协议,这使得其收藏的部分资料是独有的,在瑞典的其他图书馆是找不到的。隐性知识资源,主要指智库专家资源。智库不仅需要通过多

种办法吸引专家学者加入智库或开展某种形式的合作,更为关键的是需要通过创造有利于专家研究、交流与探讨的平台与环境,将专家的隐性知识资源转化为显性知识资源。

(三) 社会传播力

Donald Abelson 认为智库“专门创造,重组和推广思想给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大众”^[16]。对智库而言,将研究成果有效传达给受众与完成高质量的政策分析同样重要。智库的研究成果只有在正确的时间传递到正确的人的手中,才能真正发挥引导舆论,教育公众,服务公众,并最终影响决策的作用^[17]。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成立之后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对国家政治活动的影响力相当有限。威廉·巴若第(William J.Baroody)就任总裁后,十分强调使用营销与公关战略,比如每周举办“公共政策论坛”电视节目,并在全国600多个电视台、广播电台播放。几年后,企业研究所从最初很不起眼的一家协调性机构发展成为华盛顿的重要智库。从中国智库的实际情况来看,体制内智库资金由国家财政拨款,主要工作内容为政府委托课题,缺乏将研究成果进行社会传播的动力;很多智库由学术科研机构转型而来,智库研究者们往往习惯于在自己的圈子内部进行交流,缺乏向社会公众传播普及的意识;大多社会智库缺乏传播渠道建设的人力物力。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国内智库还缺乏传播意识与传播能力。

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智库的媒体影响力与国会影响力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媒体影响力大的智库往往容易得到国会的青睐,从而成为国会的“座上宾”。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大众媒体决定报道哪些舆论的时候,现实世界已经被压缩了,在政治生活中讨论哪些议题,以及如何讨论这些议题,很大程度上都由媒体所决定”^[18]。而且,“当前世界各国媒体之间的连通性非常高,一国智库一旦在本国媒体中频繁亮相,也会相应获得其他国家媒体的关注,这就为智库提供了展示实力、开展合作和参与竞争的良好平台”^[19]。所以,智库与媒体应保持良好关系,比如根据每年的出版计划、论坛活动、课题项目等制作媒体计划,提前评估哪些活动或者出版物能吸引媒体的关注,从而做到有的放矢地提前与媒体沟

通。此外,在互联网时代,智库还需认真研究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分析不同的受众需求,适时调整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充分利用博客、微博、微信、推特、Facebook、Youtube、Vimeo等传播手段,构筑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传播平台。

(四) 国际输出力

从国内智库的现实情况来看,包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化智库(CCG)等在内的智库都在进行国际化的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CCG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的宗旨,并确立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国际化智库”的智库愿景。CCG建立了专业化的英文网站,在Facebook、Twitter、LinkedIn等国际社交媒体上开设了账号,在国际上连续出版英文著作,在海外举办高规格国际研讨会,与国际组织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比如在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正遭受日益升级的关税战威胁的背景下,CCG与美国白宫重要“智囊团”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针对中美贸易摩擦课题展开联合研究,旨在深入研究贸易摩擦的根源,检验双方观点的事实证据,寻找共同利益和能打破贸易僵局的解决方案,并为中美两国政府决策提供建设性的智库建言。2018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COSOC)正式批准授予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非政府组织“特别咨商地位”,成为第一个正式取得该地位的中国智库。咨商地位是联合国与社会组织之间正式关系的核心,也是社会组织参与联合国事务和国际事务的重要途径。

但是,根据《2009—2010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调查报告》,在调查进行的两年里,2000多家被调查的智库中,有700余家智库从未有人员出国考察,超过700家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上千家没有开展国际合作项目、没有在国外会议或期刊发表过论文,过半没有外文出版物^[20]。可见,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仍处于初级阶段。

(五) 政策影响力

智库要成为有决策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就需要在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提供独立、专业、可操作、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智库可以在国际上获得重视的基础。外交关系协会提出的“创建

联合国”“遏制苏联”,布鲁金斯学会提出的“马歇尔计划”,美国传统基金会、兰德提出的“扩大北约”“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等建议不但影响了美国政府,更重塑了世界秩序。

据统计,2009—2010年中国所有智库一年间共为政府提供内参24483篇,参加政府咨询会10020次,然而真正对政府决策发挥影响的研究报告和内参却寥寥无几^[21],更不用提及对世界的影响力了。中国智库政策影响力的发挥,需要与政策制定者有更为充分的接触与互动,了解真实的政策需求,这就需要进一步健全公共决策智库咨询的法律法规,真正将决策咨询纳入政府决策机制。此外,打造中国特色的“旋转门”机制,促进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的人才双向流动,将有助于增进智库与政府间的理解与沟通,有助于培养具有学术素养的政策制定者和熟悉政策制定过程、更加务实的智库学者。同时,鼓励和支持具备市场基因的独立社会智库的发展,加强不同类型智库之间的互动合作,激发中国政策研究市场活力和创新力,提升中国智库整体水平,为公共政策提供更多选择空间。

三、结语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需求与制度利好的推动下,国内智库得到了迅速发展,无论是数量和规模上,都有了很大增长,也涌现出了一批拥有国际视野,具备国际经验的优秀智库。但是,总体来看,中国智库还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库还非常少,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所强调的,近年来我国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

智库在社会系统中掌握着相当多的话语资源和话语能力。西方国家的智库及其主导的智库网络运用资金、专业能力以及与跨国政策网的关系等超强资源,跻身于跨国规则制定精英行列,可以被视作一种“软实力”^[22]。发达国家智库在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远在发展中国家智库之上。中国智库需要加强国际化建设,从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五个维度打造具有全球影响的智库品牌,提升国家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 Dickson P. Think Tanks[M]. New York: Atheneum, 1971.
- [2] James G. McGann, 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8.
- [3] 原松华, 建设一流智库提升国家软实力[J]. 中国发展观察, 2012(12): 30-32.
- [4] 吴瑛, 从大数据看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J]. 社会科学文摘, 2015(6): 38-39.
- [5] McGann J G, Sabatini R. Global Think Tanks: Policy Networks and Governanc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6] 陈开敏. 中国智库国际化转型的困境与出路[J]. 现代国际关系, 2014(3): 30-38.
- [7] 黄日涵. 内外兼修 推进中国智库国际化[J]. 决策探索(下半月), 2015(12): 17-18.
- [8] 任福兵. 智库国际化建设的路径选择[J]. 现代情报, 2017(1): 13-19.
- [9] 沈进建, 夏宇, 马岩. 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与未来展望[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 41-46.
- [10] 王辉耀, 苗绿. 大国智库[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11] 李轶海. 国际著名智库研究[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 [12] Wilson Center. About the Polar Initiative. [EB/OL]. (2018-08-14)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bout-the-polar-initiative>.
- [13] 周宏春. 中国智库发展现状与促进建议[J]. 中国经济报告, 2017(11): 41-49.
- [14] 里查德·哈斯, 万雪芬, 何耀武. 思想库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一个决策者的观点[J]. 国际论坛, 2003(6): 70-22.
- [15] 兰德公司关于高质量研究的十个标准[EB/OL]. [2017-02-09] <http://www.rand.org/standards.html>.
- [16] Donald E Abelson. The Business of Ideas: The Think Tank Industry in the USA[M]//D Stone, A Denham. Think Tank Traditions: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5.
- [17] 王辉耀, 苗绿. 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 [18] 王莉丽. 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0.
- [19] [21] 朱旭峰, 礼若竹. 中国思想库的国际化建设[J]. 重庆社会科学, 2012(11): 101-108.
- [20] 苗绿. 探索中国智库国际化路径[EB/OL]. (2008-04-10) http://www.cssn.cn/xspj/zkpkj/201804/t20180410_3922561.shtml.
- [22] Diane Stone. Think Tank Across Nations: The New Net Works of Knowledge[R]. NIRA Review, 2000.

Analysis on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Think Tanks

Wang HuiYao Miao Lv

Abstract: Rapidly rising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urge China to develop think tank of high level and globalization which could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so as to match its ris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think tank with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will not only be helpful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ut serve a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in improving China's discourse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think tanks that successfully move from local to the world generally have high-quality research results, the ability to support government in decision-making with forward-looking ideas and an emphasis of domestic and global spread of their results in a bid to shape public opinion at home and abroad. Combined with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think tanks,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think tanks can be enhanced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ideological innovation, research support, soci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output and policy influence.

Key words: Think tank;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alent;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新视野下的“莫须有”故事

李裕民

摘要:《宋史·岳飞传》记载了“莫须有”故事,大意是说,岳飞被害,韩世忠挺身而出,质问秦桧,有什么证据证明岳飞谋反?秦桧做贼心虚,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莫须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故事流传了八九百年,并被多种岳飞传记采用,人们都信以为真。本文立足时代背景,经过周密考证,确认这故事是人为编造的。真实的历史是,高宗与秦桧合谋害死岳飞,韩世忠在当时高压的形势下,赞同这一举措(见1158年《韩世忠墓志》)。到高宗在位末年,金撕毁和约,兴兵南侵。1163年孝宗继位,为重振抗金士气,需要为岳飞平反。同时,孝宗需要为太上皇高宗开脱罪责,韩世忠之子需要为其父重塑光辉形象。孝宗命赵雄另撰碑文,于是,在岳飞被害三十多年之后的新碑文中有了“莫须有”的故事。

关键词:秦桧;韩世忠;莫须有;岳飞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3-0049-10

凡是稍涉史书者多知道,《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了一个举世瞩目的“莫须有”故事:

“(岳飞)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字数不多,画面感很强,只见在万马齐喑之时,抗金名将韩世忠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质问秦桧:有什么证据证明岳飞谋反?奸臣秦桧做贼心虚,既不愿承认毫无证据,也不敢说铁证如山,躲躲闪闪地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莫须有”^①。韩世忠毫不客气地说:“莫须有”三字,怎么能让天下人信服?

“莫须”本是宋人常用的口头语,“须”表示肯定,“莫”是疑问,莫须二字连用,表示不太确定之意。现代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应的语句,“莫须有”,勉强翻译成现代汉语,大约相当于“莫不是有吧!?”“大概有吧!?”

定罪需要有确凿证据,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定死罪,怎么能令人信服。看了这个故事,不需要任何

文字说明,人们即可判断岳飞之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以致后人写作岳飞的传记,都要写入这一精彩的故事。后世每逢遭受冤屈之事,往往会说:那是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整、被杀的。

故事精彩,从未见有人怀疑。但是,当我们展开视野,发现两个碑文前后矛盾,再看其不同的政治背景,有理由怀疑晚出的“莫须有”故事系后人编造。尤其是当我们对于当时外敌压境、权奸当道、贵胄倾轧,政局险恶的形势有了全面清晰的了解,所谓“惊天大案”就不再神秘。

一、最早记载莫须有故事是淳熙三年(1176)赵雄《韩世忠碑》

《宋史》是元人根据宋代史料编写的。遍查宋代史料,记载此事的书有多种,其中最早记载莫须有故事的是赵雄(1129—1193)为韩世忠撰写的神道碑,全称为《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勳之

作者简介:李裕民,男,浙江桐乡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从事宋史、古文字学、文献学、地方志、历史地理学研究。

碑》（下引此文简称赵碑）。文云：

“岳飞之狱，王不平，以问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王艴然变色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②

淳熙三年（1176），韩世忠之子彦古趁生母去世之机，特地请求孝宗，允许为其父重立新碑。二月十八日，宋孝宗命赵雄撰写。碑文云：

“上纘祚之十五年……二月甲午（十八日）制曰：‘韩世忠感会风云，功冠诸将，可特赐谥忠武……’时王子彦古方居蕲国夫人忧，闻诏感泣继血，即拜疏谢，又拜疏请曰：‘草土臣彦古谨昧死言：臣之先臣世忠……陛下悯念勲劳，固尝爵以真王，锡之美谥，独墓道之石无名与文，惟陛下哀矜，究此光宠……’天子……乃亲御翰墨，大书曰：‘中兴佐命定国元勲之碑’……既又诏礼部尚书臣雄曰：‘汝其铭世忠之碑。’臣雄以谓圣主褒崇元臣，兹事体大，顾末学弗称，且祖讳与王名谥适同，寻上书恳辞，上遽批出，略曰：‘君前臣名，临文不讳，不许辞免。’臣雄于是惶恐奉诏，谨拜手稽首上故太师蕲忠武王遗事。”（同上）

《宋史》卷三四页661《孝宗本纪》：淳熙三年二月，“赐韩世忠谥忠武。”孝宗于绍兴三十二年即位，至此时为十五年，故碑文云：“上纘祚之十五年。”赵雄大约用心写了一个月才完成，随后，宋孝宗命周必大书写，周表示推辞，“四月三日三省同奉圣旨不允”^③。周才接受。据此，赵雄写成碑文应在淳熙三年三月底，周必大书则在四月初。

宋代墓志与碑铭，都是由死者的家属或亲友提供素材，作者据以撰写成文。此文的素材应是韩世忠子彦古（？—1192）提供的。孝宗钦点的作者赵雄，时任礼部尚书，二年后为右丞相。孝宗亲书碑额，碑文则是周必大的书法，必大后来成为名相。有这样大的背景，此文一出，很快流传于世，“莫须有”的故事随即为诸多史家所接受、引用。

从史家求真的角度，有必要一探究竟。我们首

先问：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是韩与秦在路上偶遇时？还是韩世忠到秦桧衙门，或是去秦桧家？不论在何处，在举朝噤声之际，如果确有身据枢密使高位（地位仅次于宰相）的韩世忠质问秦桧之事，那是轰动朝野的大事，立马会传遍京城内外，喜爱写作野史、笔记的宋人，怎么会轻易放过？如果说，秦桧在世时，曾禁野史，人们不敢写，那么在秦桧死前夕，高宗命秦桧与其子、孙同时致仕，并不断清除其党羽，起用被秦桧排挤的人上台，总该没有顾忌了吧！但仍然没有记载？为什么^④？如果岳飞冤案全是秦桧干的，与高宗无关，为什么高宗在秦桧死后乾刚独断时，仍不愿为岳飞平反？难道他甘心情愿为秦桧背黑锅？

韩世忠对岳飞冤案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不妨往更早的史料中去追寻一番。

二、比赵碑早十八年的《韩世忠墓志》却是完全相反的记载

带着问题去观察史料，一个完全相反的记载出现了。那就是绍兴二十八年（1158）孙覿（1081—1169）写的《韩世忠墓志》（以下简称孙志）。志云：

“主上英武，所以驾馭诸将，虽隆名显号，极其尊荣，而干戈鈇钺，亦未尝有所私贷，故岳飞、范琼辈皆以跋扈赐死。惟公进而许国，杖一剑戡除大憝，为社稷之臣；退释兵柄，以功名富贵始终……泽流子孫，书勋竹帛，追配前哲，可谓贤也已！”^⑤

同样是给韩世忠书写的神道碑与墓志，却出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韩世忠：

赵碑的韩世忠，是与岳飞站在一起，与秦桧对立的韩世忠。

孙志的韩世忠，是与宋高宗站在一起，与岳飞对立的韩世忠。

到底哪个韩世忠才是真实的韩世忠？孙志明明白白地举出好坏两类武将：一是紧跟皇上的贤将韩世忠，另一类是被皇上处死的跋扈将军岳飞、范琼。

前一个墓志（孙志），是韩世忠刚死不久，其子彦直（1131—约1194）请大笔杆子孙觌写的。孙觌推辞了七年之久，在韩家不断催促之下才动笔。志云：

“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寝，享年六十三。……彦直等以其年十月庚午，举公之柩，合祔於平江府吴县胥台乡灵岩山秦国夫人之墓。於是寺丞过余请铭。某曰：‘太师咸安王，中兴名将，盖奏乞本朝有名位、能文章名公卿大夫功德者为之辞，以诏后世？余方以罪斥，辞不敢。’距今七年，韩氏书谒无虚月，请益坚。会余蒙恩除罪籍，遂不辞，乃即平日所见闻，志其大者，而系以铭。”

试问与岳飞并列的范琼是什么人？

靖康时，金兵围攻开封，范琼率勤王兵一万人赶到开封救驾，被封为京城都巡检使。“屡与大金战，皆身先士卒，数破之，由是显名^⑥。”其后，开封失守，金虏走徽、钦二宗，立张邦昌为楚帝，范琼摇身一变，积极参与其事，擅杀抗金将领吴革。南宋高宗即位后，范参与平定群贼孙仲等，升任侍卫步军司统帅，这是三支中央军中的一支，居第三位。在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高宗退位时，“与傅书问往来。不肯进兵。张浚十一檄令会合勤王，琼终不进^⑦。”苗、刘兵变失败后，又要求释放参与兵变的主将左言。建炎三年七月，“以范琼跋扈无状，收下大理狱”“赐死。”^⑧将英勇抗金的岳飞与反复无常的跋扈将军范琼归为一类，最清楚地表明韩家的立场，是与杀岳飞的高宗站在一起的。如果真有韩世忠为岳飞鸣冤之事，其子怎么会让墓志中写上相反的一笔，不怕担当不孝之名？这样做能使死者在地下安息吗？

三、“莫须有”故事细节辨析之一： 韩世忠会为岳飞鸣冤吗？

这一问题，需分几个层次来分析：首先，为岳飞鸣冤需付何等代价？其次，韩世忠与岳飞的关系究竟如何？再次，韩世忠与张俊、高宗、秦桧的关系如何？最后，韩世忠的处境是否到了可以挺身而

出的地步？

（一）为岳飞鸣冤需付何等代价？

在岳飞被害时，凡为岳飞鸣冤的布衣、小官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判刑、整死。

例一：建州布衣刘允升上书，论死。

《宋史》卷365《岳飞传》：“建州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下棘寺以死。”

《万姓统谱》卷59：“刘允升名阶，以字行。允升，建州布衣也，闻岳武穆被逮，诣阙上书讼其冤，秦桧大怒，下棘寺论死。”

例二：汾州进士智浹上书，决杖编管，在编管地被整死。

《宋史》卷200：“汾州进士智浹上书讼飞冤，决杖编管袁州。”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绍兴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庚戌，“和浹上书辩岳飞之冤，编管袁州。和（按当作知或智）浹字巨源，汾州人。知书通春秋《左氏传》，有识，性不喜阿随，好直言，岳飞以宾客待之，飞死，浹上书辩飞之冤，事下中书，秦桧怒送袁州编管，袁州官吏以浹取怒时相，全不少假，监系其严，浹不堪死”。

例三：文林郎汤某上书论列，并受害。

元虞集《题岳飞墨迹》：“武宁汤盘，藏其先世文林君军中文书，岳武穆王绍兴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学生上书论备御之策，崎岖兵间，以功致文林之命，观此牒，知文林倡忠义，击叛溃，保乡里，甚直而壮。……盘言：武穆之死，文林上书论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尝题其家之堂曰忠节^⑨。”这位有正义感的小官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至于地位极高的皇族为岳飞说话，亦没有好下场。

最典型的是判太宗正事赵士儻（1084—1153），他是宋太宗后裔，允让的曾孙，高宗则是允让的玄孙，高宗尊称他为皇叔，在宋皇室中地位最高，又曾拥立高宗为帝，平定苗、刘兵变，使高宗得以复辟，对高宗是有大恩的。他接触过岳飞，深知其为人，决定“以百口保飞无他”，然而还没有来得及上奏，风声传到台官耳中，弹劾他“有不轨心”，立即被免职，随后遣送建州居住（软禁），至死不能回杭州。其弟同知太宗正事士樽也受牵连，被免

职^⑩。至此，宋高宗已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

（二）韩世忠与岳飞的关系究竟如何？

韩世忠与岳飞并没有太密切的关系，南宋初各路家军都是在中央军全面崩溃之后，凭借个人的努力，在无数战斗中逐渐发展壮大以后形成的。主要的家军有刘（光世）家军、张（俊）家军、韩（世忠）家军、岳（飞）家军、吴（玠）家军等。各军只听从领头人的命令。各军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谐，皇帝指挥他们协同作战，甚费周折。

绍兴十年（1140）闰六月十八日庚寅，王之道（1093—1169）《上皇帝书》：“……今日之兵，分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分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分隶杨沂中者则曰杨家军，分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相视如仇讎，相防如盗贼，自不能奉公，惴惴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官爵轶于己也^⑪。”

在各家军中，论年龄岳飞最小，论资历岳飞最浅，他比刘、张、韩晚一辈。张比岳大18岁，刘、韩比岳大15岁。由于岳在战斗中屡建奇功，很快升迁到与张、韩平起平坐的地步，这使得张、韩很不快。为了改善与张、韩的关系，岳飞听从参谋薛弼（1088—1150）的建议，多次写信通好，但未见效果。后来，在绍兴五年（1135）平定杨么之后，特地将最好的战利品送给他们，韩世忠领情了，改善了关系，而张俊依然如故。岳飞也不再低三下四，与张俊的矛盾加深了。对此，薛弼之侄薛季宣（1134—1173）有如下的记载：

“初，岳侯以列将拔起，时张俊、韩世忠等已皆建立功效，至大官，内不能平。伯父劝岳屈己下之，书凡三十七通，俱不之答。岳破么贼，遣大将俘献楼船各一，卒徒战守之具毕备，韩始大说定交，而张忌之益甚。岳名日盛，幕中之轻脱者教岳勿苦降下，于是始隙。”^⑫

岳飞与韩世忠的关系好了，但他们各在自己的驻地，并不在一起共事，谈不上有多密切的关系，远没有达到结义兄弟生死与共的地步。这从以下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岳飞连韩家军大概有多少人都不清楚。直到绍兴十一年六月，去楚州查看军籍时，才惊讶地发现，韩家军才三万人，比岳家军少得

多。如果关系非常密切，怎么连这一点最起码的信息都不了解呢？

《要录》卷140：绍兴十有一年夏四月癸未，“张俊、岳飞至楚州……飞视兵籍，始知韩世忠止有众三万，而在楚州十余年，金人不敢犯，犹有余力以侵山东，可谓奇特之士也。”

（三）再比较一下，韩世忠与岳飞、张俊之间的关系。

不少学者认为韩、岳是一派，张俊与秦桧、高宗是另一派，前者主战，后者主和。这样的认识太简单化了。张俊与秦桧、高宗的关系好，是事实，但一般人不明白的是，韩与张的关系其实远比与岳的关系好。有一事为证。韩世忠的次子彦朴娶张俊的女儿，张俊的第五子子仁娶了韩的女儿，他们是双重儿女亲家。

周麟之（1118—1164）《张循王（俊）神道碑》：“四女：……次适直徽猷阁韩彦朴^⑬。”孙觌《韩世忠墓志铭》：“四男子：……彦朴，右奉议郎、直显谟阁。”

孙觌《韩世忠墓志铭》：“八女：……右承事郎、充秘阁修撰张子仁，其婿也。”周麟之《张循王（俊）神道碑》：“五男：……子仁，秘阁修撰。”

官员间的婚姻往往是政治联姻。儿女的婚姻都由父亲决定，没有韩与张的亲密关系，不会成为双重儿女亲家。而韩与岳则毫无婚姻关系。

以上可知，从关系密切程度上讲，韩世忠与张俊的关系远比与岳飞的关系密切，张俊紧跟高宗、秦桧的立场不可能对他没有一点影响。

（四）韩世忠的处境是否到了可以挺身而出的地步？

从当时韩世忠面临的处境看。他正处于如履薄冰的状况。宋廷对岳飞痛下杀手，有杀鸡儆猴之意。谁最可能是“猴”呢？三大帅中，张俊最受朝廷信用，可能为“猴”的除了韩之外，别无他人。消除军阀割据的隐患，乃是宋初一开始就实行的家法，略有不同的是，北宋初主要对象是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和亲戚，所以采取的是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手段。南宋初面对的是各路家军，私家军队是军阀割据的基础，对付他们就不会那么手软了。

宋高宗对他们是又利用、又警惕，因为中央禁

军已垮，不能不靠各路家军维持政权，当生存环境好转，朝廷就开始考虑收拾，首先向刘家军开刀，绍兴七年（1137）免去刘光世（1089—1142）军职，派文臣吕祉（1092—1137）取代，不料部下不服，酈琼杀死吕祉，带5万多人叛变投敌。摆在东线的三路家军，一下子损失了三分之一。朝野震惊。高宗只好收手。

到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朝廷又开始考虑解决家军问题，这一次，换了高明的花招。四月，晋升三大将为枢密使、副使，使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开地方到中央，实际上是剥离他们与部下的联系，同时将三个家军一分为二，分成六支，由资历稍浅的偏裨掌管，直属中央。四个月后就动手了。八月，罢免岳飞。九月，岳飞部将王俊告发岳飞爱将张宪，十月十三日逮捕张宪、岳飞入狱。二十八日，罢免韩世忠。这本身已是对韩的警示。十二月，岳飞被处死，同时严惩为岳飞鸣冤者。此时，韩如若站出来为岳飞说话，势必成为岳飞第二。因为各路家军成分非常复杂，既有抗金志士，也有见利忘义的小人。早在绍兴九年（1139）就有韩世忠的部将温济公然告韩的黑状。只是时机不到，温济卖主求荣没有成功。韩世忠要求处死他，朝廷也没有答应。只将温济贬斥了事。《宋史》卷29：绍兴九年九月丙申，“以威州防御使温济告韩世忠阴事，勒停，南剑州编管。世忠又奏欲杀之，诏移万安军。”朝廷此举，或许有预留一手的考虑。

现在形势大变，韩稍一不慎，再出一个温济式的小人，很难想象，那会是什么结果，韩岂能不考虑？他选择了“明哲保身”（赵碑），主动辞职，然后“杜门谢客，绝口不论兵……平时将佐部曲，皆莫见其面”。（孙志）不敢与部下见面，还不是因为怕有人诬告他与部下合谋叛变，成为岳飞第二？

四、“莫须有”故事细节辨析之二： 假定韩世忠会为岳飞说话，他该找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弄清制造岳飞冤案的主角究竟是谁？宋代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讲法治的朝代，它不像秦始皇想杀宰相李斯，自己下一道命令

就办了，明朱元璋也是如此，下一道命令就将成千上万的大臣及其下属亲人杀了。宋代讲究法治，即使是有意整人，也得走法定的程序。像岳飞这样的大案，在宋代叫做诏狱。其程序是：

第一步，由皇帝下诏，组成特别法庭，御史中丞牵头，会同大理寺官员审判。

第二步，御史中丞上奏审判结果：罪行，证据，判决。

第三步，皇帝批示。

皇帝的批示是最后的裁决，一般是从轻发落，或同意，极少有加重发落的。从下诏到最后裁决，皇帝掌握着主动权，案子对与错，主要责任人应是皇帝。

具体到岳飞案，下诏并作最后裁决的是宋高宗，在幕后筹划的是秦桧，站在第一线审讯逼供的是万俟卨（1083—1157）。显而易见，制造这起冤案的首犯是宋高宗，主犯是秦桧。或以为宋高宗是傀儡，这是低估了宋高宗，如果是傀儡，只要画圈就可以了，但是当万俟卨呈上判决意见时，他作了如下更改：

对岳飞，由“决重杖处死”，改为“赐死”，让他死的稍微体面些，表示了一点皇恩，但本质上仍然是死。可是对岳飞之子岳云，却无限的加重，由“徒三年”改为“斩”^④。

显然他生怕三年后岳云活着出来，万一率领岳家军与他作对，事情就难收拾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痛下杀手。这一更改说明他不是傀儡，他在充分运用最终裁决权。再说，事过十几年，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宋高宗在其临死前下诏，让秦桧祖孙三人同时致仕，并清除秦党，起用被秦桧排斥的官员，将权力全部收到自己手中，如果他真是傀儡、如果冤案完全是秦桧办的，此时岂不是给岳飞平反、表自己清白的绝佳机会？然而他没有做，直到绍兴三十二年退位，依然没有做，这不是清楚地表明冤案是他们共同制造的吗？区别只是站的位置不同，他在前台下圣旨，秦桧在幕后出点子。

如果韩世忠真要为岳飞说话，就得找高宗，虽然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历史上也有稍见效果的事例。宋神宗听说赵世居长得像赵匡胤，可能

会影响他的皇位，于是制造了一起冤狱，说世居企图谋反，赐死，理由是与其有交往的几个人，有谋反的意图，罪证则是随意拼凑的。其中一人李士宁，罪状两条：一是送给世居一把雕有龙纹的宝刀，二是赠世居母一首诗。前者纯属牵强附会。后者最终查明，诗是从《宋仁宗御集》中抄来的。李士宁是王安石的座上客，王对他的为人很了解，便与神宗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最终神宗因为要依靠王安石搞改革，不得不让步，李士宁由“当诛”改判为流放^⑤。

韩世忠身为枢密使，官位仅次于宰相，真要为岳飞说话，是有机会的。按宋朝决策层的议事规则，有关政务事，皇帝与宰相、参知政事商讨，军事则与枢密使、副商议，商议毕，大臣有事可以单独留下，与皇帝谈，称之为留身奏事。由于是两人之间的交换意见，即使皇帝不爱听，不接受，后果也不至于太严重，更不会下狱。但韩世忠没有这样做，他怕引火烧身，十月十三日岳飞下狱后，他一看形势不妙，接连上奏辞职，于二十八日归家。此后，自称清凉居士，优游林下，为了避免岳飞的下场，他不与旧部见面，不问世事。

墓志：“公受命已，杜门谢客，绝口不论兵。时跨一驴，从二三童奴负几杖，操酒壶，为西湖山水之游，解衣藉草，命酒独酌，兴尽而返。平时将佐部曲，皆莫见其面。”在杭州游览之时，还留下了题名：“绍兴十二年（1142），清凉居士韩世忠因过灵隐，登览形胜，得旧基，建新亭，榜名‘翠微’，以为游息之所，待好事者。三月五日立，男彦直书^⑥。”事在其辞职后数月。可与墓志互证。

辞职以后是否还可以为岳飞说话呢？那只有上书了，这可是比留身奏事危险得多的选择，韩世忠没有那么傻。从史料看，韩并没有上奏。

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的最后几天，竟然出现了这样一幕：秦、韩两家喜事连连，岳飞一家倒了大霉。真个是两家欢喜一家愁。

《要录》卷143：绍兴十有一年（1141）十有二月戊子（二十四日），“直祕阁、新知温州秦梓试祕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梓、桧皆引嫌辞，

上不许。右承务郎韩彦质、彦朴并直祕阁。二人皆世忠子也”。二十九日，岳飞父子被处死。全家被流放。

秦桧之兄秦梓（？—1146）刚任命知温州，还没有到任，就升至中央当官。韩彦质、彦朴是韩彦直之弟，是年韩彦直才12岁^⑦，其弟不过十岁或不足十岁。对比一下，北宋时杨业为国捐躯，宋太宗恩赐其子官，其中最小的两个儿子因为不足十五岁，按惯例都没有赐官。现在韩世忠尚健在，并没有为国捐躯，两个幼小的孩童却得到分外优厚的待遇，而且与岳家的悲惨命运几乎同时出现，如果韩世忠在岳案的立场上，不与高宗、秦桧保持一致，能有此等好事吗？

五、“莫须有”故事细节辨析之三： 韩世忠如果质问秦桧，秦桧会回答“莫须有”吗？

前面已经说过，从法制的程序上，审判之事不由秦桧结案，最后批示则在皇帝手里，此事找他没有道理，他完全可以不管。考辨至此，本来可以画句号了，不过，为了说得更透彻一点，不妨再推论一下，假如韩世忠敢于质问，秦桧会不会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按：其第一句话有点答非所问，岳飞的罪状主要是指斥乘舆、抗拒诏命。至于岳云与张宪书，乃是用来定张宪与岳云之罪的。秦桧怎么会避开岳飞之罪，去谈岳云与张宪书呢？

《要录》卷143：绍兴十有一年十有二月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飞以众证坐尝自言已与太祖俱以三十岁除节度使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敌犯淮西前后亲受札十三次，不即策应，为拥兵逗留，当斩。閩州观察使、御前前军统制、权副都统张宪坐收飞、云书，谋以襄阳叛，当绞。”

王明清曾看过这案卷，他在《挥麈录余话》卷2中说：

“明清入朝，始得诏狱全案观之，岳侯之坐死，迺以尝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以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师者凡十三次，以为抗拒诏命，初不究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之义。又云：岳云与张宪书，通谋为乱，所供虽尝移贼，既不曾达，继复焚如，亦不知其词云何，且与元首状了无干涉，锻炼虽极，而不得实情，的见诬罔，孰所为据，而遽皆处极典。”

秦桧的第二句话“莫须有”，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他说话非常果断，决不会吞吞吐吐地说句模棱两可的话。其子秦熺写的相关史论，代表了他的思想。

“史臣秦熺等曰：……十一年果竭众以犯淮西，必欲以全取胜，时遣三大将领兵进击，而岳飞阴有异谋，迁延顾望，拒命不进，……岳飞拥重兵据上流者累年，稔成罪衅，日图反叛，至是皆暴章首告继踵，逮核实于天狱，悉得其情，逆状显著，审谳无异，飞与子云及其党张宪皆赐死^⑧。”这里的用词：“核实”“悉得”“显著”“无异”。无不斩钉截铁，不留余地。

如果韩世忠真的质问过秦桧，并且当场勃然大怒，秦桧会就此善罢甘休吗？不可能。这里举两个秦桧亲信的例子即可证明。

其一是何铸（1088—1152），他在任御史中丞时，秉承秦桧的旨意弹劾岳飞，免去岳的枢密副使之职^⑨，十月高宗命他主审岳飞案。此人还是有点良心的，审了一个多月，发现构不成重罪，一直拖着，不愿按照高宗、秦桧的意图结案。此时，高宗、秦桧感到为难，免他的官找不到借口，于是想出一招，提拔他为签书枢密院事，让他出使金国，处理和议事，腾出御史中丞的位置，让更中意的亲信万俟卨担任，这样审判权就转移到万俟卨身上。

果然，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万俟卨搞定了这一冤案。第二年，万俟卨以何铸“党恶”为由进行弹劾，何铸仅仅当了八个月的执政官，便下台了^⑩。万俟卨因此晋升为参知政事，继续充当秦桧整人的打手。有一次，万俟卨出使金国，返回后，秦桧让

他将金人赞美自己的话转达给高宗，万俟卨一看是秦桧自己编的，大概觉得太肉麻了，没有照办，秦桧立马指使御史中丞李文会弹劾，免去其职^⑪。这条走狗只当了一年半执政官，就回了家。

这两个亲信一直为秦桧效劳，从来没有与主子发生过正面冲突，仅仅因为稍微跟得不紧，马上摘掉乌纱帽。要是韩世忠真的敢质问秦桧，还敢勃然大怒，那恐怕天大的祸患就会降临头顶。然而，在岳案期间及以后出现过什么灾祸吗？没有，完全没有。有的只是韩世忠的两个幼儿与秦桧之兄一起升官的美事，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反证吗？

这里再举一个韩世忠非常敬畏秦桧的例子。

《东南纪闻》卷1第10条：“汪勃（1088—1171），歙人也。仕州县，年踰六十，犹未调，官满趋朝，试干秦桧，求一近阙，秦问其已改官乎？曰：未也。有举者几人？曰：三人耳。于是遣人导之往谒张、韩，时二公皆以前执政奉朝请，闻有秦命，倒屣出迎，执礼甚至，勃得改秩，秦后擢真台省^⑫。”

《挥麈后录》卷11：“绍兴壬戌，罢三大帅兵柄，时韩王世忠爲枢密使，语马帅解潜曰：虽云讲和，敌性难测，不若姑留大军之半于江之北，观其衅。公其爲我草奏，以陈此事。解用其指为札子，韩上之，已而付出，秦会之语韩云：何不素告我而遽为是邪？韩觉秦词色稍异，仓卒惶恐，即云：世忠不识字，此乃解潜为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贬潜单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竟死岭外^⑬。”按：此条记载不完全准确，但说明在人们心目中，韩世忠是惧怕秦桧的。

为什么会如此敬畏、惧怕？朱熹说得好：

“诸将骄横，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疎，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⑭。”

直到临死，韩世忠仍对秦桧有恐惧之心，他知道，自己一死，按惯例，皇帝要到家里临奠，他留下遗嘱，一定要恳辞。果然，不出他所料，秦桧派人威胁韩家，必须恳辞。韩家怕有后患，照办了。

赵雄《韩碑》：“属纆之际，神爽益清，冠佩脩然，合掌而逝。有诏择日临奠，桧遣中书吏韩城

以危语胁诸孤，令必辞，诸孤亦缘王遗意，不敢屈勤君父，上表恳免至再，太上龟勉从之。”

此表，是以韩世忠妻子名义上的。《宋会要》礼四一之二三：“绍兴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故太师、通义郡王韩世忠妻魏国夫人茆氏（壮）[状]：‘亡夫世忠身薨，恭闻车驾将欲临奠，经由道路窄隘，不敢仰勤清跸临幸，乞赐寝免。’诏依所乞。”

这就不难理解，韩世忠死后，为什么还要在墓志中对岳飞案表态，明确与高宗立场保持一致。

六、是谁编造了莫须有的故事？

凡作伪者都是为了得到好处，因此故事的编造者必定是得益者。此举的得益者有：

韩世忠家属：韩世忠在当时没有站出来为岳飞说话，怕殃及自己和全家，这是可以理解的。韩世忠死后，其子请孙覲撰墓志，竟然赞美高宗英明，处死跋扈的岳飞，当时，大概觉得这是多数官员共同的想法，他们一家因为立场站在高宗一边而得到好处。但是，当孝宗为岳飞平反之后，韩家就尴尬了。韩、岳都是抗金英雄，韩怎么能这样对待岳飞呢？这太有损韩的形象了。现在编出这么一个故事，一举两得，一方面，韩的形象全变了，另一方面，害岳飞的责任全归到秦桧头上，他们得以平息孙覲撰墓志的影响，树立韩世忠抗金英雄的正面形象。从与岳飞对立转变为站在岳飞一边共同对付奸臣秦桧。韩世忠的后代也会因此而沾光。为此，家属不惜以重金酬谢撰者与书写人。墓碑的素材历来都是死者家属提供的，他们应是故事的编造者。此碑一出，将孙志谴责岳飞跋扈之说掩盖掉了，只有岳飞的孙子岳珂还记住这笔账，在《金陀粹编》卷23专门批判其孙志跋扈之说，为祖辨诬。

宋孝宗有雄心大志，想恢复中原，因此为岳飞平反，以鼓舞士气，但这样一来，太上皇宋高宗面子就过不去了，孝宗虽非高宗所生，但毕竟是高宗立他为太子而后继位的，与亲父无异，按儒家的传统，理应为尊长避讳，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现在莫须有的故事一出，将冤狱的责任全部

推给秦桧，这个问题就全办妥了。秦桧本来就是个大奸臣，害人无数，将全部罪过堆到他头上，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孝宗看过赵雄碑文非常满意，特意下诏命周必大书写，周推辞，孝宗再下诏，周不得不接受，下足了功夫，到八月交卷，二十三日奉圣旨交给韩家，韩世忠子彦古上劄子，奉送润笔费“二百金器”，周必大上奏推辞，孝宗“御笔批依例收受，不须恳免”^⑤。孝宗对此小事如此上心，一再下旨，不难看出他兴奋之情已难以言表，他是故事的得益者。不过，依他的身份当然不至于下圣旨造假，但他的心事一定会在赵雄面前有所表示，让他去细细体会。

赵雄得益甚大，他在奉孝宗之命，撰成此文后，好事不断。同年七月，即跳过两个台阶，由礼部尚书直接升为签书枢密院事。四年十一月升同知枢密院事。五年六月又升参知政事，十月晋升为右丞相。他应当参与了故事的编造。故事中用了宋人俗语“莫须有”，显得更像是真的对话，显然是精心策划的结果。

七、结语

韩世忠质问秦桧，秦桧回答莫须有的故事，完全是杜撰的，编造者就是韩世忠的儿子彦古和碑文的作者赵雄。

韩世忠与岳飞都是抗金英雄，他们在抗金上是一致的，两人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但不算太密切。韩世忠与张俊则是双重的儿女亲家，关系密切。韩、张与高宗的关系都相当好，岳飞则比较疏远。张俊与岳飞的关系不好，最后对岳飞落井下石。秦桧与宋高宗在与金议和与收兵权上完全一致。宋高宗的目的是消除内忧外患，稳坐宝座。秦桧则是通过掌握台谏势力，为高宗消除忧患，排除异己，操控朝野，实现权相梦。他们通过制造岳飞冤案，为实现各自的目标扫清障碍。

岳飞被害，抗金派受压，韩世忠为明哲保身，在岳飞案上与朝廷保持一致，所以在最早的墓志中写下了赞美高宗处死岳飞之词。

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撕毁和议，南下伐宋，抗金派重新抬头。但岳飞冤案的副作用非常严重，不

仅岳家军军心涣散，举国将士均受影响，将军也不敢尽全力，因为立功升官，难免遭忌，落得岳飞的下场。金的南侵，因金国内乱而暂时告一段落，但谁能担保不会再来呢？岳飞冤案不平反，谁为朝廷出力呢？高宗自己作了亏心事，又死要面子，不愿承认与纠正，于是将宝座传给孝宗，自己作一个逍遥自然的太上皇。

孝宗有恢复中原的雄心，他需要岳飞那样的抗金英雄，因而积极为岳飞平反，然而平反以后，高宗的面子需要寻找合理的办法照顾。而岳飞的平反，使韩家非常难堪，因而乘着为韩世忠作新碑之机，韩彦古与赵雄合作编造了莫须有的故事，既使韩世忠保持完美的形象，也让高宗盖住了颜面。

莫须有的故事编成，社会影响极大。碑竖在韩世忠墓前，而碑额乃宋孝宗亲笔题写。碑文的作者与书写人都是先后当上宰相的名人，此碑所记自然被看作最真实的信史。于是“莫须有”的故事被许多史书所采用^⑧，最后写入了《宋史》。

此碑文为所有涉及高宗与秦桧共同干的坏事定了调：那都是秦桧干的，与高宗无关。以后许多著作多依此执行。事实可以改编，只要编得高明，有权威撑腰，就会变成信史。有这个榜样摆着，于是新的故事一个又一个地被好事之徒编造出来。

如在岳飞墓前应该跪的是高宗和秦桧，却成了秦桧与王氏。智商不高的王氏被升格成比秦桧还阴险的狐狸，高宗与秦桧密谋转换成秦桧与王氏，密谋的地点由西窗变为东窗，最后，经过上百年的加工，一个完整版的“东窗事犯”的故事终于出笼，并且流行开来，成为新的掌故。历时三个月的诏狱，公开下的诏书：赐岳飞死，却变成秦桧一个纸条付狱吏处死。历史就这样被改写，人们依据这样的“信史”，去评头品足，去抒发感情，去编写符合时人胃口的新的史，后人就这样被愚弄着。

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假货太多了。尤其在社稷鼎革期，政治斗争残酷复杂，冤假错案扑簌迷离。史学工作者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有广阔视野、敏锐的目光，洞察史料的诡异，运用严谨科学的方法，追寻历史的真相。

注释

①有人认为“莫须有”应作“必须有”，理由是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58记此事，作“必须有”。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王瑞来点校本）亦作“必须有”。按：此说非是。其一，熊克书作于淳熙七年（1180）至十六年（1189）间，徐自明书作于嘉定九年（1216）至十一年间，均晚于赵雄碑，理应以最早出处为准。其二，《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系清抄本，熊克另一部书《中兴小历》，四库全书馆臣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记此事作“莫须有”。《宋宰辅编年录》四库全书本亦作“莫须有”。从版本上看，其证据本身尚存在问题。其三，南宋岳珂《金佗粹编》卷8、卷2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刘时举《宋续编年资治通鉴》卷5、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8、《宋史全文》卷21上等书均引作“莫须有”。岳珂还专门解释此语云：“则是桧亦自知其无矣。”其四，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如果是“必须有”，意思是“一定有”，那就是铁证如山，与下文“三字，何以服天下”完全脱节了。

②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3。

③周必大《文忠集》卷123《辞免书韩世忠神道碑札子》。

④就现存的宋人笔记而言，自绍兴十二年（1142，岳飞死）至三十二年（1162，高宗退位）约有40多种，孝宗隆兴元年至淳熙二年（1163—1175）还有10多种，没有一点“莫须有”故事的蛛丝马迹。

⑤孙覿《鸿庆居士文集》卷36。又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18。

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29《姓氏录叛逆传》。

⑦《三朝北盟会编》卷129。

⑧《宋史》卷25。

⑨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0。

⑩《三朝北盟会编》卷20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卷164，《宋史》卷365《岳飞传》，周南《山房集》卷5、卷8。

⑪《三朝北盟会编》卷202。

⑫薛季宣《浪语集》卷33《笺行状》。

⑬周麟之《海陵集》卷23。

⑭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⑮参李裕民《宋神宗制造的一桩大冤案》，《庆祝邓广铭教

- 授九十华诞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 ⑰《六艺之一录》卷110。《十二硯斋金石过眼录》卷17，沈懔彪《续修云林寺志》卷7，光绪刻本。
- ⑱《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第一百八人韩彦直（1132—？），字子温……年十八，六月二十八日生。”
- ⑲《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戊子。
- ⑳《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八月甲戌。
- ㉑《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丙寅。
- ㉒《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二月丙午。
- ㉓《要录》卷148：绍兴十有三年三月丙辰，“左宣教郎汪勃为太常寺主簿。勃，黟县人也。”注：“绍兴二十八年六月庚寅，叶义问奏：勃为建德县丞，赃污不法，为邑人所讼，秦桧与之有旧，监司庇之，寔得美官。”《要录》卷151：绍兴十有四年五月己未，“御史台检法官汪勃、主簿黄应南并为监察御史。”“后擢真台省”当指为监察御史。据此，秦遣人往谒张、韩，应在绍兴十四年五月前不久。
- ㉔此条末注材料出处：“张子韶云。”子韶名九成（1092—1159），号无垢居士、横浦居士，因反对议和，为秦桧所恶，谪居南安军。著有《中庸说》《孟子传》《横浦日新》《横浦心传录》《唐鹳》《横浦集》等书。《宋史》卷374有传。
- ㉕《朱子语类》卷131。
- ㉖周必大《文忠集》卷123《辞免书韩世忠神道碑札子》《缴书神道碑札子》《辞免润笔札子》《谢札》。
- ㉗淳熙七年（1180）至十六年（1189）间，熊克（1118—1190）《中兴小历》卷29、《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58。嘉泰年，岳珂《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五，卷24吁天辨诬四。嘉定元年（120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嘉定九年（1216）至十一年间，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约淳祐四年（1244），刘时举《宋续编年资治通鉴》卷5。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8“岳飞”。南宋末，《宋史全文》卷21上。

Analysis of “Mo Xu You” or Trumped-up Charge on A New Horizon

Li Yumin

Abstract: “Mo Xu You” or trumped-up charge has to do with a story recorded in Legend of Yuefei of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It happened when the general of Song Dynasty Yuefei was killed. Another general Han Shizhong stood out to ask Qin Kuai, a disloyal minister, for certain evidence verifying Yuefei’s conspiracy. The latter replied with “Mo Xu You” which means trumped-up charge. Han refuted, “how could the three characters quell the people’s dissatisfaction?” The story has been taken for granted due to the spread of over 800 years and constant adaptation by several biographies about Yuefei. With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mind, this article confirmed it as an artificial fabrication by means of a thorough research. The truth is that Yuefei was died in the plot of Emperor Gaozong of Song and Qin Kuai and meanwhile Han Shizong showed agreement to the plot in the unfavorable situation (see epitaph of Han Shizong of 1158). At the end of Emperor Gaozong of Song’s reign, the Jin State tore up the treaty and invaded the region ruled by Southern Song regime. In 1163, Emperor Xiaozong of Song took the crown and gave Yuefei a rehabilitation out of enhancing morale and at the same time, of disculpating Emperor Gaozong of Song and of reshaping the image of Han Shizong. And Emperor Xiaozong of Song ordered Zhao Xiong to rewrite the epitaph in the tomb of Han Shizong. Therefore, “Mo Xu You” occurred in the epitaph in the tomb of Yuefei after his death of over 30 years.

Key words: Qin Kuai; Han Shizong; “Mo Xu You”; Yuefei

宋代历史述论

周生春

摘要: 本文试图借助社会变迁之契机,运用比较的方法,超越特定时空对人的思想的限制,来审视宋代的历史。就中国历史的进程而言,宋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传承、创新与重塑的关键时期,其所取得的成就许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宋代社会为其所认知的天下创立、提供了各国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以维系这一历史与地域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使其得以生存、发展与延续近千年。宋代思想与精神实力的先进和强大超乎今人的想象。其文化在思想、心态、制度与氛围均呈现包容宽松的特点,同时,又极其注重对自由的内在自我约束,和无所不在的礼法等外在规范的制约。宋代文化不仅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而且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深思的是,这一当时最繁荣发达的文明,因缺乏天下最强大武力的保护而亡国亡天下,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与时机。

关键词: 宋代历史;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世界文明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3-0059-13

对一般人而言,历史就是人们对过往有选择的叙述与诠释。不过,因生活的时代、地域即时空及人的价值观、立场、胸怀、境界、视角和学识的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与见解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往往会自觉地认识到人的这种局限,有意识地试图摆脱上述影响,努力突破自身的局限,追求历史真谛。诚如司马迁所说,其撰著《史记》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从全球而不是某些国家或地区,从历史的整体全貌而非某些部分与领域,从非功利的多元价值的视角、立场,以同情的理解的心态,从历史的全过程而非某些时段出发,注重新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运用整体、动态和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历史。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拟通过宋与中国历朝历代以及宋与10—13世纪其他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军事、社会各领域的比较,来认识和

反思宋代的历史。

之所以选择宋代,一方面是因为宋代经济上的繁荣与自由,政治上的宽松开明与优待士人,思想上的融汇、创新与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文化上的多元融合与创新,科技上的先进发达,军事上的内敛与不够强大,社会的包容与凝聚内敛,无一不吸引了当代中国人的注意,引发了人们对宋代历史的兴趣与深思。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融汇、创新、成就斐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

就中国历史而言,如果说先秦是开荒、播种、耕耘和成长的季节,两汉是开花结果收获的秋季,那么汉至隋唐就是又一个开拓、耕种与成长的季节,宋代则是第二个收获累累硕果的秋季。

以下即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军事与社会等方面分别概括宋代的成就。所论如有不当,尚祈诸位方家不吝赐正。

作者简介: 周生春,男,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浙江大学晨兴文化中国人才计划责任教授。从事宋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历史文献、中国思想史研究。

一、宋代的政治

秦代确立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在秦以后延续了两千多年，可谓影响深远。在这一制度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宋代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而且形成了值得今人深思的鲜明特色。

如果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②，那么宋代的政治便是建立在尊崇“祖宗之法”的基础之上。其出发点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以文驭武，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注重公议，“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收敛藩镇，权归于上”，通过分权与制衡，防范宗室、外戚、宦官、武将与地方势力，目的在于保证政局与赵宋皇朝统治的稳定^③。

具体而言。在“祖宗之法”的基础之上，宋代的政治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点，从而开创了以文驭武之先河，最终结束了出将入相的历史传统。

宋太祖为以文驭武，选拔人才而开科取士，其目的即在于“得贤以共治天下”^④。多年的选贤共治养成了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钱穆《国史大纲》第558页）。范仲淹的先忧后乐之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之句，均体现了此种精神。这种自觉在北宋中期即成为共治的思想基础、动力与君臣上下的共识。当文彦博反对神宗“更张法制”，强调君主“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时，神宗即表示完全认同，并强调士大夫“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⑤。

宋代政治的特点之二是注重公议。公议即公众依天理评议，也是制约皇权的利器。按陈亮记载，仁宗云其施政“若自朕出，——不若付之公议”^⑥。尤袤曾以“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于公议不允之人”为由，反对光宗公权私用^⑦。按密歇根大学包华石教授的研究，直至18世纪早期，英国尚无共议的概念，因而不能正确翻译这一词。

注重公议与强调共治，尊崇祖宗之法等共识的形成，是士大夫阶层，尤其是史官群体选择、叙述与诠释的结果。宋重馆阁，史官清要，掌著述史

评，影响很大。尊重史官一方面促成宋代公私史学的盛行，另一方面则使其成为公议的重要主体，参与创建了上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识。

宋代政治的特点之三是从公议、共治出发，强调天下治理的公共性，即“天下道理最大”^⑧。真德秀指出，“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根本于人心。万世犹一日者，公议也”“公议即天道也”^⑨。道理即天道、天理。天理在人心，公议即天道。人心包括君心与民心。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点，人心以民心为主，顺民心即顺天理。所以朱熹认为“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⑩，指出正君心以顺民心，方合天理。尧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得民心者得天下。于私而言，为长保祖宗基业，皇帝亦须正己私心以顺民心与天理。公议即天道，公议的主导者是士大夫。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唯有顺从公议，方合乎天道。

天下道理最大即是公议、民心最大，这是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共识与思想基础。天下道理最大之说其实是将民心、公议置于君心之上，强调天下为公，公权大于君主之私权，并将其视为天下治道的核心与君臣上下的共同价值。

综上所述，祖宗之法、共治与公议均为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天理、天道的体现，如果说祖宗之法犹如宪法，共治与公议则为权力的架构与运作方式，三者共同构成了宋代政治的核心与重要特色。

宋代政治的特点之四是推广科举，并使进士科成为科举制的主流，进士从此成为政治上的主导力量。自宋以降，科举出身、进士为主的士人代替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成为政治上的主导力量，和连接上自庙堂，下至江湖，国家与社会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宋代政治与社会的上层与基层的共识与凝聚力因之大大增强。

宋代政治的特点之五是开明宽松，仁厚包容。吴渊云宋太祖“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⑪。宋“自祖宗以来，多尚宽仁”^⑫。楼钥云“皇朝以忠厚为家法”^⑬（《攻媿集》卷56《清芬堂记》）。时人多以为宋“以忠厚仁慈治天下”^⑭“务宽厚”^⑮，真德秀因而称“三代以下，治体纯粹莫如我朝，德泽深厚亦莫如我朝，——社稷长远赖此而已”^⑯。

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皇朝是被民众起义推翻的，占有中原、江淮百年以上的朝代无一例外。唯有北宋、南宋不在此列。国运久长的原因之一即在于精英与统治阶层空前绝后的团结一致，以及治理上的包容宽厚与德泽深厚。

宋代政治的特点之六是削地方之权，将地方的行政、司法、财政、军事诸权都收归中央。诚如朱熹所言，“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⑩。其结果是既终结了以往地方长期割据的历史，又开创了地方无力抵御外敌的格局。

宋代政治的特点之七是任法用吏，互相制衡。宋尊崇祖宗之法，废人而用法。郑性之认为“祖宗以仁厚得民，以纪纲立国”^⑪。仁意是纪纲之本，“无纪纲则仁意无所辅而行”^⑫，以仁意执法，德治、法治并行不悖，两者相辅相成。

宋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使官与官、官与吏互相牵制。法之所在，上之人亦不能进退下之人。其弊在于法极繁，人不能变通。君子拘于法而不得为其事，小人为徇私敢越于法而不之顾。所以朱熹强调正心诚意，主张因祖宗之法而精择其人^⑬。

就体制而言。在君权与相权关系上，宋代的相权虽受君主的裁抑，但与废除宰相的明清时期相比，仍可牵制君主，维持权力和制度的制衡。这是宋代开明宽松的政治氛围形成的制度保障。

二、宋代的经济

（一）农业

与前后历代相比，宋代堪称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南方的深度开发，种植与复种面积的扩大，水利田的大规模开垦，肥料的大量使用，单产的提高，区域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棉花、茶叶、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与进一步发展。伊懋可因此将其称作宋代的农业革命。

就全球而言，宋代农业所取得的成就远高于当时其他地区。

（二）手工业

宋代雕版印刷业发达，生产规模与数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铜版印刷术已发明并得到广泛

的应用。活字印刷术和套色印刷技术也发明于宋代。建州的“版本书籍，行四方者”，已“无远不至”^⑭，内蒙西部黑水城遗址即出土过建本书籍。

宋代的造船业与航海业亦有很大的进步。宋人在世界上首先发明采用了海船水密舱装置，率先使用指南针导航，宋船比阿拉伯等地的船只更加坚固可靠。

宋代已广泛运用火药。政府的专门生产军用物资的“广备攻城作”即设有“火药作”。宋人发明的突火枪，是历史上最早的管形火器，现代枪炮的鼻祖。随后不久，即出现了铜制火铳。

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获得长足的进展，染色技术有很大进步。

棉纺织业逐步成为产棉区农村的主要副业，和日趋重要的经济部门。

（三）矿冶业

钢铁冶炼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举足轻重的核心经济部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列当时天下大豪富榜中，位居前4位的即均系用铁冶致富者。

在宋代，煤矿、铁矿已被大量开采，并得到广泛的使用。徐州东北的冶铁中心利国监，即有用煤炭冶铁的作坊36冶，各百余人，雇工人数4000人以上^⑮。宋代铁的冶铸技术有较大进步，铁器与农具的质量亦随之有很大改进。

此外，铜矿、铅矿的规模也极其可观。如洪迈指出，仅信州铅山一地，矿工人数即达10余万，得铜铅数千万斤^⑯。

（四）商业与城市

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与城市亦开始发展繁荣。宋代出现不少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其中平江府北宋宣和年间户43万（按户5口计，人口多达200多万）^⑰，市区达50多万^⑱。南宋末临安附廓2县民户18.6万余户（即90多万口）^⑲，城内外百十万口^⑳。城市中分隔商业区与居民区的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夜市随之出现并日趋繁荣。农村地区出现了众多市镇与定期的集市。

十三世纪时，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只有10万人口，十四世纪时，伦敦人口才4万，巴黎6万。宋代城市与市镇的发展水平不仅远高于以往各

时期，而且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随着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军力的削弱，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从以陆路为主向以海路为主的转折时期。其原因即在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及北方陆路的不安全。如大食使者入贡原走陆路，但有钞略之患，天圣元年仁宗诏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⑦。

宋代是海上交通和贸易迅速发展和成熟的时期。北宋时，政府即很重视海上商贸。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市舶政策和管理制度。

宋代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当时宋船已抵达波斯湾和亚丁一带，外商来华贸易，多愿乘中国船转送致之（伊德里西《地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一类有关航海与海外知识的著作亦随之涌现。

宋代进出口物品的结构也体现了其外贸与商业发展的水平。当时国内的进口以域外特产、原料、矿产为主，出口以附加值高的手工业制成品为主。与以往不同，随着外贸从陆路为主转向以海路为主，瓷器、铁器成为外销的大宗商品。到宋代，瓷器在外贸商品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印度、波斯湾沿岸、埃及、索马里都有宋瓷、宋钱出土。2007年12月22日，我国南宋商船“南海一号”在广东阳江海域打捞出水。船体残长22.15米，最大船体残宽9.9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较早、船体较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南海一号”船内出水文物近10万件，以瓷器、铁器为主，其中瓷器约6万件，钱币亦有相当数量。福建连江定海湾白礁1号宋代沉船、西沙华光礁1号宋代沉船（船长22.14米，宽8.1米，载重约120吨，出水文物1800余件）所载大部分也是日用瓷器。

（五）货币与金融

在人类历史上，纸币发明并最早使用于北宋，欧洲最早的纸币则发行于1661年。1694年，英格兰银行始正式使用纸币。

宋代的纸币交子初行于四川，会子初行于两浙，后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纸币之外，宋代东南岁铸钱约290万贯^⑧。宋孝宗乾道时（1168

年），会子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纸币即已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宁宗庆元时（1195年），诏会子界以三千万贯为额。嘉定时（1209年），11界会子除已收换尚有1360万余贯，12界4700万余贯，13界5500万余贯。理宗绍定时（1232年）。两界会子已及22900余万（贯）。纸币发行量和市场货币流通量之大反映了宋代经济的繁荣和发达^⑨。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纸币发行和流通的金融管理理论称提之术，亦最早出现于宋代。

（六）区域经济

如果说宋以前北方地区是全国经济的重心，那么随着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宋代的经济重心最终转移到了南方。在南方，随着太湖流域水利田的大规模开垦，土地开发的完成和商业、手工业与城市的发展繁荣，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随之成为南方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宋代奠定的这一格局一直延续了近千年，可谓影响深远。

（七）能源与生产工具

在宋代，煤炭已被广泛使用于取暖、冶铁。南宋开始使用焦煤炼铁，冶铸技术亦随之改进，铁器与农具的质量亦有很大改进。而欧洲直至十八世纪时才发明了焦煤炼铁。

从宋元时期的农书来看，宋人使用的农具与其他生产工具基本沿用到近现代，可谓影响深远。

（八）人口

在前工业化时代，人口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人口的增减与治乱密切相关。在结束了五代乱局之后，宋代的人口从太宗时（997年）户413.2576万，增至徽宗时（1107年）时的户2088万，口1亿以上^⑩。其人口远超汉唐极盛时5—6千万的水平，这一领先记录一直到清乾隆年间才被刷新。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认为宋代经济出现加速增长，人口增加了1倍，人均收入提高了1/3，1300年人均GDP为600美元，达到公元元年至1952年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并高于欧洲的576美元（1990年美元）^⑪，是世界经济中领先的国家。

按科林麦克伊韦迪《世界人口历史图集》所

载，公元1100年、1200年—1300年世界总人口分别为3.2亿和3.6亿^②。公元1100年宋朝拥有1亿多人口，约占世界总人数的1/3，人均GDP位于世界前列。按此推断，其GDP应占世界总量的1/3以上，高于1820年的32.9%，堪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

（九）产权、工商政策

与秦汉以来历代均着力限制土地兼并，抑制工商不同，宋代不抑兼并，不抑制工商业，默许官田的私有化与土地买卖，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宋元祐时天台县令郑至道提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的观念^③。就目前所知，郑至道是中国历史上提出工商皆本观点的第一人。

当然，国家对私有产权并非无限放任，而是有所节制。如抛荒的田地政府可收回，在国家遇到重大危机时，政府亦曾强制性地回买公田，即购买私田归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仍拥有终极产权。

三、宋代的思想、文化与宗教

（一）宋学的兴起

宋代思想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宋学的兴起的。

宋学是与汉代形成的汉学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外延包括宋代的儒学（理学、道学等）、中国化的佛学、新道教的思想，即宋代的儒释道乃至更多。宋学的影响及于宋统治区之外的辽、西夏、金、蒙元和朝鲜、越南、日本等地。

汉学重训诂章句，宋学侧重义理。就思想与信仰而言，宋学（尤其是宋代新儒学）的兴起是为了回应从西方传入中国，以佛教、佛学为主的外来思想的挑战，同时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先秦儒学与诸子百家学术的回归与创新，标志着汉代以来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引进与吸收消化已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

就政治与天下普世价值而言，宋学的兴起又是为了回应辽、金与蒙元军事、政治各方面的挑战，尤其是为了因应宋人所知之天下（宋、辽、金、西夏、蒙元与朝鲜、越南、日本等地）这一历史与地域共同体对于维系内部秩序的焦虑，以满足其生存、发展需求之产物。

从列国并立与竞争来说。与秦汉与隋唐相比，宋代武力与国力相对贫弱，辽、金与蒙元在军事、政治上均对两宋形成了重大威胁。在严重的外部威胁面前，尤其是在改革变法、富国强兵的努力收效不著之后，思想文化之软实力的竞争与领先就变得异常重要了。在上述历史与地域共同体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一统与华夷之辨的观念十分流行。中华天子乃天下共主，天命所归。孰为中华，天命在谁，孰为正统，就看王道何在。王道所在，即为中华。华夷之别，主要在文教。谁能明道以尊王，兴文教以攘夷，谁就具有正统与合法的地位，在强国竞争中具有政治与法理上的优势。宋学的兴起实乃宋代士大夫为应对周边列强环伺，以提升强化己身实力，处理好宋与天下，宋与周边各政权关系需求的产物。

又就整体而言，历史与地域共同体的存在必定有得到所有成员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与文化，这是在其发展与延续过程中形成的。对当时人而言，共同体的这种广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天下的普世价值。在其眼中，这是先贤创立，今人应继承并发扬光大，影响遍及天地，惠及天下生民，以天下太平为目标的思想、价值理念与信仰，即天理与天道。诚如张载所言，宋学是当时学者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实现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抱负的产物。其思想境界上极天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既着重于经典义理的充实、阐明与发挥，又极为注重经世致用，因而具有全天下即普世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其思想不仅成为宋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主导影响了元明清三代。其所达到的高度不仅远超隋唐，也是以后历代所不可企及的。

（二）史学、文学与绘画

宋代是史学发展繁荣的时期。出现了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学案体、金石学等新的体裁与新的领域，地方志开始大量涌现，进入方志编撰的繁荣时期。

就文学而言，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远超唐代。

宋代是词发展的高峰。《全宋词》收录了流传至今的宋词1330多家近20000首。可见宋词的兴盛与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

宋朝始设书画院，集中书画家和鉴赏名家，专事创作与研究。宋代出现了瘦金体新书体，山水画、花鸟画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书法逐渐从民间工艺中脱离出来，出现了文人画和文人书法。

（三）教育

宋代学校大兴。宋代始置武学、画学。徽宗崇宁三年，全国诸路三舍天下教养人为士21万余员，为屋9万余楹，费钱340万缗，米55万余石^③。

科举制度完备于宋，每次取士人数超过隋唐与元明清各朝。

在学校与科举前所未有的发达，诗书传家风气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印刷业空前繁荣的同时，宋代的公私藏书也急剧增加。宋代私家藏书盛行，乌程叶梦得与贺氏，藏书皆超过10万卷，明清时期最大的藏书家也难以与之匹敌。

在上者的重文崇儒，科举的盛行，对教育的倡导，雕版印刷的繁荣，各类学校特别是乡塾村校的普及，使教育扩大到整个平民阶层，举业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四民生计与众多行业之首。赵宋一代，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之风气，中国社会亦因之形成极其注重文教的传统。

（四）宗教

在宋代，佛教最终融入中国社会，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北魏、北周、唐和后周时经历了三武一宗四次灭佛的劫难。自宋代开始，佛教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劫难。其命运的转折意味着佛教已彻底融入中国社会，在政治上不再与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共同体的维系者朝廷发生冲突，政府对佛教的管理与控制相当有效并取得了成功，三教合一的思想运动在相当大程度上达到了其预定的目标。

在宽松的环境中，宋代的佛教与道教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佛教的藏经始刊于宋代，宋元时前后所刊共有七、八种。道藏亦始刊于宋代。

与宋治下各宗教和平相处，彼此相安无事，没有爆发重大冲突和宗教战争不同，9—13世纪世界其他地区往往因宗教的极端排他性和政教合一的体

制，宗教间的冲突不断，战争此起彼伏。例如在伊比利亚半岛有基督教国家针对伊斯兰教国家的收复失地运动，在中东有十字军东征，在中亚有伊斯兰教针对佛教国家的圣战。

即使在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也是势不两立。如1209—1229教皇诺森三世为铲除异端阿尔比派，对法国南部发动十字军讨伐。伊斯兰教内部则有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对立与冲突。

宗教上的包容与排他、不宽容，构成了宋与上述地区的重大区别。

四、宋代的军事、科技与赋税

（一）军事

宋孝宗曰“本朝家法，远过汉唐，唯用兵一事未及”^④“我宋立国大体，兵力虽不及汉唐，而家法实无愧于三代”^⑤。宋代军事上不如汉唐的原因，客观上是因为社会、经济与赋役制度的改变，导致国家掌握的人力财力减少，主观或人为的原因则是为严防武人跋扈，发动兵变，以文抑武太过。

从制度来看。为防范武人，使皇帝与朝廷能牢牢控制军队，宋代创建了一套堪称成熟完备的军事制度，并为后人所沿袭，影响及于今日。这一套制约、压抑武人的制度一方面固然造成宋人用兵不及汉唐的结果，另一方面则结束了以往经常发生的武人擅权乱国的历史，中国从此再未发生军队废立皇帝或改朝换代的军事政变。

就军人而言。宋军职业化、专业化的水平甚高，远超以往各朝。宋军人数众多，少则数十万，多则达120多万，绝非同时代世界其他国家所可比拟。

试以海军为例。宋代拥有强大的海上武力。临安陷落后，不愿降元的宋臣民奉幼帝依忠于宋室的海军南下，辗转海上。崖山之役，宋军有巨舰1000余艘，兵败后浮尸出于海者10余万人^⑥，海上武力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不降的宋海军如此，降元的海军规模也不小。为消耗、削弱降军，元帝曾用降元的前宋海军东征日本，南征爪哇。

如1281年，南宋灭亡后，元军即出动海船3500

余艘，东征日本，用兵达十万。从庆元出发的江南军，其主体即由前宋水军组成^③。

1292年，元政府出动战舰千艘，军数万，从庆元、泉州出发，远征爪哇^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次由前宋水军为主组成的征伐堪称明以前古代最大规模的跨海长途远征。

值得一提的是，宋凭借其强劲的经济实力，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大军民同仇敌忾的精神，顽强抵抗了蒙元的进攻达45年之久。这也是当时遭到蒙古军主力进攻的其他国家所没有做到的。

（二）科技

宋代在科学与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过其前后各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诚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⑤。”

就世界历史而言，宋代科技的发展水平不仅远超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而且对全球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上。

宋代已广泛运用火药。宋人发明的突火枪，是历史上最早的管形火器，现代枪炮的鼻祖。随后不久，即出现了铜制火铳。

指南针发明于宋代，最早的记载见于1044年成书的《埜原总录》。最晚在北宋后期，指南针已用于航海^⑥。

宋代的雕版印刷十分发达，铜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和套色印刷技术已发明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宋代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的西传上。培根《新工具》指出：“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在航行方面；由此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得上这三种机械发明。”马克思《机械、自然力和科学应用》的评价则更高：“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

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医学也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宋慈《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

（三）赋税

宋代是中国赋税制度演变的重要转折时期。唐代前期实行租（田）庸（力）调（户）制，赋役征收与历代相同，均从人户、田产入手。安史之乱后，均田制瓦解，朝廷改行夏秋两季征收的两税法，按丁、产、户等征税。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沿用两税法，但身丁钱陆续被蠲除，户等逐渐弱化，赋役征收的对象开始从人户逐渐转向田产。这种转变虽经明代的一条鞭法，一直到清代的摊丁入地，地丁合一最终完成，但发端肇始于宋代。

这种转变颇具两面性。一方面便于赋役的征收，有利于无田、少田的贫苦人民。另一方面则导致国家对人口控制的削弱，和力役资源的流失。

上述赋税制度的演变还表现在宋代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了农业税的收入。如景德、皇祐间田赋岁入在4900万左右，景德、皇祐间茶之岁入在320万至500万之间，商税、酒课、盐课岁入4400万缗，和买绢岁入300万匹，不计其他专卖收入，仅以上5项岁入即超过田赋^⑦。

除上述影响之外，宋代的赋税收制度亦多为后人所沿用。宋代的分税制即是一例。

就赋税绝对数量而言。在古代中国，史籍记载的数据不多，统计方法亦和今天不同。今人在研究历史时，又往往只有依据这些有限的，在今人眼中原本就不精确的数据，运用各种推算乃至推断的方法，才能得出今人所需的数据。基于上述认知，可知以下笔者引用和由推断而得到的数字并不精确，不过结论大致可信，仍可供读者参考。

唐天宝以来，天下岁入之物：租钱200余万缗，粟1980余万斛，庸调绢740万疋，绵180余万屯（2屯=1疋），布1035万余端（2端=1疋）^⑧，总入2528万贯石疋（各单位价值大致相当）。

宋天禧末，天下总入150850100贯石疋两等（内田赋中含芻草茭薪炭等3530万围束等）。皇祐元

年，入126251964贯石疋两等。治平二年，内外入116138405贯石疋两等^④。

从货币收入来看。宋立国之初，天下岁入缗钱1600余万，两倍唐室。天禧末，所入增至2650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3680余万缗。熙丰间，所入乃至6000余万。淳熙末，（东南岁入）遂增6530余万焉^⑤，其中仅200万缗上供钱为祖宗正赋，其余6330余万缗则系南宋所增赋。熙丰间，天下垦田4616556余顷，田赋税额52011029贯石疋两等。内以后隶属南宋之地（京西按1/3，淮南按4/5计）垦田约300万顷，占总数一半多，田赋税额24059666贯石疋两等，占总数一半不到^⑥。按此推算，其岁入亦应占总数一半不到。皇祐、治平间天下岁入1.1亿至1.2亿，一半不到即为5千万。如岁额5千万不变，加上南宋所增赋6530余万（东南以外四川等地所增赋尚不包括在内），淳熙末总岁入应与皇祐、熙丰间相当。

明洪武26年夏税米麦4717000余石，钱钞39000余锭，绢288000余疋，秋粮米24729000余石，钱钞5000余锭。弘治时，夏税米麦4625000余石，钱钞56300余锭，绢202000余疋，秋粮米22166000余石，钞21900余锭^⑦。岁入总额不过3千万石匹。明末每年正赋外，三饷加派1630万两^⑧。

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天下岁入银4千万两左右，道光22年岁入银共3714余万两^⑨。

以粮米为准，按1宋石约为2/3明清石，米1石值银1两或1两以上计算，宋代的岁入是唐至清鸦片战争前最高的。

又就岁入在GDP总量中所占比例而言。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一推算了公元960年之后中国的GDP，按其推算方法推断，唐天宝年间人口近6千万时，其GDP应为360亿元（1990年国际货币单位，即G—K），岁入2千多万。宋、明人口1亿时，GDP应为600亿元G—K，岁入分别为1亿多与4千多万。清人口4亿时，GDP应为2400亿元G—K，岁入为4千多万。按1宋石约为2/3明清石，米1石值银1两或1两以上计算，宋代岁入在GDP总量中所占比例亦远高于唐中叶明代和清代鸦片战争前。宋代国家掌握的财力远超唐代与明清。

与当代相比，2017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567亿元，占全国GDP总量827121.94656亿元的20.9%。2003年财政收入20466.1亿元，占GDP总量117252亿元的17.5%。安格斯·麦迪森说1990年中国GDP总量为人民币14267.34亿元，即1990年国际货币单位G—K 21238.52元，按此推算，1元G—K约为1990年0.67元人民币。宋代GDP 600亿元G—K约为402元人民币。按宋代岁入1亿贯石疋两（各单位价值大致相当），1990年1市斤米四川省均价不低于0.6元人民币，1市斤米0.6元人民币，1宋石米120市斤计，宋代岁入1亿贯石疋两折合72亿元人民币，占GDP 402亿人民币的17.9%。岁入、GDP占比已与2003年的中国相当，远高于唐代与明清。财力是国力的重要体现，宋之国力远比今人所认为的要强大得多。

五、宋代的社会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重大的社会变迁，宋代社会即是其中一次大变迁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从贵族社会转变为平民社会，这一重大的社会变迁深刻影响了以后2千年的历史。历史学家普遍认同的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其结果是中国从士族社会转变为世俗的庶民社会，并深刻影响了其后1千年的历史。按日本学者宋代近世说的观点，宋代是近代的开端，元明清时代的一切现象均可追溯至宋代。其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

宋代社会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

就历史的传承而言，宋代是尧舜三代以来的一个朝代。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朝历代均为多元一体的地域共同体。多元是指其族群、语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和社会（包括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与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均呈现多元多样性。

一体则是指上述多元多样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或共性在经济上表现为彼此不可或缺、有无互补、长期沿袭不变的贸易，饮食上都使用筷子，政治上均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与尊王意识，在文化上表现为使用汉字，均尊

崇天地、山川、鬼神，在精神上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将和而不同、中和包容，天地间秩序井然，人与万物均能生育繁衍视为整个共同体即天下的核心价值。

宋代及其周边国家构成的这种历史与地域共同体看似松散，实质颇具弹性，因包容而得到极大的认同，因注重生存、延续与变通，而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因追求秩序与和谐而始终能走向繁荣，虽屡次濒临灭绝的境地，却总是能再度复兴，保持着地理、人口和文化上的统一，延续数千年而没有中断。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宋代社会通过传承与创新，完成了前人开始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消化的过程。同时，北宋定都开封，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从关东转移至关西，最终结束了历时长久的东部与西部的对立乃至对抗，东西差异因之弱化乃至消失。南宋定都位于连接中国南北之命脉即大运河南端的杭州，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开创了南北差异凸显，超过东西差异的全新格局。

就共同体的历史而言。如果说宋以前中原地区是维系上述共同体之一体、决定其命运的主导力量，那么，随着辽、金、元和清的兴起，共同体的主导力量前所未有地从中原转移至东北方，首都也因之固定于靠近东北方，位于连接中国南北之命脉即大运河北端的北京。

为适合新时代天下主导力量的变化，宋代社会为天下创立、提供了各国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以处理彼此关系，维系这一历史与地域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使其得以生存、发展与延续近千年。

宋代社会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其所创立的以宋学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不仅成为自身的主导价值观，而且第一次为周边各国所普遍接受，从而成为全共同体的主流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社会具有与历代不同的一些重要特点，即包容宽松与凝聚内敛。这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宋代政治包容宽松，君主与官僚士大夫共天下，君权、相权、军权相互平衡。经济政策上因势利导，不抑兼并。自上而下各方面的包容宽松与随

着来的相对自由，使宋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军事、科技、商业与城市因之发展繁荣，均取得超越前后各代的显著成就。

自由包容的同时，宋代社会又强调内在的自我约束，以及无所不在的礼主导下的法制等外在规范的制约，而不至于走向完全的放纵。

宋代被认为是士大夫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精英阶层注重自我约束，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提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正君心是天下之大本。宋末朝廷能回买公田，明末朝廷不能从士大夫获得资助，不能说与精英阶层是否具有此种意识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乡绅是宋代首次出现的一重要社会阶层。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控制社会基层的势力先秦时当属贵族。秦汉至隋唐，政府先是与豪强，继而与世家大族争夺对地方和社会基层的控制。士族消亡后，随着科举的普及与文教迅速发展，乡绅开始形成，并成为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乡绅在价值观和整体利益上与士大夫阶层息息相关，宛若一体。宋代国家与社会的内部凝聚力因乡绅阶层的出现而大大加强。乡绅阶层在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年，一直到现代才因土地改革而彻底消亡。

两宋尤精于内治，其所缔造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文化认同感，使宋朝之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精忠报国，推崇民族气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得到从上层到下层的普遍认同，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与前后各朝代相比，宋代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始终未达到极端化的程度，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相对比较缓和，占有中原、江淮百年以上的朝代，唯有两宋不是被民众起义所推翻的。

六、宋代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宋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传承、创新与重塑的关键时期，并取得

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具有开创性、总结性的成就，在传承、创新与弘扬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正因为如此，北宋大臣李清臣夸耀说：“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⑤。”蒙古出使南宋的使者郝经把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盛赞为“后三代”“汉氏之治似乎夏，李唐之治似乎商，而贵朝享国之久则似夫周，可以为后三代”^⑥。

严复在《学衡》第13期（1923年1月）中说：“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俱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复必振。”而中国文化未来之发展必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⑦。

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⑧。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史林》杂志第25卷第4号、第26卷第1号《东方的文艺复兴和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田清认为：“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⑨。”

邓广铭先生则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⑩。”可见宋代对中国社会及其传统的形成影响之巨。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宋人所创立的价值观及其意义体系首次为周边各国所接受，从而成为共同体的普世价值，并被用以处理彼此关系，维系这一历史与地域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使这一共同体得以生存、发展与延续近千年。

又按上文所述，宋代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当时世界其他国家。

宫崎市定指出：“中国的炼铁法在宋初就比欧洲先进约六百年。也并非炼铁法这一件事例外地进步，如果我们把印刷、造纸、罗盘针、火药、美术、政治思想等多方面的进步一起考虑在内，便能

得出一个结论：宋代文化水平从总的方面看来是高出当时欧洲水平的。”她认为：“中国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⑪。”

邓广铭先生认为，“宋代文化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国际宋史研讨会开幕词》，载《国际宋史研讨论文集》）。

宋代文化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的西传上。按上文所述，培根指出，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马克思则认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两者均予以极高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欧美、日本和中国学者对宋代的评价不同，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宋代大多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多年来，人们可以对汉唐元明清津津乐道，却对宋朝抱有极深的成见，大肆批评宋朝的文化、政治制度和思想道德。人们一言及宋代，便会联想到岁币、割地、战败、称臣，杀忠臣栋梁和朝廷的腐败无能。

对宋朝的看法，改革开放前大致没有比“积贫积弱”所产生的影响更大的了。钱氏《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

这种批判可以上溯至南宋末。黄震已指出当时的四大弊政：“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⑫。”文天祥《御试策》中分析南宋国势时指出：“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能免于贫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兴，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财则交受其害矣^⑬。”这是南宋灭亡前末日景象的写照。

这种情况一直到近年才有所转变。对宋代的主流评价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变化，其原因即在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中的人们，往往很难摆脱其所在时空的影响。如南宋

亡国之际，黄震、文天祥很自然地会对呈现末日迹象的时局提出尖锐的批评。近代以来，中国屡屡割地赔款，国弱民贫，人们又对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持批判与否定态度，面临亡国亡种危机的国人在极度不满和批评时局之余，很自然地会对相似的宋代产生共鸣，用批判与否定的眼光看待宋代。而在中国呈现勃勃生机，进入高速发展，百废俱兴的复兴时期之后，人们对时局与传统文化的态度因之发生重大变化，国人对宋代的观感也就随之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毋庸置疑，前人对宋代的批评与肯定均有其依据和道理，但若仅囿于历史片段和部分史实，只看到中国和宋代，而不具有全球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不能从历史的整体全貌出发，比较分析相关的史料与论断，便很容易得出整体否定宋代的观点。反之，亦极易得出全盘肯定，过高评价宋代的结论。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要避免上述认知上的局限，我们就应超越自己的专业、所在时代与地域，不受功利目的的限制，从全球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出发，运用新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系统、整体看待问题。但知易行难，笔者也不例外。

七、结语

宋代历史给了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其一，就天下与文化的复兴而言，核心价值观的传承、创新与重塑是极其重要的。

宋代思想与精神实力的先进和超乎今人想象的强大，士大夫对气节的注重，全社会具有自上而下强大的凝聚力，应是宋代能存续300余年，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的原因所在。

其二，宋代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历史共同体，在思想、心态、制度与氛围均呈现包容宽松的特点，在今天仍具有值得我们学习、参考、继承与发扬光大的重要价值。

在宋与其周边国家构成的多元一体的历史共同体中，多元是客观的存在，一体是多元存续的关键。

一体主要体现于文化。经宋代继承、创新与重

塑的中华文化，首次使其核心价值获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同，成为传统时代天下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包括使其具体化的物质实体。

一体在思想上表现为道统，政治上表现为法统，即一个中国。

其三，在自由、包容的同时，宋人又注重对自由的制约与内在的自我约束，以及无所不在的礼主导下的法等外在规范对个人、利益集团、权力的制约。司马迁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仆，万则役，物之理也。不抑兼并将加快社会的两极分化，权力的高度集中将导致专制独裁。宋人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诚意正心，尊崇祖宗之法，提倡共治、公议，任法用吏，其所作所为虽不能将政治、经济权力关到笼子里，但至少能予其以一定的制约。这种做法及其经验教训值得今人深思。

其四，两宋的灭亡告诉我们，在综合国力中，军事实力是所有实力与权力的内核，堪称终极实力。唯有拥有天下最强大的武力，才能保护自身，使宋代繁荣发达的文明得以生存、延续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其五，人们的观念因时空的限制而显得短视，生命短暂的个人如何超越时空的限制，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就主观而言，超越的途径在于拓展视野，开阔心胸，提高个人素养，通过内在的反省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

就客观来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变迁势必造成既有存在的变化，从而形成新的观念，并使人得以据此重新审视基础业已动摇的旧观念。社会的大变迁为人们提供了超越的契机。其结果将使人们有机会突破以往旧存在的限制，并因意识到这一限制，进而自觉突破新的存在对自己的限制。

其六，宋代的历史告诉人们，我们属于拥有辉煌过去和伟大传统的中华民族，我们来自历史，并将回归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中国的复兴与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人们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履行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与责任。

注释

- ①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
- ②班固《汉书》卷9《元帝纪》。
- ③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10《始议二》。参见邓广铭《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辑，第85—100页；邓小南《祖宗之法》，2006年三联书店，第9—10页。
- ④陈亮《陈亮集》增订本附录李幼武《陈亮言行录》。
-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
- ⑥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卷2。
- ⑦脱脱等《宋史》卷389《尤袤传》。
- ⑧沈括《梦溪笔谈》《续笔谈十一》。
- ⑨真德秀《西山集》卷2《庚午六月十五日轮对奏札二》。
- ⑩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08《论治道》。
- ⑪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序》。
- ⑫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3《本朝七《盗贼》》、李焘《长编》卷480元祐八年正月丁亥条。
- ⑬楼钥《攻媿集》卷56《清芬堂记》。
- ⑭马永卿《元城语录》。
- 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7元祐四年五月丙戌条。
- ⑯真德秀《西山集》卷3《直前奏札一》。
- ⑰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8《本朝二》《法制》。
- ⑱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序》。
- ⑲吕中《宋大事记讲义》《治体论》。
- ⑳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8《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
- ㉑苏轼《东坡全集》卷52《上皇帝书》。
- ㉒《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七。
- ㉓范成大《吴郡志》卷1。
- ㉔徐大焯《烬余录》云南宋初金军攻破平江城，城中居民达50万。
- ㉕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58《户口》。
- ㉖吴自牧《梦粱录》卷16《米铺》。
- ㉗脱脱等《宋史》卷490《大食》。
- ㉘脱脱等《宋史》卷180《食货下二》。
- ㉙脱脱等《宋史》卷181《食货下三》。
- ㉚脱脱等《宋史》卷85《地理一》。
- ㉛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表1.3《中国与欧洲人均GDP水平》。
- ㉜科林麦克伊韦迪《世界人口历史图集》图6.2《世界总人口》。
- ㉝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7。
- ㉞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4崇宁三年十一月丙申条下注。
- ㉟《中兴两朝圣政》卷50乾道七年正月癸未条。
- ㊱林駟《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9《齐家》。
- ㊲脱脱等《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
- ㊳宋濂等《元史》卷11《世祖八》、柯劭忞《新元史》卷250《日本传》。
- ㊴宋濂等《元史》卷210《爪哇传》。
- ㊵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
- ㊶朱彧《萍州可谈》卷2、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半洋焦》。
- ㊷脱脱等《宋史》卷174《食货上二》、卷183《食货下五》、卷184《食货下六》，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
- ㊸杜佑《通典》卷6《食货六》。
- ㊹脱脱等《宋史》卷173《食货下一》、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田赋四》。
- 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
- ㊻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田赋四》。
- ㊼张廷玉等《明史》卷82《食货六》。
- ㊽张廷玉等《明史》卷78《食货二》。
- ㊾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5《食货六》。
- ㊿吕祖谦《皇朝文鉴》卷135李清臣《欧阳文忠谥议》。
- ①郝经《陵川集》卷39《使宋文移·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
- ②陈寅恪《金明馆丛稿第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第245页。
- ③刘子健：《代序——略论南宋的重要性》，载黄宽重主编《南宋史研究集》。
- ④《东亚史论丛》中《中国史序说》，第30页。
- ⑤邓广铭《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 ⑥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卷下《宋代的煤与铁》。
- ⑦脱脱等《宋史》卷438《黄震传》。
- ⑧文天祥《文山集》卷3《御试策》。

On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Zhou Shengchun

Abstract: With the opportunity of social vicissitudes, this article tends to use a comparative method to have a thorough scan over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which overcomes the constraint of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In terms of the process of Chinese history, Song Dynasty is a key stage for th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remaking of core values in Chinese culture, witnessing lots of achievements with uniqueness. Song Dynasty created and provided core values which received popularity among all states to maintain the inner order of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ommunity, enabling it to survive and develop for more than thousand of years. The thoughts and spirits of Song Dynasty were blessed with extraordinary advancement and strength. Its culture bore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siveness and easiness in regard to thought, mentality, system and atmosphere and meanwhile the emphasis on internal self-discipline and external constraints with omnipresent rite and law towards freedom. Not only playing a leading role at the time, the culture of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progress of global civilization. What worth reflecting is that the most prosperous and advanced culture suffered from foreign subjugation and miss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for lack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strongest army.

Key words: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Chinese Culture; World Civilization

“一带一路”视阈下非洲历史文化再认识

刘成富

摘要: 本文从“一带一路”的视角对中世纪非洲的对外交流、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对非洲的殖民侵略、以及非洲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进行研究和分析,通过非洲历史文化的再认识,旨在强调非洲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智慧和能力以及文明与冲突的历史教训,为“一带一路”非洲段的共建提供文化参照。

关键词: “一带一路”; 非洲; 文化参照

中图分类号: K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3-0072-08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和中非合作的深入与发展,有关批评、谩骂、诅咒、甚至将非洲妖魔化的声音不绝于耳。这种唱衰非洲的言论不仅出现在西方媒体,而且也时常出现在某些中国学者的论文里。显然,非洲人在他们的眼里成了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代名词,非洲成了一个毫无希望的大陆。他们的立场和观点耸人听闻,严重地扰乱了人们的视线,对非洲历史文化再认识很有必要。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重点论述堪称“黄金世纪”的非洲中世纪、西方的殖民侵略给非洲带来的灾难以及非洲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旨在还非洲一个公道的形象,消除一部分人过分的担心和恐惧,为“一带一路”非洲段的打造提供文化参照。

一、古代非洲:“丝路”文化的重要参与者

自古以来,非洲就是“丝路”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为人类的文明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跟其他大陆一样,非洲人用无比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给我们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华章:古埃及、麦罗埃时期的努比亚、古迦太基时期或古罗马时期的

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Aksum)。从唐代(618—907年)到元代(1260—1368年),在我国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有关非洲的信息,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关非洲之角和印度洋非洲海岸的信息。东非考古遗址中出现的青瓷、白瓷以及中国古钱币,可以证明“丝路”对非洲的重要影响。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断定中国的商人就一定去过那里。从文献中出现的国别名称构成形式来看,作为中间商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有关资料显示,从8世纪起,广东就有从事对非贸易的商团。但是,中国的商品不是通过公海的小帆船运往东非海岸的,而是在波斯湾或亚丁湾由穆斯林商人来转运的。

杜环的《经行记》是中国人直接认识非洲的最早证据。公元751年7月,穆斯林阿拉伯帝国军队与突厥叛军在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平原大败中国军队。数千名俘虏被押往布哈拉(Boukhara)与撒马尔(Samarkand),后来,在这些俘虏中,许多造纸匠、织布工或首饰匠等人在两河流域安家落户。其中,有一位名叫杜环的官员。公元762年,他顺利地回到了广东并出版了一部题为《经行记》的游记。这部作品后来失传,但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国前殖民地法语文学研究”子项目,项目编号:16BWW069。

作者简介: 刘成富,男,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二级),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稽山讲座学者。从事法国文学和非洲问题研究。

中一些片断被收入我国当时的百科全书，即801年杜佑的《通典》，有1500余字保留至今。

书中提及了一个黑人国家。那里不种大米，不种谷物，不种草，也不种树，用鱼干喂马。再往内地走，则是一片山区，伊斯兰教徒和东方的基督徒混住在一起。医疗很发达，人们通过切开颅骨来治疗腹泻。从国名和描写的国情来看，这个国家可能就是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海边地带。当然，如果杜环描写的是如今被叫做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国家，那么，他提及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混住情形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整个中世纪这两个教派的信徒都生活在那里。也有人猜测他所描绘的国家可能是埃及或努比亚，或者是刚刚被穆斯林阿拉伯军队征服的整个的或部分的北非地区，因为直至12世纪那里仍然住着没落的基督社团；或者，有可能是阿拉伯半岛，因为在伊斯兰教发展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都生活在一起；或者，可能是索特科拉岛（也门索特科拉省）这座驻守亚丁湾入口的阿拉伯海岛^{[1]32}。

中国与非洲官方的直接接触始于明代。1405—1433年，中国大將軍宦官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达了印度尼西亚，甚至更远的印度沿岸、波斯沿岸、阿拉伯半岛沿岸、非洲沿岸的达索马里和肯尼亚。船队浩浩荡荡，比15世纪末的葡萄牙大帆船大上两至三倍，有的甚至大上好几倍，能搭载两至四万人，船员绝大部分是军人。船队带去的是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带回的是香料和油膏的原料、异国动物的羽毛和皮毛、动物的角和珍贵木材。远征的目的在于记录这些奢侈品的来源和供应渠道，但更在于扬国威，使当地的君主臣服于中国皇帝，尤其是派遣使臣、进贡礼物这样的表示。

从地理位置来看，东非在海上“丝路”占有绝对的优势，同时也决定了其兼收并蓄的外向型文化性质。其实，早在公元前2000年，上埃及女王谷的商人就经常往来于庞特地区，即今天的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也门红海两岸的经济贸易区。古罗马时期，人们管那里叫“阿扎尼亚”。在伊斯兰教出现的早期，为了躲避麦加迫害，第一批穆斯林迁徙至埃塞俄比亚，并受到了基督徒纳加西国王的友好接待。据阿拉伯史料记载，公元696年，为了加强

传统友谊，倭马亚王朝（又译伍麦叶王朝、奥美亚王朝）哈里法麦尔旺派了一个使团对埃塞俄比亚进行友好访问，并与王室大臣商定了贸易和伊斯兰教教育的协议。又据埃塞俄比亚地方志记载，公元8世纪“穆斯林七兄弟”在东非沿岸建立了一个王国，称为“非洲设拉子人”。阿拉伯史学家艾尔·马苏德著书立说，记录了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海外贸易的盛况。阿拉伯的商船横渡印度洋，从东非到中国，途经波斯湾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此外，1154年他描述的著名的海上贸易航线，就是从阿曼到桑给巴尔。14世纪的摩洛哥旅行家白图泰到过摩加迪沙、蒙巴萨、基尔瓦，发现那里伊斯兰学者熟悉沙斐仪学派的教法，社会法制参照阿拉伯希贾兹地区的准则。12—14世纪，伊斯兰在非洲东部沿岸迅速传播，许多城市都形成了穆斯林小区，且就地取材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清真寺。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玛从欧洲沿非洲海岸探险，沿途发现阿拉伯商贾从亚洲到那里经商。他借用阿拉伯人的航海图从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然后安全地返回。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许多非洲的沿海城市。那里市容整洁，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居民好客，文明礼貌，许多地方都有穆斯林小区。显然，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非洲早已卷入了洲际交流的浪潮，经历了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强盛。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东非成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的中转站。在塞内加尔出土的黄金胸牌就借鉴了阿拉伯人的工艺：“头部有花饰的钉子、阿拉伯花饰图案、金银丝细工或绞成绳索状的金丝组成的菱形图案连成的一个个同心圆^{[1]44}。”直到今天，一些非洲国王在出席典礼时仍然会佩戴这种胸牌。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非洲还见证了城市的发展，非洲亲王建造了宏伟的宫殿，外国商人在那里安家落户，奢侈品和奴隶在那里频繁交易，清真寺和教堂拔地而起。那时的非洲还积极开发了自然资源，享誉全世界的黄金得到了开采，非洲的手工业和造船业也随之发展。

古代非洲的贸易范围很广，不仅仅是东非这一地区。从研究资料和出土的文物来看，西起撒哈拉沙漠和萨赫勒（Sahel）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东邻红海，中连尼日尔河与尼罗河中间的河谷盆地；北起非洲之角的高原，中接亚丁湾的非洲海岸，南抵

非洲南半球的东部边界和马达加斯加。在这片横跨两个半球的区域，无论自然环境怎样，无论文化反差多大，这些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活动密切相关。就地理环境和人口的组成而言，中世纪的非洲积极参与了伊斯兰世界的交流。自公元7世纪起，伊斯兰教在不断征战的过程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世界。到了9世纪，这个由单一政权统治的帝国不再像过去那样专断，阿拉伯人与其他民族混居的情景随处可见。过去，埃及和北非是罗马帝国的行省，后来由于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逐渐融入了伊斯兰世界这个“中心帝国”。统治伊斯兰世界的政权不断向南扩张，最后在沙漠和绿洲终于停下脚步，不再让圣战向前伸展。除了重新划分边界，一条萨赫勒边界的商业市场由此应运而生。阿拉伯人发现了撒哈拉南部的非洲，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波斯和东非海岸亦然。印度洋宛如撒哈拉沙漠，岛屿犹如绿洲，跟骑在驼背上的沙漠商队一样，水手们投身于凶险的大海，希望在新的海岸发现带来丰厚回报的奇珍异宝。商人和朝圣者的往来、文化和审美参照的传播使得来自世界四面八方的人汇聚到了一起。从波斯帝国时代起，从印度的边境到地中海盆地，几千年来地处东西方贸易轴线的非洲第一次融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之中，而灌溉这方热土的正是一个庞大的经贸交流系统^{[1][2]}。

经贸交流系统离不开宗教的广泛传播。为了进一步迎合阿拉伯商人，11世纪，萨赫勒地区掀起了一股皈依伊斯兰教的热潮。国王们纷纷借皈依的行为来为本国的贸易造势，为伊斯兰教的商人的到来提供精神层面的保障。这样，伊斯兰教便成了维系不同族群之间重要的精神纽带：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来说，伊斯兰教是他们的护身符或通行证。而对于非洲的国王来说，伊斯兰教则是吸引外商不可或缺的筹码。因为皈依意味着国王周围有神职人员，意味着有弘扬公正之风的人物在场，而且这些人的意见会被国王所采纳。苏丹地区国王皈依伊斯兰教的内在信息是：这个国家适合进行对外贸易。从这一点来看，国王的皈依能够为王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并将所有地区或部分地区的商路收入囊中，所以皈依能让该国在众王国的竞争中获得决定

性的优势。萨赫勒地区君王的相继皈依，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面对激烈的竞争形势所作出的积极的政治回应。这是伊斯兰教在非洲影响力逐渐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的非洲形成了一种伊斯兰教与非洲传统宗教并存的和谐局面，王室和上流阶层皈依伊斯兰教，而当地民众仍可信奉传统宗教习俗。

对外贸易带来了城市的兴起和国家的强盛。商人们出于贸易的便利，往往会选择在商道沿途定居，于是出现了一批居民点并逐渐发展成了城市。东非的阿伊达卜、柏培拉、摩加迪沙，南非的马林迪、蒙巴萨、基尔瓦，北非的开罗和马格里布地区的西吉尔马萨，撒哈拉地区的廷巴克图、加奥、瓦拉塔……这些繁荣富饶的城市主要得益于伊斯兰世界频繁的贸易往来。当时，西非三大帝国加纳、马里和桑海之所以国力强盛，能够征服周边弱小国家并将之纳入帝国的版图，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实现了对撒哈拉商道的控制，通过商道的贸易和税收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来源。不论是加纳的首都昆比亚勒赫，还是桑海的首都加奥，在当时都是著名的国际贸易交流中心。例如，加纳地处今天的毛里塔尼亚与马里的交界处，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通过对跨撒哈拉贸易和黄金的控制，9—11世纪一跃成为西非的第一强国。处于鼎盛时期的加纳不仅地域辽阔，农业、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后来，商业城市奥达戈斯特被阿尔摩拉维德人占领之后，该国才逐渐丧失对商道的控制权并开始走向衰弱。

非洲商业交流的“路线”形成的时间不尽相同，其密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如果说伊斯兰教差不多是同时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以及从索马里至坦桑尼亚的广阔的地域，那么进入萨赫勒以南的地区的时间则相对要晚一些。总的来说，在地理学家的笔下，中世纪的非洲处在一个交流活动飞速发展的阶段，臣服于国王权威的商业城市充满了异国情调。东非成了“丝路”线路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欧、亚、非国际贸易中心。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换个角度或思维，否则就会被误导或陷入过于封闭的定性思维。古代非洲并不是闭关锁国，而是积极加入了庞大的“全球”贸易体系，思考着如何在“丝路”的商业贸易过程中获得属于自己的收益，能够协商贸易条件，接受社会的变革，尤其是

宗教变革，并善于掌控变革的影响，进而转变自己的身份，让自己真正成为国际贸易的合伙人。

由于资料的缺乏，长达数百年的非洲中世纪历史至今鲜为人知。法国著名非洲古代史专家雷蒙德·莫尼（Raymond Mauny）对这一段的历史感到很绝望，曾经用“昏暗的”一词来指代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当然，作为非洲古代史的创始人之一，雷蒙德·莫尼这么说并不是想贬低非洲的过去，而是试图表达一种缺少可用的原始资料、无法追寻历史的挫折感罢了。非洲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视线，应该归功于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玛，是他开启了非洲新的时代序幕。但是，F·福维勒·艾玛尔的《金犀牛：中世纪非洲史》的问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在撒哈拉沙漠消失的城市中，透过不断发掘的废墟，我们可以感受到昔日“丝路”的繁华盛景：“回荡着各种语言的细语、街上母骡和单峰驼的脚步声、人们卸下驮鞍时牲口的嘶鸣、庭院里或清真寺前文明礼貌的商谈以及四处散播的私生活秘密^{[1]27}。”在他的眼里，没有什么能比这些城市废墟更能让人同时体会到命运前的抗争与无助。被遗忘的世纪与重现的世纪犹如黄金反射的光芒闪耀夺目，却又转瞬即逝。

二、不是非洲人的过错，而是西方人的罪恶

让非洲偏离“丝路”、偏离世界文明进程的罪魁祸首不是非洲人自己，而是与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有关。有人把非洲人的贫穷落后归咎于他们的愚昧、无知和懒惰，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文艺复兴使西欧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也正是这个时候，白人把有色人种推进了罪恶的深渊。14世纪，西班牙人开始贩卖从北非带来的黑奴，紧接着，葡萄牙人紧随其后。15世纪初，黑人奴隶市场在一些大城市悄然兴起。15世纪中叶，奴隶买卖只是殖民强盗一项附带的贸易活动。但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奴隶贸易急剧攀升。众所周知，塞内加尔戈雷岛上的奴隶堡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囚禁和贩卖黑奴的基地。那是一座坚固的木石结构建筑物，楼上铺设着地板，阳光充足，是奴隶

贩子们的住所。楼下则是一间间奴隶囚室，每间只有五、六平方米，同时关押15—20名奴隶。奴隶被戴上手铐和脚镣，还被系上一个重达14斤的大铁球，以防止他们逃跑。囚室没有窗户，黑暗、潮湿、肮脏。墙上只开了几个小洞眼，供奴隶贩子朝里监视。囚室分男室、女室和儿童室，一次能够屯集500—600人。在奴隶堡的底层，有条阴森森的通道直通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据说有近两千万的黑人奴隶就是从这里被押解上船运往美洲的。戈雷岛遗址有其独特的价值，反映了18世纪末的灿烂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野蛮的真实写照。1820年，埃及发起侵略战争，让奴隶交易在尼罗河上游盆地肆意发展起来：从科尔多凡的南部、达尔弗蒂特（Dar Fertit）南部、加扎勒河地区，一直到位于埃塞俄比亚以南的加拉斯地区。19世纪下半叶，红海地区仍有大量的奴隶贩卖活动。1873年，一位英国议员表示，据伟大的探险家、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估计，每年有100万人被运到那里，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能活着到达目的地。当然，在非洲的历史上，公元1世纪的《红海回航记》中就有了非洲之角（今索马里）的奴隶交易的记载，7世纪末阿拉伯人进入北非之后，把大量抓来的黑人贩运到阿拉伯国家以及波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但是，毫不夸张地说，自14世纪欧洲人参与了奴隶贩卖这一罪恶的交易，黑人空前的灾难才真正地开始。

黑人的磨难多半与种族优劣论有关。在白人的眼里，黑人被视为需要“开化”的种族。这为他们发动殖民战争找到了“合法的”借口。当然，殖民的最初目的也许只是在另一个国家建立贸易机构，而不是武力征服^{[2]646}。在埃米尔·德·吉拉尔丁（Émile de Girardin）看来，“殖民”和“征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跟我们所谓的“扩张”存在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去征服，要么去开化^{[2]959}。”其实，早在四十年前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1830—1848年），法国人就在这两个术语之间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关联。在帕格奈尔（Pagnerre）的《政治词典》中，古尔赛勒·赛内耶（J.G. Courcelle-Seneuil）的观点是，殖民是最值得赞扬

的征服形式，这是宣传文明最直接的方式。1885年7月28日，为了支持在马达加斯加海上示威所需要的财政拨款，法国议会主席费里在演讲中描述了以“开化”之名最终走向征服的过程。他认为文明可以通过贸易、谈判或强大的人格魅力（比如，刚果共和国首都的创建者萨沃尼昂·德·布拉柴）来进行传播，而不一定要借助于洋枪洋炮。但是，费里的亲信杜克莱尔（Duclerc）认为，只要能推动人类的进步，设立机构或进行征服都是合法的。共和党人史学家艾里阿斯·雷戈诺（Élias Regnault）也坚信，开化无非是一套用来更好地掌控自然的艺术和技巧，只有通过征服，才能将这些知识传递给被征服者。那些被征服了的人完全可以在第二阶段再主张政治自由并实现解放。因此，“开化”常常赤裸裸地变成了“征服”。19世纪40年代，法国政府选择了武力征服整个阿尔及利亚，而不是寻求与阿卜杜勒·卡德尔酋长的和解。1854年，未来的将军，也就是当时的塞内加尔上校、总督费代尔布（Faidherbe）根据过去与酋长签订的条约，放弃了和平关系。他从塞内加尔河开始军事扩张，并向酋长支付了一定的费用以换取贸易的许可。英国殖民部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也宣称，流血是为完成使命必然要付出的代价^{[3]25}。《泰晤士报》为殖民战争大唱战歌，认为乌姆杜曼战役结束了“德尔维希”（Derviches）在苏丹的统治，这是文明力量与马赫迪的野蛮专制之间较量的理想结局。

不言而喻，非洲人在殖民战争中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托尔斯泰曾经写道，对于军官来说，战争意味着危险，意味着随时可能丧失性命，但也意味着有希望获得奖赏或职务的晋升；他不会考虑战争中的另一方，也不会想到战争意味着杀戮、残害其他士兵或山民^[4]。用20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话说，殖民战争是“标枪与步枪的对抗”。这句话也许不够精准，但是基本上概括了双方在火力上的差距^{[3]455}。欧洲人用枪炮夺走了无数无辜者的性命，战争中的数字能够说明所有的一切。譬如，在乌姆杜曼，有超过一万个“德尔维希”战死沙场，还有五千人被俘。除了战斗人员而外，许多平民在战争或随后的安抚阶段死于非命。女人、老人、孩子跟游击队员混

在一起，因而常常成了子弹和刺刀的冤魂，这种现象在攻占城市或村庄时司空见惯。通常，面对当地人的全面抵抗时，殖民部队的目标是占有一切在他们眼中有价值的东西，将其摧毁或者掠走。这是加快战争进度的唯一办法。如果不能伤害他们的荣誉或者爱国热情，那就要想方设法破坏他们的财产。拉莫尔西埃和比若在阿尔及利亚曾先后系统地实施过这一劫掠战术，给当地人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这一战略还包括抢夺牲畜、偷抢田里庄稼或仓库中的收成、砍伐果树、烧毁住房等。

试想，如果没有耸人听闻的黑奴交易，如果没有残酷的殖民战争，如果没有长达数个世纪的毁灭性的打击，今日的非洲究竟会呈现出什么模样？这一问题令人深思。最近几个世纪非洲被迫与欧洲列强的命运绑在了一起，遭到了强盗们的“开化”和“开发”。然而，在“开化”和“开发”的背后，非洲告别了“丝路”的繁忙与盛景，这片祥和而神奇的大地最终陷入了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三、文化觉醒与文化自信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旨在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文化多极的世界构建，而西方的殖民强盗则走到了其对立面。在非洲，尽管白人在占领殖民地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力图推行“同化”政策，但从长远看，是徒劳且失败的。在《为知识分子辩护》一文中，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写道，在文化和教育的影响下，西方知识分子是其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但是为了正义，他们又不可避免地站到这一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其实，这种矛盾性在非洲知识分子的身上也十分明显。他们使用殖民者的语言以及西方思想为支撑的价值理念，但是常常又以某种方法创造出另一种思维方式，用以抗拒一种并不属于他们本种族的文化遗产。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他们试图摆脱西方列强强加给他们的身份。20世纪中叶，在西方殖民统治行将就木之时，非洲的知识精英为了重构殖民地的文化传统，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论战，赢得了广大同胞的广泛支持。他们竭力从殖民

统治非人的暴力中挽救殖民地的人性，尤其当一个社会的语言和习俗遭到蔑视或贬斥的时候，他们对于特有的混杂文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他们成了非洲文化的代言人，成了思想变革的先驱。

就法属非洲而言，塞内加尔的桑戈尔（Senghor）、阿尔及利亚的阿姆鲁什（Amrouche）、费拉翁（Feraoun）和亚辛（Kateb Yacine）、以及泛非意义上的马提尼克的塞泽尔（Césaire）和法农（Fanon）堪称这一思想变革的旗手^[5]。由于地域的不同，殖民体制在不同的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响每一个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也不尽不同。例如，塞内加尔通过和平谈判脱离了法兰西的控制，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则经历了八年的流血冲突，而马提尼克至今仍然是法国的一个海外省。从殖民时间来看，地域的差异也不容忽视。早在1635年，法国就在马提尼克开始殖民活动，而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则始于1830年，确立对塞内加尔的全面殖民统治则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此外，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殖民地的所属关系也轻重不一。阿尔及利亚甚至不被法国人看作他们的殖民地，而是被地中海隔开的三个法国的省份。对于塞内加尔的部分市镇，只要那里的人使用法语，积极推行法国文化，殖民当局就许诺他们拥有跟法国人同等的公民权。显然，“同化”政策给法国文化创造了崇高而虚幻的理想境界，19世纪中叶，“同化”这一概念至少在理论层面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法国以及文化的恩泽赢来了一片颂扬之声，拿破仑三世宣称道：“我们应当同阿拉伯人共同生活，让他们顺从于我们的法律，让他们习惯于我们的统治，让他们臣服于我们的优越性，这不仅仅依靠于我们的武力，还有赖于我们的制度^[6]。”法国殖民强盗坚信，法式思维的理性和逻辑将给他们心目中那些不开化的民族提供世界通用的工具，同时确保法国海外殖民地的巩固和发展。

“同化”政策与法语固有的价值理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追根溯源，这一学说源于启蒙运动。18世纪末，正如里瓦罗尔在《论法语的普遍性》中所主张的那样，那些鼓吹“同化”的人把法语视为

一种本质上清晰的、合理的表达手段，认为在操着不同语言的殖民地可以作为统一的工具进行推广^[7]。在他的心目中，法语可以帮助殖民地实现现代化，并确保他们进入“文明的”世界。共和党人费里认为：“高等族群不是为了寻开心或是出于剥削弱者的企图才去征服的，而是为了教化他们，为了让他们达到与自己同样的高度^[8]。”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希望通过学习法语，让“土著人”能够掌握和吸收法国文化和思想的精神，同时确保法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尤其是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也认为，殖民地除非通晓一点法语，否则就无法在治理上和内心深处归顺法国。但是，“同化”政策只是法国人一厢情愿的美梦罢了。

在受过欧式教育的非洲人当中，许多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尽管他们的祖国与宗主国仍然保持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他们发现自己被孤立了起来，脱离了他们的同胞，同时发现法国根本没有真正把他们明确认定为法国人。针对20世纪上半叶阿尔及利亚的法语文学的现状，彼德·邓伍迪（Peter Dunwoodie）写道：“这些‘受过欧式教育的人’体现了殖民社会所造成的不合适、不自在、不稳定且有争议的文化杂交，有如两个面孔的罗马门神雅努斯自己跟自己作斗争一样^[9]。”如果说法国的“同化”政策培养出了这一群思想家，那么在后来的实践中则加剧了他们的反殖民主义思想的形成。许多知识分子从自由、平等、博爱中得到启示，试图重新诠释广义上的人道主义原则，他们从《人权宣言》中的抽象概念出发，思考自由和平等对于那些试图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试图通过肯定黑人对普世人性的归属来消除人们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并通过强调黑人的文化和民族差异来挑战宗主国“同化”的动机。将桑戈尔、塞泽尔、法农、阿姆鲁什、费拉翁和亚辛等人联系在一起，其实正是对“人性”概念的思考。通常，“人性”一词作为抵制殖民剥削、奴役的非人性行为的象征，但并不意味着“人的天性”，而是呼吁在道德层面尊重世界各地的不同体验。这与权力和征服不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会把思维模式强加于其他的社会。它强调的是大地上并行

不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某种统治或控制他人的社会制度。这里的“人性”与其他生命的形式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与大地的节奏，甚至与桑戈尔诗歌中的动物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泛非的角度看，与许多坚持不懈地寻求黑人特性、黑人身份和尊严的黑人作家相比，法农的视野更为开阔。这位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接受了同化思想的马提尼克作家，深深地影响了许多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1939—1945年，他在多米尼加积极地参加了英国抵抗运动，后来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自由法国力量”斗争的洪流之中。他发表的散文《黑皮肤·白面具》客观而深入地研究了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恶果，在法国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在他的笔下，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成了肤色偏见与内心自卑感的受害者。他成功地把殖民压迫所引起的心理异化后果加以理论化。在他看来，我们不应过分地夸大黑人的特性，黑人特性这个概念过于狭隘。他认为安的列斯人在白人犯下的罪恶之后，正经历着伟大的黑色幻想。在《饥寒交迫的奴隶》里，他认为黑人同胞必须要告别幻想，抛弃那些古老的信仰和先于生命的友谊。不要在无用的祷告中或可怜的模样中浪费时间。为了非洲、为了自己、为了全人类，黑人同胞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发展新思想，并努力创造新人^[10]。

埃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堪称黑人运动之父。他为歌颂泛非主义黑人文化倾注了毕生心血。1913年，他出生于马提尼克岛，青年时代受到雨果、波德莱尔、马拉美和阿波利奈尔的影响。后来，他先后就读于巴黎路易大帝中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39年，他的诗作《返乡笔记》终于与读者见面，他将满腔的愤怒和精神上的强烈反抗，以及对黑人应有的身份与地位的寻求表现得淋漓尽致。安德烈·布勒东读了这部诗作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布勒东的眼里，埃梅·塞泽尔的语言宛如新鲜的氧气，他是一位不只是黑人的黑人，而是个完全意义上的人。他展示了所有的疑问、所有的忧虑、所有的希望以及所有的狂喜，如同尊严的化身令人钦佩。《返乡笔记》对于理解塞泽尔的思想根源、“黑人特性”概念乃至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作品涉及到的主题有黑

人英雄、殖民主义、解放、革命、非洲和暴政，在加勒比海、非洲，乃至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埃梅·塞泽尔把一生都用来讴歌黑人的历史和文明，把黑人特征和整个黑人世界的文化当作骄傲和自豪的源泉。他的思想里闪耀着启蒙哲学、泛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火花^[11]。

四、结语

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响应，中非合作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把非洲妖魔化的声音仍不绝于耳。非洲需要被理解，需要再认识。古代非洲文化灿烂，现代非洲伤痕累累，而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之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非洲经历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中世纪的非洲其实是个积极参与“丝路”、面向世界的大陆。遗憾的是，从15世纪开始，白人的罪恶行径给非洲人带来无比的灾难，19世纪殖民战争更是罄竹难书，它把世界分成了“白人”与“土著人”两个敌对阵营，使以前或许并不存在的种族主义观念走向了极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非洲意识正在觉醒，非洲大地需要文化认同和合作共赢。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旨在通过经贸往来促进亚、欧、非之间的广泛交流。非洲人完全有能力参与其中，鲜为人知的非洲中世纪就是个明证，那不是“昏暗的时代”，而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黄金世纪”。非洲人表现出了超凡的能力和智慧，成了“丝路”沿线举足轻重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今天，非洲正在觉醒，非洲正在腾飞，需要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大家庭，需要同世界人民一道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了解非洲，走进非洲，对非洲历史文化再认识，以正视听，是“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大地得以具体落实和推进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 [1]F-X Fauvelle-Aymar. Le Rhinocéros d' or-Histoires du Moyen Age africain[M]. Paris:Almar, 2013.
[2]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M].

- Paris:Administration du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1869: 646.
- [3]J Frémeaux.De quoi fut fait l' empire-Les guerres coloniales au XIXe siècle[M].Paris: CNRS, 2010:25.
- [4]L Tolstoï. “Hajji Murat” ,in Russian-Muslim Confrontation in the Caucasus[M].New York: Routledge,2004:136.
- [5]J Hiddleston.Decolonising the Intellectual-Politics,Culture,and humanism at the End of French Empire[M].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4:8.
- [6]Napoleon III.Lettre sur la politique de la France en Algérie.Adressée par l' Empereur au Maréchal de Mac Mahon[M].Paris:Imprimerie Impériale,1865:10.
- [7]A de Rivarol.De l' universalité de la langue française[M].Paris: Arléa.1991; original 1794.
- [8]J Ferry.quoted in Charles-Robert Ageron, France coloniale ou parti colonial[M].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78: 66.
- [9]P Dunwoodie.Francophone writing in Translation: Algeria 1900-1945[M].Bern:Peter Lang,2005: 276.
- [10]刘成富.文化身份与现当代法国文学[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86.
- [11]刘成富.法国海外文学概观[J].译林, 1999 (5), 206-208.

Re-understanding of Af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by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Liu Chengfu

Abstract: By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foreign exchanges of medieval Africa, the colonial aggression of the Western powers against Africa since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cultural conscientisation of African intellectuals. The re-understanding of Af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ims to emphasize the wisdom and ability of Africa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essons caused by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or conflicts, thereby providing cultural references for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Africa.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frica; Cultural references

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定位西北办学思想与抱负的形成^①

姚 远

摘 要: 由南郑区、昆明区、四川区三大战时高等教育基地的形成和从“点线大学”向“面的大学”的转折切入,梳理了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大与其后继五校立足西北,融汇世界办学思想的形成。认为西北联大“尤负西北文化重责”“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的思想,西大“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的思想,西师“负起西北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大使命”的思想,西工“奠立西北工程教育之基础”的思想,西农负起“领导西北农业建设之责任”“成为全国最完善之农业学府”的思想,西医“以培植医学专才,发展西北卫生事业,促进民族健康为职志”的思想,渐成一种战略责任与使命,在教化一方、为西北地方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实践中发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西北文化也影响了其办学宗旨与发展方向,形成双向影响。

关键词: 国立西北联大;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3-0080-12

区域特色是一切事物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特色会时过境迁,不复存在,但区域特色却很难失去,几乎像是与生俱来的胎记,相伴终生。虽说大学并非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所直接赋予,但这种环境毕竟提供了它生存的氛围、物质材料、文化营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发展的趋向、规模和色彩。尽管科学日益国际化,已根本不存在“美国数学”和“中国数学”之分,但当科学和教育日益转化为一种文化,就会带有地域特色。无论一所大学地域性发源特点的现代价值如何,但我们追溯其源流而上时,却总发现它是当地区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追寻平津四校一院经由西安临大一西北联大千里大迁徙的足迹,寻根问祖,溯流而上,聚焦在其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时刻,我们发现,它已华丽转身,“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同时也化为西北文化的一部分^②。但是,它承载了我们太多的记忆,承载了中华民族文脉的传承和否极泰来的历史轨迹,特别是承载了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先贤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拓荒西北高等教育的责任感、使命感和高远追求,是我们今天复兴中华文明的重要借鉴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国立西北联大:“尤负西北文化重责”

按1938年划定的战时西北联大社会教育区,覆盖豫、绥、陕、甘、宁、青、新等七省区的辽阔范围,几占大半个中国。抗战期间形成南郑区、昆明区、四川区三大高等教育基地,又有“三坝”之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联合大学史研究”,项目编号:17BZS019;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课题“国殇播迁:西北联大通史”。

作者简介: 姚远,男,陕西岐山人,编审(二级),博导,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所长,迈科集团西北联大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西北联大联盟秘书长。从事科学教育史、西北联大研究。

说,即陕南古路坝、重庆华西坝、重庆沙坪坝之说^③,“俨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三大堡垒”^④。这既表明,战时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新格局的形成,也表明战时高校办学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区域定位。就国立西北联大及其后继院校在西北的分布来说,姜琦认为^⑤:这标志着“由‘点’‘线’(大河流域或铁路沿线)的大学转变为(西北)‘面’的大学”,将“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⑥,从而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由东部向西北部的一次战略性展布。

西北联大各后继院校联合成立的西北学会及其创办的《西北学报》发刊词,就此定位作了颇具气势的表述^⑦:

“号称世界六大文明古国之埃及、巴比伦、印度、墨西哥、秘鲁,早为时代波浪所淹没,现今唯有中国,遗绍千古。次起之希腊、罗马,虽炫耀一时,为欧美近代文化之开宗,但遭蛮族之摧毁后,已成为历史上之名词矣。中华民族确有其伟大,似长江发源极西,汇合众流,穿岭渡峡,浩浩荡荡,长流不息,注泻东海,而保持五千年之悠久历史,占据一千一百七十余万方公里之土地,并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之人口,此为黄帝子孙历经奋斗之成绩,亦为世界上仅存之硕果,是中华民国负有延续人类文化之使命与拨乱世、拯万民、见青天之重责,现虽正为自身挣扎、抵御强暴、奋发图存而努力,然并未忽略人类维持正义,为世界图谋和平之使命,负重致远,振古如斯。”

这是放眼世界文明,来看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独特性和所肩负的重大责任。然后,其笔锋转向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大西北。

“中华民族发祥于西北,而延扩于全境,中华文化,发轫于西北而移向于东南,是西北在时间上曾占重要地位,西北地形,有高屋建瓴之势,历代政变与革命,多由于控制西北而成功,西北面积,就陕甘宁青新五省言,广袤三百二十余万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若包括晋北、绥蒙于内,则有五百余万方公里,几占全国面积二分之一。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异族势力内侵,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东南开辟成为富庶之区,随之,文化中心亦向南移,所谓西北,渐失其重要性,尤其自欧美势力

侵入,天津大开,沿海各省,交通发达,因而工业勃兴,经济繁荣,西方文化竟风靡中土。西北各省,以地处内陆,交通艰阻,浸至生产落后,文化衰微,所谓大西北,愈荒凉不堪。”

“但西北幅员辽阔,蓄藏丰富,凡高瞻远瞩之士,率皆知其于国防上、经济上之重要,故自清末以至抗战前,开发西北之呼声,建设西北之计划,不一而足,然洵以事实困难,未得实现。迨至抗战军兴,半壁河山,沦为敌有,政治经济中心复向西移,西南西北,不特为支持抗战之根据地,且为争取胜利、复兴国族之原动力。”

基于此,遂有“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声。著名教育史家姜琦就此指出^⑧:

“所谓‘开发西北’或‘建设西北’,其目的不仅在于要使西北文化之进度能于向来所谓‘东南文化’并驾齐驱,并且要使西北文化迎头赶上去而成为全中国文化之重心。原来所谓‘东南’及‘西南’乃至‘东北’之文化,溯本追源,尽发源于西北。不过,因为它自海禁开通以来,在地理上占有交通之便宜,故有长足的发展之可能而已。如果我们本着‘数典不忘祖’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应当复归于西北文化,把它重新建设起来,然后才有所谓‘中国的本位文化’之发现,否则,任其所谓‘东南’‘西南’‘东北’吸尽欧美舶来之新文化,好像无根之树木,容易被风吹倒一般。”

但是,战前的我国高等教育布局,大多集中于东南、华北一带,以平、津、沪、穗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祥地。其在地理上的演进顺序为:

“自珠江流域起,沿着东南海滨跳到上海,再由上海沿着长江流域或沪宁铁路一直到达武汉或到达津、平,最后渡过长江上流到四川的成都或越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的沈阳而进行的……(省立及私立大学不计)都是沿着江河流域或铁路线(陇海路、黄河流域亦相同)而分布的。因此,这许多大学,无以明之,名之曰‘线的大学’,极端地说,可以名之曰‘点的大学’,它并没有顾到一面,更未曾顾到全面之设置。这……是不是合乎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使全国人民都能够享受高等文化之福利呢?”

其答案是否定的。按照几何学原理,万象起

于一点, 然后由点而线, 再由线而面, 然后由面而体。因此, 战前我国大学的分布, 无疑是一个畸形的布局。然而, 所有布局于点上的、还是线上的大学, 没有一所愿意自愿地迁离原地, 但迫于敌人打到门口, 抗战遂成为重新布局的一个契机, 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的战略转折^⑤, 遂成可能。

“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 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的错误, 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 乃毅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 按其性质, 分类设立, 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 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 这样一来, 我觉得所谓西北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 乃至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等, 才算是我国的最初成立之‘面’的大学或学院。……所以, 现在的西北各大学之任务比之原有的东南、西南及东北各点或各线上的大学之任务, 其重大之程度, 不啻倍蓰一般。具体地说, 现在西北大学及各学院, 尤其西北大学, 不啻是原来集中于各点及各线之上一切大学之基石, 这一块基石, 又像一颗钢钻, 它所发出的诸光线, 是先有体而面, 再由面而普照于一切线或一切点之上, 然后使任何一线或任何一点吸收去作为它自身的光线之导源而有所发扬光大一般^⑥。”

这无疑是在抗战时期对西北区域兴学战略最深刻和最科学的一个诠释。

那么, 地处西北的高等学校应该怎么迎接这一机遇和适应这一国家战略呢?

其实, 在由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和改为各冠以“国立西北”名号的五所院校时, 民国最高层已经就此有所考虑。1937年10月20日教育部给西安临大电文, 已有“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的说法^⑦。赵慈庚教授曾回忆, 教育部也曾打电话给留坝县县长转告迁徙途中的西安临大, “停止前进, 不许迁往四川, 留在陕南”^⑧。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陈剑脩二常委, 为学校最后的落脚地等事项专飞汉口请示, 教育部转述民国最高层的意见答复: “西北联合大学, 系经最高会议通过, 尤负西北文化重责, 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

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⑨。”这也就是说, 改为西北联大也好, 还是改为国立西北五校也好, 这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战略思考。

因此, 这五所院校在大的区域“西北”定位确立以后, 又在西安、兰州、天水、平凉、岷县、咸阳、宝鸡, 临潼, 甚或迪化, 都有过小范围的地域分布思考。比如: 国立西北医学院初拟迁平凉, 复将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并入, 设立兰州分院; 西北大学, 就有过“战后第一步迁回西安……设分校于兰州……并在新疆迪化设分校, 与美国西北大学并存于世界”^⑩的计划;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兰州的创建和战后拟北平师大、北平大学两校永留西北的计划等, 都是这种战略的进一步细化。

二、国立西北联大: “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

教育部特派员兼西北联大常委陈剑脩就在西北部署高等教育的意义时, 指出: “本校现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其意义……就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⑪。”

那么, 当时西北高等教育之状态到底如何呢?

沈灌群先生对截止于1941年的西北教育状况作了详尽的调查^⑫, 并与全国当时的状况作了比较(见表1), 是最切近当时状况的一个研究结果。其调查结果表明, 西北地区的高等学校有: 设在陕西城固的国立西北大学, 有文学院之中文、外文(英、俄)、历史3系, 理学院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等5系, 法商学院之法律、政治、经济、商学4系; 设在陕西城固的国立西北工学院, 有土木、机械、电机、化工、矿冶、纺织、水利、航空、工业管理、研究所(矿冶学部)、工程学术推广部等9系1所1部; 设在陕西武功的国立西北农学院, 有农艺、植物病虫害、农业经济、森林、畜牧兽医、农业水利、农业化学等7系, 农业经济专修科及研究所农田水利学部; 设在陕西南郑的国立西北医学院, 不分系, 但开展了内科、外科、小儿科、皮肤花柳科等医疗业务; 分设在陕西城固与甘肃兰州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有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体育、家政、公训、博

物、初级部、劳作专修科、师范研究所等10系1部1科1所；设在陕西宜川的山西省立山西大学，有文学院之历史、外文2系，法学院之法律、政治经济2系，工学院之土木、机电2系和医学专修科；设在兰州的省立甘肃学院，有法律、政治经济2系，医学专修科，银行会计专修科2科；设在甘肃兰州的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有农业经济、森林、畜牧兽医、农学、农田水利等5科；设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新疆省立新疆学院，有法律、政治、经济3系和语文专修科。另外，还有设在西安的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工商管理、会计统计、行政管理3科）、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私立西北药剂专科学校，以及筹备中的国立敦煌艺术学院、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等15所高校。

1937年即任教于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西北大学的黄文弼教授也对新疆的教育做过调查，考察了伊犁、迪化、吐鲁番等地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等教育机构，提出提高新疆人民知识和“普及教育，语言必须沟通”，减少“各民族仇杀”^⑧“对教育文化作实力之援助，及沟通各民族之感情”^⑨“恳切希望政府能予以设备上之援助”^⑩等建议。并且，以教育部第二（1941年）、四（1944年）、五届（1945年）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了《拟请教育部实施边疆教育督导制案》等150余件提案的审议，全程参与了国民政府统制管理边疆教育的工作，并对发展西北民族教育提出过重要建议，促成战时中央大学、西北大学两个边政学系的设置。

表1 文理法商农各科的比较^⑪

学科类别		大学生		专科生		专修科生		总计	
		西北六省	全国	西北六省	全国	西北六省	全国	西北六省	全国
文	学生数/人	234	4 795	—	1 164	—	192	234	6 151
	百分比/%	4.9	100	—	—	—	—	3.80	100
理	学生数/人	241	5 698	—	197	—	188	241	6 083
	百分比/%	4.0	100	—	—	—	—	3.96	100
法	学生数/人	635	11 607	—	—	—	—	635	11 607
	百分比/%	5.4	100	—	—	—	—	5.47	100
商	学生数/人	131	5 146	128	846	—	585	259	6 577
	百分比/%	2.0	100	15.13	100	—	—	3.94	100
农	学生数/人	525	3 612	254	605	98	328	877	4 545
	百分比/%	11.5	100	41.98	100	2.989	100	19.30	100
工	学生数/人	897	10 913	—	1 492	—	189	897	12 544
	百分比/%	7.1	100	—	—	—	—	7.15	100
医药	学生数/人	201	3 989	255	552	41	67	497	4 608
	百分比/%	4.3	100	46.19	100	65.19	100	10.79	100
师范	学生数/人	596	2 778	—	150	36	449	632	3 377
	百分比/%	17.6	100	—	—	8.02	100	18.71	100
教育	学生数/人	5	1 898	—	248	—	194	5	2 340
	百分比/%	0.02	100	—	—	—	—	0.21	100
总计	学生数/人	3 465	50 436	631	5254	175	2 142	4 271	57 832
	百分比/%	6.8	100	12.01	100	8.17	100	7.39	100

注：沈灌群先生原表中的西北六省指陕甘宁青新晋。对各科比例有所修改，并纠正了个别笔误。

总之,以1941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当时的国立西北大学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是西北地区系科、专业、研究所设置最为齐全的两所高校;在籍学生数则以西北大学的千人以上为最多,依次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的847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596人,国立西北农学院的525人,甘肃学院、新疆学院则仅有六七十人。在全国的范围来看,194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生有57 832人,就学于西北六省者4 271人,占全国总数的7.83%;“假定此四千余学生均属西北六省省籍,则在西北每785.8方公里内,始得专科以上学校学生1人,以与全国平均每219.5方公里中即有专科以上学校学生1人之情形相较,尚差三倍;如与河北江浙诸省比较,所差更大”^②;从4 271名西北籍学生所学专业分布人数和在全国相应科别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依次为工科897人(7.15%),农科877人(19.30%),法科635人(5.47%),师范科632人(18.71%),医科497人(10.79%),文科234人(3.8%),理科241人(3.96%)。其中,农、医、师范生占全国的比例较高,而这正是在西北就近办学,创建西农、西工、西师所显现出的效应。这就是战时西北高等教育的基本状况,可以用地广人稀、教育落后、各类人才奇缺予以概括。

从战前的历史来看,西北地区在晚清和民国时:陕西有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陕西大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陕西课吏馆—陕西法政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陕西农业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陕西客籍学堂,在1912年将五学堂合组为省立西北大学,1915年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1923年改为国立西北大学,1927年改为西安中山学院,旋改为西安中山大学,1931年中辍;甘肃晚清有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建的甘肃大学堂(又名甘肃文高等学堂),民元改办中学而停,1909年创建甘肃法政学堂,1913年改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8年扩建为兰州中山大学,1931年改为甘肃学院,1944年改为国立,1946年在其基础上成立国立兰州大学;新疆有创建于1924年的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5年改为新疆学院;宁夏、青海在1949年以前无高校。抗战爆发以后,陕源西北大学中辍,甘肃学院、新疆学院到1941年时总共

仅有六七十名在籍学生,可见均奄奄一息。抗战时期,西北联大与后继院校在西北的逐渐展布,直至扎根西北,彻底改变了西北地区落后的高等教育状况。仅西北联大及其后继五校,自1937—1949年立足西北办学以来,即形成705名教授、副教授2169余名教职员队伍和取得培养9015名学生^③的显著办学成就。

三、国立西北大学:“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赖琏把西北大学远承周秦汉唐文明,近负建设西北新文化的责任首次上升到了“使命”的层位。他指出:“国立西北大学创设陕西,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青新区域之广大,不唯缅怀先民之功绩,起无限之敬仰。……故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实为西北大学所应负之使命^④。”他在西大任内的抱负就是要“使西北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⑤。“西北大学处于巴山秦岭之间,复为张博望侯的故里。此时此地的我们,……不但对于先民的功绩,表示无限的敬仰,而且对于祖国的前途,更具无穷的希望。我们应该以恢复旧的光荣,建设新的文化为己任,为最高理想,所以西北大学的神圣使命,应该使它成为西北文化的基石,和名符其实的学术机构;今后办理西大,一定开诚心,布公道,负责任,守纪律,殚精竭虑,尽心尽力,增进西大光荣地位”“我们一定要精诚团结,打成一片,把西大变成一个大家庭,一个坚强的学术堡垒,大家培植它,爱护它,使它发扬光大。”“我们不但为同事,且当国家危难之秋,亦为同生死共患难者,正应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我们具有共同目的与理想,复负有共同责任与职务……共谋西北大学之发扬光大^⑥。”

国立西北大学代校长陈石珍也就此指出^⑦: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有史时代,从黄帝算起到现在不下四五千年,西北一向占着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古代文明,是发源于黄河流域上流。流域所经

过的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省,在我国历史上都占着重要的一页”“陕西人才更盛,西京自古即为帝王之都,周秦汉唐均用为根据地以统一中原。汉中盆地,沃野千里,四塞险固,在历史上为用兵必争之地。至如新疆、蒙古,为西北藩篱,历代均曾加以经营”。从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来看,其中已有“移民西北、建设西北铁路系统,包括蒙古、新疆与甘肃一部分的区域、建设高原铁路系统,包括青海、新疆之一部分与甘肃、发展水利灌溉蒙古、新疆及西北一带”等。从地理上来看,“西北地势高峻,人口稀疏,蕴藏矿物,至为丰富,例如铁矿在西北各省均有蕴藏,煤、油在甘肃、新疆、陕西各省都已发现油源,新疆的和田玉矿也很有名。其他如药材、皮货等,也是西北各省的重要出产。假如交通便利,物资必可多量开发,增加我国的富源”“我们要知道西北的地方很大,陕甘宁青新五省的面积,比德国本土要大7倍,比日寇本土要大9倍,比意大利本土要大11倍,比英国本土要大13倍。德、日、意、英都是比较强的国家,可是他们本国的国土比我们西北各省要小得多了”,因此,西北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抗战时期西大的另一位校长刘季洪也指出:“我们的特殊使命”“就是提高西北文化的水准,领导西北学术的研究。我们每系都要尽到这个责任,要侧重西北问题的研究。比如历史系除研究一般史学外,要注意西北边疆史中俄外交史的研究,地质地理系除一般地理地质科目外,也要特别研究西北的地质地理,这样才能负起我们特殊的使命。其次我们要研究华北各省的复员问题。我们的同学大多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察、绥等省,这些省份现在大多沦陷敌手,我们的行政机构教育机关均已解散,将来失地收复,我们如何恢复机构,补充人才,在目前应当未雨绸缪。我们家乡的问题,应当由我们同学密切注意,认真研究,这也是我们达成战时特殊使命的一端”“本校设在我国的西北,因为这一带完整大学的稀少,所以在这广大的地区,甚至在华北的各省,它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地位重要,使命也就来得特别重大^②”“吾校为西北唯一之大学,故对西北文化之建设,西北问题之研究,实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之后,他

常常提到这种使命,在1944年又指出“惟吾校既定设立西安,则今后毕业同学之散布西北各地者,自当与日俱增,而建设西北,改造西北,自亦吾毕业同学责无旁贷之使命”;要求同学们“通力合作,互勸互勉,以发扬过去之光荣,完成未来之使命”^③。他还将“为西北建立高等教育基础”^④作为自己任内的目标。在其任上,中文系研究西北方言及民歌;历史系搜集陕、甘、宁、青、新疆等省史料,成立考古室;1945年,教育部更将所属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所集资料,拨归西大,遂将原有之考古室扩大改为西北文物研究室;教育系与陕西教育厅合作,利用各中等学校投考试卷,作改进国、英、数三科教材、教法之研究;生物系作秦岭植物调查;地理系作汉中盆地地理调查;经济系作西北经济调查,并编制物价指数及工人生活指数,使立足西北办学的理念逐渐转化为实践。

四、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负起西北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大使命,期有以付国家之重托”

李蒸院长在为《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所撰的发刊词中指出^⑤:“本院为西北地区师范教育最高学府,其使命实不仅限于课堂教学,及狭义的师资培植,必须致力民族文化之发扬,国民道德之树立”,换言之,本院实有参加整个“西北文化建设工作之任务”“本院承师大的光荣历史,产生于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负起西北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大使命,期有以付国家之重托,并能维持师大精神于不坠”“重视师资专业训练之精神,实于国家民族前途有至大之关系,本院负西北区各省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责,正值民族生死存亡之关键,自当遵照国家教育宗旨,认清本身使命,努力迈进”“本院对于国家民族之复兴、社会文化之促进,及西北人民与在学青年之陶冶训练,均负有领导责任”。

李蒸还将这一“使命”具体为:(1)“遵照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促进中等学校教育之发展,并协助西北各省教育行政当局扩充中等学校数量及

改进内容”；(2)“遵照青年训练政策,实施青年训练及研究青年问题”；(3)“发扬中华民族固有文化与道德,并充实其生活力”；(4)“倡导尊重师道之义,建立良好学风”；(5)“陶冶国民人格,奠定复兴民族之基础”；(6)“倡导改良社会风气,提高社会文化水准”；(7)“领导教育思想,发挥教育主张”；(8)“扩充教育事业,实现教育功能”；(9)“坚定抗战意志,树立建国精神”；(10)“提倡科学教育,促成国家现代化”。就广义的“西北文化建设”,他认为:“西北地区是基本建设中之基本,过去西北的教育太不发达,研究工作更未提倡,这是因为西北交通不便,生活比较困苦,不但外界人才不肯多来,而本地人才亦多外流”“西北各省曾不断遭受天灾人祸,致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更无人从事天然富源的开发,所以形成一种偏枯的现象”“抗战以来,东南、华北各地人民逐渐迁移内地,来西北者日渐增多,自西南国际路线封锁之后,西北开发与建设之声浪益高,此诚千载一时之良机”。

他又将“西北文化建设”分为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创作、新闻出版等4个方面,分别提出建议。在西北教育方面,“中小学师资的专业训练,应为西北文化建设之根本”“教育上量的扩充亦为促进文化建设之要项”;在西北学术研究方面,“西北各省为研究工作之丰富地区”“高等教育机关自应负一部分研究责任”;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西北各省流行的民间文学与通俗歌曲甚富有民族精神”,应“就此基础进行创作”;在新闻出版方面,是为“促进文化建设之重要部门”“西北各省应大量增设出版机关”,整个文化建设“方能有所成就”^③。

就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西北文化建设”,李蒸认为“西北为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亦为中国文化发源之地”;其地“有历史的与社会的良好基础”“西北人民至今保有中国古风,所谓礼义廉耻之民族道德,可以随处有所表现,兼以人民之诚笃勤劳,体格健壮,如施以适当之领导,必能勇往迈进。本院所负使命甚大……惟愿各界人士协力进行,以期早日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他还将“西北文化建设”的内容概括为“增进知识,创制文物

制度,征服自然,以求生活需要之满足,与生活方式之改善”,并分解为:(1)“恢复民族固有道德”;(2)“提高社会生活水准”;(3)“推进各省公民教育”;(4)“供给人民精神食粮”等。

西北师范学院迁设兰州,使甘肃破天荒地第一次有了国立学院,并将西北联大精神向西推进2 000公里,到了与新疆、青海交汇的敦煌等地域,并且在传承北平师大,光大我国最早的高等师范教育、训练西北师资、首创高等教育训导制、发展导师制、创办最早的师范研究所、存续最早的女子师范教育、发展现代体育、第一次提出申办奥运会、提高师范高等教育水平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国立西北工学院:“奠立西北工程教育之基础”

李书田院长对于西北黄河河源段开发、黄河治理、水路运输、水电开发、农田水利建设等,有很多颇有见地的论述,他指出:“建设西北,最后必期达现代工业化,现代工业化包括工业之机械化,与农业之工业化,及农业之机械化”“黄河为我国第二大河,世界第七大河,干长近4 700公里”“所有数千年之治黄措施,谓为防灾尚可,目为治黄,则属不宜,盖治黄应含有积极的发展其经济价值之意义”“未来之黄河流域,必为阡陌相连,树木繁茂,轮船通驰,工厂林立之区,而大小新都市亦将建立于广大之地区中,于是农工商业渐趋发展,终必达于繁盛之境”“潼关以上,黄河干支流水道系统及其航运之改进,可给予西北以运价最廉之交通运输动脉”“潼关以上,黄河干支流水电动力之开发,乃西北工业化之柱石,富国裕民之基础,镇摄边陲国防工业之所系”“黄河中上游流域,无论为民生,为国防,均亟应大规模引水灌田”^④。

那么,西北高等教育就是要依托这些重要自然资源,予以研究开发,同时也发展本身。他指出,由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成立及教学、学术和服务地方的工程技术活动,俾对工程学科多做高深研讨,并辅助西北生产事业之推进,“得以奠立西北工程教育之基础”^⑤。他即便在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任上,亦兼以思考西北、西南区域高等教育,指出:

“抗战以还，教育部已于最近一年半以来，奠定西北、西南及西康之高等教育基础。在西北方面，除已并组分设，先后成立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外，复于兰州创设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均所以适应西北各种建设之需要^③。”刁永健也指出：“政府鉴于西北幅员辽阔，宝藏丰富，为求开发西北，充实抗战建国力量起见，非先设立一工程学术机关来领导和推动不可。”他也指出，西北工学院曾有将宝鸡作为永久校址的设想，宝鸡为“西北的工业区域，为现时陇海铁路的终点，交通很便利，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的发达，都有着惊人的速度，在西北的境域中，选择这么一个地方来设立一个工科大学确极适宜”^④。

1942年7月，国立西北工学院纺织系郭鸿文教授、李仙舟教授在考察西北之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结束，历时两个月，9月返回学院，均撰写了详尽的考察报告。郭鸿文教授的《考察西北各省羊毛出产实际状况报告》指出：“我国西北各省，有天然良好之大牧场”“兹以抗战关系，西北各省成为我国长期抗战之根据地，因有丰富羊毛原料，可以供给后方纺织生产”，但存在不少问题，若“不加改进，显然必致日趋退化，前途不堪设想”“需派员到各省产羊区从事指导劝告，用科学畜牧”^⑤。李仙舟教授于1942年2月休假，旋赴天水、兰州、平凉、玉门、西宁、西安、宝鸡、陕南等地考察皮革工业、石油矿、油漆业等，历时两月，行程1300公里，所撰《考察西北各省皮革材料及油脂工业报告》为国家改进西北皮革、油脂工业和学校面向西北办学提供了重要依据。《高等教育季刊》的《编后附记》特别评论指出：“西北工学院教授郭鸿文、李仙舟两先生的考察报告，最有助于西北各省轻工业的建设，揭载于此，当不仅高等教育界同人引为有价值的参考已也^⑥。”

国立西北工学院张兆荣教授指出：“西大、西工、西农是西北最高学府，西北建设人才的培养所、西北学术文化重心所寄^⑦。”

李书田回忆：合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因抗战需要，即着手从事工程学术之推广，对于改进西安飞机场，增辟陕西公路，多所协助。复派员生

调查汉水流域砂金蕴藏”。迁陕南改为国立西北联大，复改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后，“设立有图书馆、测量仪器室、矿冶陈列馆、化学实验室、电讯实习室，及与陕西省建设厅合办一实习机厂，以备学生实习之用”^⑧。在“工科研究所、矿冶研究部之外另正式成立工程学术推广部，从事测绘南郑城区，测量设计改进五门堰水利，及调查风、徽两县矿产”^⑨。李书田在离开教育界转赴水利界任职后，曾于1943年12月重返城固南郑、褒城、沔县等地，视察水利，并回忆：“于二十七年（1938）在城固充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校务委员及筹备国立西北工学院时，曾派水利工程教授刘德润博士率领学生，测绘五门堰区域地形，期有以改进而扩充之，惜二十八年（1939）春离此赴康，另创他校，遂未及发动兴工。”他还为陕南水利做出突出贡献的刘钟瑞作《颂辑五汉南水功赋》，赞颂李仪祉、刘钟瑞等为西北水利做出的贡献^⑩。

六、国立西北农学院：负起“领导西北农业建设之责任”“成为全国最完善之农业学府”

国立西安临大筹备委员、国立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教授早在1932年就在“朝野竞倡开发西北”的声浪中，请缨西北。他认为：“西北诸省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尤重。复兴文物，开发资源，实目前数年最重要的工作”“今后国家问题，完全在西北与东北，尤以西北范围较大，空虚尤甚。吾人不早为准备，他年须必贻误国家于无穷也”，学校更要“担负起发展西北经济事业之重大任务”^⑪。

国立西北农学院院长唐得源教授指出：本院“为全国唯一独立之农学院，可与其他国家之农业大学媲美而无愧”“不但为树人之百年大计，且为经国利民之建设事业”“以本院所处之地位及所具之条件，实应负领导西北农业建设之责任，确应成为全国最完善之农业学府。吾人应有此信心，吾人应由此抱负，互励互勉，达成任务”“我国以农立

国, 本院适居后稷故乡, 为农业肇始开基之地, 宜研究农业学术, 尤须具农夫之身手, 以发扬农业学术, 增加农业生产, 开发西北富源, 复兴农村经济为职志” “习勤习劳, 爱人爱物, 以拓荒为己任, 为农民作导师, 在校努力研究, 毕业忠诚服务……一切以团体为重,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庶几我西北农学院誉日隆, 前途光大, 建国大业于焉肩起”^④。

王志鹤教授亦指出: “本院成立于二十七年(1938)之秋, 时为抗战开始后之一年, 以平津沦陷敌手而迁至西安, 复入沔县之北平大学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奉部令合并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 “规模之大, 人才之众, 国内任何农学院无能出其右者”。对西农来说“西北农业建设, 尤责无旁贷”, 当“共为开发西北农业而努力”^④。

黄毓甲教授也指出: “本院已成为全国农学院最大的一个” “不特在国内首屈一指, 即与国外著名的农科大学相较, 亦属差堪比拟” “本院为研究农业最高学府之一, 有负改进西北农业技术和农村社会的重大使命”。

国立西北农学院周桢教授在学术休假期间, 考察西北造林防砂, 撰成《考察西北造林防砂》一文。

陈宗和就西北农学院的的具体任务指出, “农学院对西北就负着重大的责任: 西北各种作物品种的改良, 实验及肥料的改良是农艺化学系的责任; 新疆、兰州、天水等各地广大园艺的改良及加工, 是园艺系的责任; 发展畜牧, 改良品种, 是畜牧兽医系的责任; 病虫害系负了扑灭农业病虫害的专责; 西北农田水利的建设是水利系唯一责任; 农村经济的建设及复兴, 是经济系的任任务”。除建设任务之外, 还“要将西北自然现象加以精细的研究, 造成中国科学的独立基础……造成国家富强的因素”^⑤。

国立西北农学院为战时全国唯一独立之农学院, 依托后稷“教民稼穡”之地, 推动西北农林畜牧事业。在其前身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与西北联大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之后, 提振了西北农林高等教育的水平, 使师资力量大为增强、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和社会

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 从而奠定我国农林高等教育、首创土壤热力学、首创中国生物统计、发展植物分类学、发展植物病理学、发展土壤学、发展畜牧兽医学, 在1940年即培育出“陕农7号”小麦品种, 1942年又培育出“碧玛利一号”优良小麦品种, 1948年进入试验区, 1949年在全国大面积推广, 成为推广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 为解决新中国的粮荒做出重要贡献。

七、国立西北医学院: “以培植医学专才, 发展西北卫生事业, 促进民族健康为职志”

徐佐夏院长指出: “本院以培植医学专才, 发展西北卫生事业, 促进民族健康为职志”^⑥。”其办学宗旨, 也有“发展西北医疗卫生事业”的明确表述。据此, 医学院作了充实基础与临床各科设备、设置高级护士助产学校、组织汉药研究、开展地方病调查、成立乡村卫生事务所等, 服务于地方。

医学院开展“抗战建国论文竞赛”, 并在《国立西北医学院院刊》特刊形式发表, 见有陈善孚的《西北与抗战建国之关系》等。

国立西北医学院早在西安临大时期, 即派出抗日宣传队和医疗队赴陕南服务于地方。1940年, 又承担地方病治疗; 专设妇婴卫生讲习所; 春假期间将学生编为数队, 以公共卫生学副教授黄万杰为总队长, 分领12分队赴南郑县的新民、灵泉二乡的各村落, 作卫生宣传, 施种牛痘、散发500余份施诊券、作死亡调查统计和陕南地方病调查, 以为改良地方卫生之准备^⑥。其宣传内容有天花之预防、沙眼之预防、指导求医常识、改进膳食、预防疥疮等。鉴于抗战时期前方与后方的卫生同样重要, 1941年, 在调查陕南地方病的基础上, 成立地方病研究所, 研究原因、治疗和消除办法, 由该院热带病学教授周海日和黄万杰两教授负责, 同时由徐佐夏院长和毛鸿志教授负责筹办中药研究所; 1941年, 由王同观教授负责开设护士训练班, 为地方培养医护人员。

同时, 该院亦承担西北地区医学教育指导之

责,1941年即派三民主义兼日文教授孙珍田往西北技艺专科学校讲学;组织解剖学教授王顾宁、解剖学专任讲师吴墨林二人则应邀往广西桂林的两所省立医院讲学。同时,该院曾拟向西北纵深进一步扩展,1941年4月至6月,拟迁校甘肃,徐佐夏院长在天水、兰州、平凉等地勘察院址,曾一度并入西北医学专科学校,成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等。

国立西北医学院传承了我国最早的西医高等教育,扎根西北办学,开辟了西北医学高等教育的新纪元,是为战时大后方五大国立医学院之一,在诸如病理学、西医皮肤性病学、药理学高等教育、现代法医学、儿科学、报告首例“频繁阵发性心源性癫痫”、发现“李氏钉螺”、开辟“针感生理学”新领域、首倡防癌立法、开拓外科事业、首倡遗体捐献、地方病防治、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等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八、结语

五所冠以“国立西北”名称的院校的诞生,使其与生俱来,带有“西北”区域的“胎记”,负载着国家层面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一种战略责任与使命。平津四校一院西迁1200公里到西安合组临大,复向南推进250公里到秦巴山地与成都平原接壤处,再向西推进2000公里到甘肃与新疆接壤处的敦煌。再加之,西北联大李书田常委,从陕西汉中—四川广安—西康康定—贵州贵阳—浙江泰顺—陕西西安,坚持恢复北洋大学,并先后创办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贵州农工学院、泰顺北洋分院、西京北洋分院的数千里辗转办学,已将北洋大学—西北联大的办学理念从大西北延伸到了大西南。抗战引发的这次大迁徙,不啻一次“文军长征”,最先由东北大学引起,继有西北联大、西南联大等200余所学校70万师生的大迁徙。其中,汪堃仁教授绕道越南海防、昆明、重庆、成都至陕南的应聘里程达5000公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的迁徙流亡算起,到部分院校1946年11月回迁原地,迁徙、流亡持续时间则长达8—15年。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

西北联大与其后继五校在西北的展布和教育拓

荒,不仅激活了奄奄一息的西北地方原有的高等教育,延续、发展和新办了一批高校,而且以此为标志,在国土面积占全国1/3、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1/3、古代四大文化(中原文化、古希腊文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交错的西北地区奠定了综合、师范、文、理、工、农、医俱全的一个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中国战时的三大高等教育基地之一。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传承者李书田、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奠基者李蒸,当看到自己的“孩子”辗转过继,甚至将不复存在时,曾产生撕心裂肺般的阵痛,也曾投入相当精力于复校运动,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平津的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先迁西安化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再迁陕南化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复化为设于陕甘之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五校,包括国立北平大学、国立西北五校永远地化为西北大地的一部分。这一华丽转身,不啻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大西北脱胎换骨般的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其意义远比在东南沿海建大学的意义深远得多。它实现了百年来数代有识之士的梦想,从而奠定了21世纪西部大开发的一支重要的文明根基。

西北联大与后继院校在西北的文物考古、科学考察、方志编纂、经济社会调查、方言调查、社会教育、矿产与自然资源开发,一起构成了高等教育教化一方、为地方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一个典范。同时,西北文化也影响了其办学宗旨与发展方向,为其打上“西北”的区域烙印。西北联大“公诚勤朴”校训的形成即与身处汉文化的发祥地的汉中有关。黎锦熙就指出:“西北之华山汉水,即‘华夏’之名所由来,古代文化实肇此土;学府在此,提挈群伦,当以继往开来为务……藉教育学术之力,努力铸成‘国族’以发扬之^⑧。”旅居台北的孙宝琛在阐释“公诚勤朴”中的“朴”时也指出:“汉族民族性的形成与中原及西北的地理环境当然具有密切的关系,大汉民族的朴质、坚忍豪

放性格大半由于艰难的耕作环境所铸成”“忠君爱国”“严辨汉贼不两立”“攘除奸凶与兴复汉室”的观念和基本国策大多源于汉代和三国时期的汉中;“西安与汉中正是我大汉民族强盛时期的圣地,学子们播迁其中,自然会体验到先民创业艰巨的地理环境及开拓精神。教授及同学们由西安迁往城固,攀登秦岭,不畏跋涉之苦,在城固初期,教授及学生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大家都坚毅地接受了,而且都心神愉快地接受了,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④。

注释

- ①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党史、国史、军史类——国殇播迁：西北联大通史”（2018年度）。
- ②姜琦. 祝西北学会成立[J]. 西北学报, 1941(创刊号): 5-7.
- ③成都华西坝因地处“天府之国”又是教会大学, 故称为“天堂”; 重庆沙坪坝条件稍好, 称为“人间”; 陕南古路坝地处山岗教堂, 条件最差, 故称“地狱”。成都华西坝有金陵、金陵女子、齐鲁、燕京等5所教会大学; 重庆沙坪坝有国立中央大学, 连带重庆其他地方有39所; 陕南古路坝, 先后有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西北联大体育系、附属高中、工学院在此, 后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在此完成第二次联合的国立西北工学院, 在其附近和在陕西其他地方者还有西北联大的后继院校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等10余所大专院校。
- ④刘志聪. 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J]. 1941, 1(1): 41
- ⑤姜琦. 祝西北学会成立[J]. 西北学报, 1941(创刊号): 5-7.
- ⑥姜琦. 祝西北学会成立[J]. 西北学报, 1941(创刊号): 5-7.
- ⑦编者. 西北学报发刊词[J]. 西北学报, 1941, 1(创刊号): 1-3.
- ⑧姜琦. 祝西北学会成立[J]. 西北学报, 1941(创刊号): 5-7.
- ⑨当初两个“临时大学”的产生, 顾名思义, 并无久居于长沙或西安的初衷, 改成“联合大学”和“化为西北所固有的大学”是逐渐形成的一个战略思考。
- ⑩姜琦. 祝西北学会成立[J]. 西北学报, 1941(创刊号): 5-7.
- ⑪教育部. 给西安临大电(1937-10-20)[M]//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1: 354.
- ⑫赵慈庚. 西安临大南迁琐记[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255-261.
- ⑬徐诵明. 赴西安, 转赴汉口, 关于校址问题及向教育部报告校务请示各点[J]. 西北联大校刊, 1938(1). 其中的“钩”还是“均”, 有争议, 但笔者倾向于“钩”, 即指蒋中正。
- ⑭刘志聪. 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J]. 西北学报, 1941, 1(1): 41-47.
- ⑮陈剑脩. 迁移经过与校名更名的意义[M]. //姚远. 西北联大史料汇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2: 489-490.
- ⑯沈灌群. 论我国西北高等教育之建设[J]. 高等教育季刊, 1942, 2(2): 30-38.
- ⑰沈灌群. 论我国西北高等教育之建设[J]. 高等教育季刊, 1942, 2(2): 30-38.
- ⑱编者. 教育部特派员黄文弼氏谈新疆教育概况[J]. 开发西北, 1934, 2(5): 32.
- ⑲北平特讯. 教部专员黄文弼谈赴新疆考察经过[N]. 申报, 1934-11-20(13).
- ⑳南京二十日电. 黄文弼谈考察新疆教育经过[N]. 申报, 1934-11-21(13).
- ㉑沈灌群. 论我国西北高等教育之建设[J]. 高等教育季刊, 1942, 2(2): 30-38.
- ㉒姚远, 郭晓亮. 这就是西北联大[J]. 博览群书, 2017(9): 119-127.
- ㉓赖琏. 题词, 西北学术, 1943(创刊号): 1.
- ㉔赖琏. 一个最愉快的回忆[M]//尹雪曼.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 台北: 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
- ㉕赖琏. 教学与卫道[J].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 1942(2): 1-3.
- ㉖陈石珍. 西北建设与青年[J]. 城固青年, 1941, 1(1): 3-4.
- ㉗刘季洪. 勸本届毕业同学[J].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 1944(14): 1.
- ㉘刘季洪. 回顾与前瞻[J].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 1944(4): 1
- ㉙刘季洪. 国立西北大学回忆记略[M]//尹雪曼.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 台北: 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
- ㉚李蒸. 本院的使命与校风(1941年度新生讲词)[J].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 1941(1).
- ㉛李蒸. 略谈西北文化建设[J]. 西北学报, 1944, 3(1).
- ㉜李书田. 黄河水利与西北建设问题[J]. 陕行汇刊, 1944, 8

- (2): 1-7.
- ③李书田. 北洋大学之过去五十三年[M].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1: 403-412.
- ④李书田. 本校之创设及其使命[N]. 重庆: 大公报, 1939-11-20.
- ⑤刁永健. 抗战期中成长的国立西北工学院[J]. 读书通讯, 1943 (67): 15-16.
- ⑥郭鸿文. 考察西北各省羊毛出产实际状况报告[J]. 高等教育季刊, 1942, 2 (2): 55-64.
- ⑦编者. 编后附记[J]. 高等教育季刊, 141-142.
- ⑧张兆荣. 西北各校院迁移问题[J]. 国立西北工学院月刊, 1948 (1): 3-4
- ⑨编者. 国立西北工学院工作近况[J]. 图书季刊, 1940, 2 (3): 495-496.
- ⑩李书田. 北洋大学之过去五十三年[M].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1: 403-412.
- ⑪李书田. 颂辑五汉南水功赋[J]. 陕行汇刊, 1943, 8 (4): 4-5.
- ⑫辛树帜. 致朱家骅书. 1947-08-03.
- ⑬唐得源. 为纪念十三周校庆献言[J]. 国立西北农学院院刊, 1947 (7): 1.
- ⑭王志鹤. 祝三十六年度校庆[J]. 国立西北农学院院刊, 1947 (7): 3.
- ⑮陈宗和. 国立西北农学院[J]. 陇铎月刊, 1940 (10): 23-25.
- ⑯徐佐夏. 民国三十一年元旦本院院刊增刊弁言[J]. 国立西北医学院院刊, 1941 (14-15): 17.
- ⑰编者. 国立西北医学院工作近况[J]. 图书季刊, 1940, 2 (2): 266.
- ⑱黎锦熙. 国立西北大学校史(1944-05). 见姚远. 西北联大史料汇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2: 650-657.
- ⑲孙宝琛. 西北与中华文化[M]//尹雪曼. 国立西北大学卅周年纪念刊, 台北: 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

The Formation of Northwest-oriented Mission of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and Its Successors

Yao Yuan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found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ases in Nanzheng, Kunming and Sichuan and the turn from founding universities scattered along the river or line to gathering them in a whole region,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formation of northwest-oriented mission of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and its five successors which also mixed with other school missions around the world. Those institutions were thought to take specific tasks. National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was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northwestern culture and educ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or restoring the past glories, creating new culture and becoming an actual 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National Northwestern Normal College for training teacher in middle-class schools, National Northwestern Technology of Institute for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National Northwestern College of Agriculture for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growing to be the most complete agricultural college in the region, National Northwestern Medical College for cultivating medical talents, developing health undertakings and improving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All of these thoughts generated a kind of strategic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playing a big part in the regional enlightenment, the practices of services covering cul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eanwhile, northwestern culture also impacted the miss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os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National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National Northwestern Normal College; Nationa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National Northwestern Technology of Institute; National Northwestern College of Agriculture; National Northwestern Medical College;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igher Education of Northwest China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合分成败论

余子侠 王海凤

摘要:“七七”事变后,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下,平津地区的高等院校被迫停办。为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国民政府做出了高校内迁的战略抉择,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等战时联立大学应运而生。西北联大自联立到分设,均受到国联教育考察团、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就“联大”身份而言,无论获得与放弃都过于匆忙,但此校的设立,不仅在特殊时期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保留了血脉,且为战时及战后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尤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大;合分;成败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3-0092-09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其前身是由平津地区多所内迁西北地区的高校联合组建的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自成立至解散,存在时间仅1年零4个月,然而该校的迁办,却为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使得西部地区第一次有其国立大学及高师、高工、高农等高等学府,此举积极影响极为深远。然则既往有关战时联大的研究,多数聚焦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对其也多是褒扬之词,而有关国立西北联大的研究,不仅甚少,且多是批判之言。缘此,本文在爬梳国立西北联大联立与分设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西北联大的“合”因与“分”由,旨在使西北联大于西北地区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得以呈现。

一、国立西北联大的联立与分设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华东等地的高等院校狂轰滥炸,一些校园几成废墟,地处

平津等地的高校纷纷被迫停办。为了不让日寇毁灭我国高等教育的毒计完全实现,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的火种,在教育界享有厚望的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等102位学人联合发声,强调“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要求国民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将部分高校迁往内地续办。随后,此请得到国民政府的应允,国立西北联大也应时而生。

(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联立

“七七事变”后,为使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流离失学,同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国民政府决定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为此,1937年8月,教育部拟定《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在长沙、西安等地暂先设置临时大学一至三所^①。不久,此设想即开始付诸实践。1937年8月31日,教育部决定在西安设临时大学一所,“令(陕省)教厅觅定地址后,即派员筹备”^②。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的应变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6BZS066。

作者简介:余子侠,男,湖北蕲春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二级),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史所兼职教授。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王海凤,女,山西汾西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中外教育交流史博士生。从事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

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 设立西安临时大学”^③。10月18日, 西安临时大学成立, 并于当年11月1日正式开学, 15日开始上课^④。

1938年1月, 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部长。同年3月, 临汾失陷, 关中门户潼关吃紧, 敌寇不时侵入西安轰炸。其时, 国民政府中一些片面抗战论者和复兴社人物借此时机极力主张西安临大迁校, 此议与国民政府教育当局的主张相符。教育部以“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 及为国家根本的教育事业起见”为由, 命令西安临时大学迁往南郑一带。尽管多数师生持有异议, 甚至校常委徐诵明还打电话给陈立夫阐明校方意见, 但得到的答复是“强令南迁”^⑤。

正值全校师生南迁就绪, 1938年4月3日, 教育部下发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该方案规定: “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 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 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 提高边省文化起见, 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 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⑥。”随后, 西安临时大学奉部令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且定于4月18日开学^⑦。据其时记载: “该校员生约一千六百余人迁至南郑、沔县、城固及古路坝等四处, 而以城固为大学本部, 共有学生千人左右^⑧。”校常委陈剑脩报告更改校名的意义时言及: “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 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校合组而成^⑨。”

(二)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设

国立西北联大自成立后, 并没有像西南联大一样稳定发展, 不久即出现了分立。西北联大的分立有两次: 其一是农、工两院的分出独立; 其二是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的分开办理。

教育部于1938年6月始议,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 组建为国立西北农学院^⑩。是年7月, 西北农学院筹备委员会即成立, 原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9年4月, 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与之

同时, 西北联大工学院也开始分开设置。1938年7月17日, 教育部长陈立夫发汉教第6074号令: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为国立西北工学院^⑪。”随后, 勘定陕西城固古路坝为该院院址。1938年12月11日, 国立西北工学院开始上课。

西北联大的农学院、工学院陆续独立后, 西北联大仍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医学院与师范学院^⑫四个学院。1939年8月, 西北联大再次改组。据其时报载: “教育部呈请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 采用校长制, 以专责成, 并将西北联大原有之医学院与师范学院一并独立设置, 分别改组为国立西北医学院与师范学院, 使均成为西北高等教育之基础案。”其后, 行政院“决议通过”^⑬。随之,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⑭。根据大学旧制, 必须有三个以上的学院方可称为大学, 由此, 西北大学遂将原文理学院分劈为文、理两院, 连同法商学院共三院, 仍为西北地区最高学府。

1939年8月, 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奉令独立设置, 9月1日,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正式成立^⑮。校址设于陕西城固, 院长仍为李蒸。时隔一年后, 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西北师范学院由城固迁至甘肃兰州, 并规定兰州为该校的永久校址。1942年, 西北师范学院由城固迁兰州, 城固本院则改称分院。截至1944年底, 国立西北师范全部迁往兰州, 城固分院宣布撤销。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几乎同时, 国立西北医学院也从西北联大中分出独立设置, 校址设于陕西南郑。1945年夏,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 “将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建制撤销, 并入设在陕西的国立西北医学院, 改名为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⑯。由是,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被教育部横刀一分为五。

二、国立西北联大的“合”因与“分”由

秦汉以降, 尤其汉朝“太学”开办以来, 陕西一直属于全国文教发展的重镇。唐宋以后, 随着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东移及南迁, 西北地区的教育在全国的地位逐渐衰落。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 为发

展中国教育, 开始寻求国际上的援助。抗战全面爆发后, 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事业, 同时也为进一步开发西北地区以适应战时需要, 国民政府根据西北教育现状, 接受国联对中国教育发展布局的意见, 在陕西成立西北联大。然而, 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西北联大经常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抗日宣传及运动, 为防止学生被共产党拉拢, 同时为控制西北地区社会稳定, 国民政府决定分立西北联大, 借以将师生散布到西北各地。其时, 西北联大各校之间的内部矛盾, 正好成为一个导火索, 于是在国民政府的授意下, 西北联大宣布解散。应该说, 这些即是国立西北联大的“合”因与“分”由。

(一) “国联”对中国教育发展布局的意见

近代以来, 中国社会的变迁走向一直遵循着新型的国际运行轨道, 中国的学校教育也依循着国际教育变革发展的走向而不断地变易和改革。尤其在新型学校制度确立后, 中国教育事业的变化无不与世界教育的改革潮流相互激荡且归流其中。主要原因在于, 中国的政治制度难接西欧美日诸国之踵, 尤其是经济发展难供各地学校教育现代化建设之续。

1931年5月, 在国际联盟行政院主持的会议上, 中国政府曾以一种改革计划的准备与实施, 请求国联专门机构的协作。其后, 国联行政院应我国政府请求, 由国际文化合作社委派4名专家组成教育考察团^⑦来华考察, “以谋中国教育制度之改进与中外文化之沟通”^⑧。他们于是年9月30日抵上海, 在华考察历三月之久, 所到之地有“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定县、杭州、无锡、苏州、镇江、广州等处”^⑨。其后, 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了一份“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 对中国教育行政和高等教育等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较为适用的建议。其中, 于后来西北联大成立有影响的建议主要有两点: 一是建议现时中国高校同处分设者合并办理; 二是现时中国大学布局应进行合理的调整。

截至1931年9月止, “中国现有大学总数为五十九校, 大学生三三、八四七人, 其中国立大学十五校, 学生一一、五七二人, 省立大学十七校, 学生五、九一〇人, 立案之私立大学二十七校, 学生一六、三六五人”^⑩。考察团认为, 此种情形为

此前中国“大学热”时期遗留的结果, “今欲将良好之结果保留, 使恶劣之结果消灭, 其所需要, 不在大学之扩充, 而在大学之合并”^⑪。其方法则是, 同在一城市内或其附近, 若有数个公立大学, 教育部应即根据全国大学会议之建议, 设法裁剪之。应该说“同处分设者合并办理”的建议, 为后来战时联合大学的成立埋下了伏笔。

在中国大学的分布问题上, 考察团认为, 中国大学布局杂乱无章, 同一区域内设立数所大学, 所进行之工作又几乎相同, 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如中国高等学府皆集中于北平、上海等地。其后, 为使中国大学分布均匀, 国民政府借助高校西(内)迁的战时教育应变举措, 于云南成立“西南联大”, 于陕西成立“西北联大”。随之为避免同一区域聚集多所大学, 国民政府又下令分立西北联大, 并将分立的各校散布西北各省。由中不难看出, 国联的建议确实影响了战时中国大学的布局, 成为后来西北联大合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 抗战胜利后时人对战时及战后高等教育的应变与发展进行总结及批评时就有过说明。如其时大夏大学教授欧元怀即言: “抗战以前的大学, 确如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指摘与建议, 地理分配不合理, 学分制有流弊, 入学的青年不多。”虽说经过了战时内迁和战后复员的调整, 但与“十年前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批评, 除了集中趋势的地点有不同外, 集中趋势还是一样”。“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⑫。

(二) 西北地区学校教育历史发展的现状

清末以降, 西北地区即积极致力于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创办, 然而经济发展的滞后和文教基础的薄弱, 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极少。为了对高校西迁前西北各省区高等教育机构有一个基本的总体性了解, 现借助相关史料将清末至抗战前西北各省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创办与变迁情形列表示下。

尽管西北地区近代高等教育的变迁仅以一表示之, 但不难看出该地区在清末兴学之初, 高等教育起步的势头并不比东部各先进省区滞后, 但在后来尤其进入民国之后, 愈来愈无发展之力, 以致迄于全面抗战前夕, 该地区的高校寥寥无几, 真正算得上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校, 合计不过区区3所: 国立西北农林学院、省立甘肃学院和省立新疆学院。即是

表1: 抗战前西北各省区高教机构沿革表

	晚清时期 (1901—1911)		民国前期 (1912—1927)		国民政府前期 (1927—1937)	
	校名	历史沿革	校名	历史沿革	校名	历史沿革
陕西	关中大 学堂	1902年开办, 1905年改为高等学堂; 1912年该学堂改为“西北大学预科”。	陕西公立法政 专门学校	1912年由前清法政学堂改立。	西安中山 大学	1927年设立; “西北大学”停办后, 联军总司令部即着令以西北大学校产、经费改办“中山学院”, 不久又改为“西安中山大学”; 1931年初该校即告消亡。
	宏道大 学堂	1902年成立, 由原味经、崇实二书院归并宏道书院而成, 其后改为“宏道高等学堂”; 1909年因种种原因改为“宏道中等工业学校”。	国立西北大学	1924年由陕西、甘肃合办: 1912年陕西法政学堂改为关中公法政大学, 不久以此校校址成立关中大学, 其后, 将“三秦公学”并入, 改为“西北大学”; 1915年遵教部令改为“陕西法政专门学校”; 1923年蔡屏藩等又筹建国立西北大学, 1924年陕、甘联手以国立的名义再次办成西北大学, 后于1927年停办。		
甘肃	甘肃大 学堂	1902年筹办, 《钦定学堂章程》出台后, 改为“甘肃高等学堂”; 1903年秋, 新校舍建成, 改名“甘肃文高等学堂”; 辛亥革命爆发后, 本科、预科全部毕业, 学堂改为“全省中学堂”, 但实际上已停止教学活动。	甘肃法政学堂	1909年创立, 是民国初期甘肃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 1913年改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1926年改设工业专门学校。	兰州中山 大学	1928年2月, 以甘肃法政专门学校为基础改建成立; 1929年改为“甘肃大学”; 其后, 因与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组织法》不符, 1932年改为“省立甘肃学院”。
	高等学 堂	1901年在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创办; 1906年因新任提学使天津人杜子丹“注重实际”, 以其“生徒程度不齐”而改设为“中学堂”。	俄文法政专门 学校	1924年在迪化创建; 但此校到1928年才有第一届学生毕业。	新疆学院	1931年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改名为“新疆俄文法政学院”; 1934年改为“新疆学院”; 1935年1月1日成立。

资料来源: 余子侠, 冉春著: 《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注: 西北地区各省区还应包括宁夏和青海^⑤, 全面抗战爆发前, 此两省高等教育一片空白。

说, 在广袤的中国西北部, 这一面积为3549万平方公里、人口计2133万的广大区域^⑥, 所拥有的高校数在全国108所高校中占比仅有1/36, 即不足2.8%, 而且其办学规模、教学质量和学校档次均处最低层级。抗战全面爆发后, 东部地区相继沦陷, 中国若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不得不将沦陷区的高校迁出, 也可借机改变地域广阔的西北地区高校稀缺的窘况。基于此等原因, 国民政府于西北地区安置国立西北联大, 无疑恰逢其时、适得其地。

(三) 国民政府战时教育应对政策的变化

抗战时期, 西北联大的合分与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的变化有莫大的关系, 甚至可以说, 国民政

府战时教育应对政策的变化是导致西北联大合与分的主要因素。

抗战全面爆发后, 平津等地相继沦陷, 在此特殊情状下, 国民政府迫于战事的发展态势, 在教育政策上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是年8月, 国民政府出台《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 无疑是想借高校内迁, 趁机将一批高校直接收归麾下, 进而更好且更有效地在文教领域控制西北地区。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 做出“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抉择, 其中即包括高校内迁的举措。1938年, 国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 具体负责全国高校的迁建工作^⑦。正是在这种政策和措施的实施背

景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才得以合组并以“联大”的办学模式而设立。

其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其中提出“农村需要和工业需要并重”的方针。为配合此项方针，教育部将西北联大进行第一次分立，于1938年7月将西北联大农学院、工学院分出独立。自是而后，由于陈立夫大力推行“分区大学制”，而西北联大的存在与“分区大学制”的指导思想不符。故而，1939年3月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教育改进案》中规定：“教育部应斟酌各地交通、人口、经济及文化等情形，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至少设立大学一所”“每一师范学院区，设师范学院一所”“就适当地点，统筹设置农、工、商、医等专科学校”等^②。这就为国立西北联大的再次分立奠定了政策基础。

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西成为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地区，加上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使西北联大“犹如一所战时大学”^③，这使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为防止学校成为革命青年从沦陷区到延安的中转站，国民政府受“攘外必先安内”心理定势的影响，更加深了对西北联大的严格控制，毫不夸张地讲，西北联大的发展走向完全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直接掌控在手。这从以下事例可见一斑：1938年9月，徐诵明请辞法商学院院长，并决定聘鲁迅好友许寿裳继任，此消息传开后，进步师生拍手叫好，教育部却深感不满，随即电令西北联大，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按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为教育部任命，各院院长应由校长聘任。此种由教育部直接任命院长的举措，自然引起校内外强烈反对。面对此种现象，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解聘进步教授、开除学生、加紧特务渗透等办法。其后，面对师生愈演愈烈的正义呼声，国民政府竟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宣布解散西北联大。国民政府解散西北联大的决定看似相当随意，其实早在陈立夫极力推行“分区大学制”时，就生发分立西北联大之心。可见，国民政府对西北联大控制之强及分立之举蓄谋之久。

要言之，西北联大的联立与分设，可以说全由国民政府有意为之。值得提及的是，战时国民政府

严密控制学校教育事业，其时人们称之为“统制管理”。直至抗战胜利后，时人在评析战时高等教育应变发展时，虽多加以肯定，但对此种专制手段大加批评乃至抨击。如前引欧元怀的文章即有如是不满言辞：战争爆发后，“政府为了配合政治作风，有意或无意地逐渐走着统制管理的道路，甚至于大量扩充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教育部的人数增至在二倍以上”。此种“统制管理”，于战时高校而言，其表现除“统一考试”“统一课程”和“试编大学用书”外，最严厉的措施即在于“划一行政”“统制教员”和实施“训导制度”。其目的自然在于，借此等举措实行统一控制！自是而后，直至国民党政权败亡大陆，一直“企图走着统制主义的路线”^④。

（四）组合西北联大各校自身存在的矛盾

自1938年4月成立，至1939年8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强令解散，西北联大存在时间仅1年又4个月。该校分立的原因，从某种角度上讲，与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不无一定的联系。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若多校组合而没有矛盾和门户之见，才属不正常！而于此点，既往有关研究认为，各校间的内部矛盾是导致西北联大分立的主要因素，但由前文所述不难看出，西北联大无论“合”与“分”，皆是政府行为也是政府作为。因此，可以这样说，各校间存在的矛盾，应该算是促使西北联大分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可以说，它是西北联大分立的一个导火索，促进了该校解体的进程。

西北联大毕竟是几个院校临时捏合在一起的、比较庞杂的战时“大”学校，“原各校之间门户之见、派系之争，闹独立性者是常有之事”^⑤。加之，组建西北联大的部分领导人之间不和睦，内部也存有分立的想法。如工学院李书田自1932年接任院长后，一心致力恢复北洋大学，1937年2月，他起草了国立北洋大学分期完成计划，不久即被推为恢复北洋大学筹委会总干事。因此，他虽是西北联大的常委，但分离之心早已有之，同时，他与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是留德同学，他的要求自然得到陈的同情和支持。身为教育部特派员的陈剑脩，本应起维护平衡的调节作用，但他目睹三院校之间各自为政、矛盾重重，他一人单枪匹马，也无济于事。

不久,以一种躲避责任的心态请辞西北联大常委职务,转赴陷入战区的湖北省任教育厅厅长^③。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西北联大虽是一个整体,但“各校仍同时挂原各校的校牌,带原各校的校徽,无论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④。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北联大在西安临时大学与联合大学期间,虽有形式上的统一,但各校仍相对独立地组织教学活动,学生毕业时所发毕业证书上皆有原学校的公章。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曾有这样的记述:“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蒋梦麟说,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⑤。”由此可以看出,西北联大各校之间确实存有一定的内部矛盾。尤其作为旁观者的国立西南联大的重要人物如蒋、冯等人,应该说对此种不和谐因素及其必将带来的后果看得更为清楚——这种看得清自然也包括与自己所处西南联大的情形加以比较后的认识成份。所以说,这些内部矛盾及斗争,无疑加速了西北联大的分立。

三、国立西北联大的历史功过评析

自新式教育开办以来,西北地区虽然同其它省区一样积极创办高等学堂,但由于资源有限,虽经过30余年的努力,最终开办的数量屈指可数。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适势应变,为开发西北,整合高校资源,于陕西设立国立西北联大。其后,为发展西北地区的学校教育事业,国民政府又将该校分开设置,并将独立后的各校分布于西北各省。抗战胜利后,同时期创办的西南联大主体复员迁回平津,而西北联大主体则留在西北大地。因此,西北联大的设立及分办,既调整了战时高校布局,又奠定了西北教育尤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基础,为战时更为战后西北地区留下了一个包括工、农、医、师范、法商及综合大学的高等教育体系,为西北地区教育的进步和提升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一) 战时学校教育布局调整的需要——应时之需

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无论国立、省立抑或

私立大学,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布局十分不合理。对此,前文已揭。国联教育考察团也认识到这种不合理的问题,并为此提出多条建议。其后,经过多方商议,国民政府采纳了国联的建议,并在1936年颁行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⑥。”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命平津两地多所著名高校分别迁往长沙、西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初设在长沙,1938年2月迁往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洋工学院等则直接迁往西北,落户在地域辽阔而高校稀少的西北地区。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问题,国民政府已在考虑布局的调整,据战时曾任部长的陈立夫回忆:“我在决定各校迁移地点时,也会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⑦。”1938年,国民政府《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⑧。”仅就此即可看出,国民政府为调整高校在战时的布局,将西北联大分立的各校散布于西北各省,其目的即在于借以促进西北地区教育的平衡发展。质是之故,西北联大无论是合是分,都满足了国民政府战时教育布局调整的需要,同时也是高教事业战时应变的重大举措。

(二) 战时高校教育资源整合的需要——必然之举

全面抗战时期,教育部以战区内学生“不应失教失学,并当训练各种专门人材,以应国家非常之需要,特设临时大学以资救济,意远旨宠[宏],洵为国家百年教育至计”^⑨。西北联大前身西安临时大学成立时,校舍及师资等资源均相当缺乏。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组建一所大学都相当困难,若是数所高校均按移迁前分别设立,仅设备及师资就不可能实现。其时的中国,有些高校师多生少,造成资源浪费。西北联大的设立,使各校的师资皆得到充分利用,且于图书、设备等可以“抱团取

暖”，有利于减少战时资源的浪费。

民国时期，中国国立及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靠中国政府或省政府供给者，占十分之九以上”^②。因此，西北联大的联设，为战时国民政府节省了一大批经费。更值得提及的是，若在同一地方分设若干大学，则大学教员的教授能力较难充分的利用。此外，各大学之间亦有同一科目分数种课程的情形，若每所大学各自聘请教职员，且编制的课程相互重复，则会浪费部分资源与经费。诚如国联教育考察团所言：“若能尽量取消多数不健全之大学，而代以少数力量充实之大学，则关于提倡研究，发展现在所忽视之学科，改良教员之待遇，造成师生间较亲切之关系等等，自易采行一种高瞻远瞩之政策^③。”因此，西北联大的组建，不仅是战时教育资源整合的必然之举，也是有效之举。这一点从后来分立为多校后，各校之间仍然相互协作合用资源得到有力的反证。

（三）夯实西北学校教育基础的需要——应然之作

抗战爆发前，西部地区有限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多集中在西南地区，尤以四川省为多。如国立四川大学、省立重庆大学、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等。其它省区，则广西有广西大学，云南有东陆大学、省立云南大学等。反观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极其缓慢，几乎没有一所成气候的高校。有鉴于此，西北联大设立于西安，可以说是西北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历史新起点。抗战期间，西北联大历尽劫难，且在一年多时间内两次转迁，却坚持办学，传承薪火，为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战时及战后高等教育的持久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历史基础，同时也为西北地区教育的发展构建了基本框架。

组建西北联大各高校的西迁及西北联大各部分在西北的分立，使高教事业基础极为薄弱的西北地区，早在抗战后期就有了极大的改观和发展。据1940年7月间的一份统计材料显示，其时，西北境内高校已计达10所，其中大学1所（国立）、学院6所（国立4、省立2）、专科3所（国立、省立、私立各1）^④。这个数据在战时开办的高校总数中几近1/11。抗战胜利后，西北大学于1946年夏迁回西安办理，并将西北医学院并入；西北农学院成为后来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西北工学院于1946年3月迁至陕西咸阳，解放后与华东航空学院^⑤等合并

为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学院除部分师生于1946年6月迁回北平，大部分仍留兰州……至1947年，即抗战胜利仅一年有半，西北地区的高校即增至12所之多，为战前的4倍之数^⑥。由此可见，抗战胜利后，西北联大的主体继续驻留在西北大地，至今在西北办理的高校，除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与西北联大有着直接的源流关系外，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工程大学等大专院校都与西北联大存在间接的源流关联。

（四）数所“联大”贡献的同异——历史回眸

全面抗战时期，内迁高校借合并以联合方式办学者，就联办时间而言，以私立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于1937年10月奉教育部令迁校联办最早；就联办规模而言，则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最著；就联办校名而言，又有西北联大、西南联大、东南联大及华北联大诸校问世。然则，就战时联办成效及对战后历史贡献而言，自然数西南、西北两校影响最显。其中国立西南联大的贡献和影响，人们早有诸多评说，尤其在抗战胜利后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段中更是这样，前者是对西南联大政治斗争的肯定，后者是对西南联大造就人才的褒扬，由是西南联大为世人所“闻”而“扬”名天下。比较而言，西北联大因过早分立，各校散布于西北大地，人们宣传和研究时自然难以“聚焦”。缘此，在今人的心中、眼中，似乎其办学条件、学术氛围及办学环境尤其教育成效及影响方面，西北联大较同时期的西南联大存在相当的差距。然而，征诸历史实际，西北联大亦有所长，尤其对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的推进而言，西北联大的贡献不容后人忽视。限于篇幅，现仅就该校对迁驻地区基础教育后续发展而论。

在抗战胜利后各内迁高校复员之际，西北联大由北平西迁的原北平师大“改装”而成的师范部分，其时已独立为西北师范学院，基本上仍留守西北，这一决然而断的重大举措，对西北地区素来贫瘠的基础教育进步和发展而言，其历史贡献功莫大焉！

民国以来，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一直发展缓慢，水平较低。全面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无疑是一场空前绝后的高等教育事业和知识精英的战略大转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自联立到分设，存在时间

虽短,但组成西北联大的几所院校以其较好的基础和较强的实力,为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打下了持续而坚实的历史基础,缩短了该地区在教育上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虽然西北联大从联立、分设到复员均受到国民政府的干预,各校之间也存有一定的矛盾与斗争,然而该校的存在,确实奠定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历史基础,尤其是陕甘两省的现代高等教育架构。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从抗战前的寥寥无几到如今的燎原之势,西北联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如一掌五指覆盖陕甘大地,通过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传衍,其于整个中华民族教育事业乃至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可谓功在基业千载,泽被西北半壁^④。”早在抗战时期,时人就有预见性地评说:“高等教育机构的内迁,并非一种纯粹不幸之事。因为她们所迁之地,过去在文化上是未开发之区,科学知识观念的传播,有助于推动国家内地的现代化^⑤。”过去的变化已经证实了这种预见的正确,将来的发展仍将证明这种正确的论断!

注释

- ①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编:《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 ②《西安将设临时大学》,1937年9月1日《申报》。
- ③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1895.10—1949.1)》第1卷,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页。
- ④《西安临时大学定期开学》,见《中央通信社稿》1937年10月上;《西安临时大学月中开课》,见《中央通信社稿》1937年11月上。
- ⑤李永森主编.《西北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 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 ⑦《西安临大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4月16日《申报》。
- ⑧《徐诵明等到汉报告西北联大状况》,1938年5月30日《申报》。
- ⑨李永森主编:《西北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 ⑩关联芳主编,朱振国编.《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34—1984)》,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 ⑪张建主编:《见证并记录:百年建大老新闻(1895—2006)》(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 ⑫1938年,西北联大的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训令三: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西北联大校刊》1938年第2期。
- ⑬《行政院决议西北联合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1939年8月9日《申报》。
- ⑭《西北联合大学改西北大学》,《教育通讯》(汉口)第2卷(1939年)第32期。
- ⑮李蒸.《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发刊词》,见《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39年第1期。
- ⑯周正荣主编.《兰州大学校史·医学编(1933—2004)》,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 ⑰这4人分别为:柏林大学教授前普鲁士教育部长柏克氏、波兰教育部初等教育司长法尔斯基教授、法兰西大学教授耶吉梵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教授叨尼氏。其后,在中国加入本团者复有代表国际教育电影社(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Cinematography)之撒狄君(Baron A. Sardi),国际文化合作社(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社长波内(M. Henri Bonnet)二氏。
- ⑱《国联教育考察团建议改革中国教育之初步方案》(上),1932年12月20日《申报》。
- ⑲《国联教育考察团建议改革中国教育之初步方案》(上),1932年12月20日《申报》。
- ⑳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编.《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 ㉑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编.《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 ㉒欧元怀:《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
- ㉓宁夏、青海于国民政府前期相继独立设置:1928年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9次会议决议建立宁夏省,省治宁夏(1941年改称贺兰);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决议设置青海省,159次会议上又决议定西宁为省治,1929年1月20日,青海省政府正式成立于西宁。
- ㉔此处西北地区面积和人口数据,抗战全面爆发后所计。参

- 见《西北六省人口面积》，1939年11月26日《申报》。
- ②⑤余子侠，冉春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页。
- ②⑥李友芝、李春年、柳传欣、葛嘉训编。《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史资料》第2册（内部交流版），第673—674页。
- ②⑦李永森。《民国年间西北大学三次建校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 ②⑧欧元怀。《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
- ②⑨李永森主编。《西北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 ③⑩参见李永森主编。《西北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8页。
- ③⑪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等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1卷，天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
- ③⑫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页。
- ③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7页。
- ③⑭陈立夫著，王云五主编。《战时教育行政回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9页。
- ③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 ③⑯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 ③⑰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编。《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
- ③⑱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编。《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
- ③⑲蒋致远主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宗青图书公司1991年版。注：据战时《全国教育统计简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233），1941年（学年度）时，全国高校计有113所。
- ④⑰包括原中央大学航空系、交通大学航空系和浙江大学航空系。
- ④⑱《战后中国的大学教育》，见《教育杂志》第32卷第1号，1947年7月。
- ④⑲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联办的历史解析》，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15年第4期。
- ④⑳韦卓民。《三年来的中国战时教育》（英文），余子侠、郑刚整理：《韦卓民全集》第10卷“教育实录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页。

On the Association and Division of National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Yu Zixia Wang Haifeng

Abstrac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Peiping, Tientsin (today's Beijing and Tian Jin) experienced a compelled shutdown under the violence of Japanese invaders after the July 7th incident in 1937. In case of interruption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hiang Kai Shek's government decided to move them inland, thus giving rise to a united university during the wartime like National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The association and division of National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were constantly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Experts' Investigation Deleg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wartime. Therefore, the university experienced a hasty acquisition and abandonment in terms of its identity but its foundation not only kept the essence of our higher education undertakings but also laid a solid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northwest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time.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ll-round; National Foundation;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Association and Division; Success or Failure

新业态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预防对策

刘丹冰 黄菁茹 代水平

摘要: 伴随着科技革命而来的新业态在方便生活的同时,也产生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问题。调研发现,新业态对社会稳定影响的经济根源是拜金主义,而观念落后是思想根源,现有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是制度原因,政府网络监管存在漏洞、行业自律的缺乏等是执法层面的问题。因此,政府管理中既要重视预防又要更新观念,应该建立、完善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对特殊人群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专门保护,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加大惩处力度。

关键词: 网约车;技术中立;网络谣言;网络游戏

中图分类号: D922.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3-0108-07

一、引言

科技革命带来社会的巨大变革。因信息技术革命与消费者需求倒逼呼啸而来的产业升级、转型、新生,以新业态的形式出现。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对不同产业间的组合、企业内部价值链和外部产业链环节的分化及融合、行业跨界整合以及嫁接发生巨大影响,新型企业、商业乃至产业的组织形态层出不穷。网上购物、丰富视频节目、指尖一动服务就来等在方便我们生活的同时,个人信息泄露、诈骗信息、黄色污染、网络谣言、非法集资、消费者被侵权等问题也困扰着每一个人,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课题组对新业态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预防进行专题实证研究。

虽然学理上界定新业态不是很难,但实际上具体界定、划线时才会发现,新业态所涉领域是极其广泛的。为了调研需要,在本文中,不特别纠结于新业态概念和范围的界定,而是采用宽泛的定义,将所有因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所带来的产业变化,均作为新业态对待,并特别集中在与社会稳定相关产业、产品和服务上。因此,课题组对新业态对传统

行业的冲击、网络涉黄、网络谣言、网络游戏中的法律问题等进行了调研,收到有效调查问卷798份,其中网络问卷588份。

二、新业态对传统行业的冲击及传统行业转型中的法律问题

(一) 新业态对传统行业的冲击与影响

新业态对传统行业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资料显示,互联网新应用到2025年最多可创造46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但因生产力提升将减少1.3%—4.0%的用人需求,折算过来,相当于1000万—3100万个工作岗位^[1]。

首先,新业态成为传统行业倒闭的冲击器。倒闭是企业经营不可避免的,但因为新业态加速传统行业倒闭确是不争的事实,课题组的问卷答案也说明了这一点。对“当网络购物成为许多人的必不可少时,传统实体商家和企业的倒闭就变为现实。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的回答显示,67.4%的公众认为这是时代潮流,28.7%的公众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来应对传统实体商家和企业的倒闭带来的失业、经济下滑、消费者利益受损等状况。

作者简介: 刘丹冰,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从事经济法学研究;黄菁茹,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法学院讲师。从事知识产权法学研究。

其次,新业态成为传统行业转型的催化器。94.9%的公众认为网约车的出现会产生有利影响,仅有5.1%的公众反对网约车的出现。针对网约车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击、出租车司机因抗议网约车进行的集体聚会等问题,66.5%的公众认为传统出租车行业应当自我检讨,因为其确实存在着绕道、不打表收费、拒载等问题。因此,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就成为必然。

最后,新业态成为传统事业扩容的加油器。就慈善公益事业而言,在灾难来临时我们感觉很近,但在平常的日子里却觉得其离我们很远。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很多,但传统慈善公益总是需要较强的“仪式感”,需要捐赠人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个人要想申请加入红十字会成为其志愿者,需要填写相关的登记表,并在所在地红十字会备案,经报县及县以上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批准后,才能配发志愿者证、志愿服务卡等,成为红十字志愿者。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的现代社会,这样繁琐的手续,确实一定程度上削减社会公众从事慈善公益的热情。但互联网解决了上述问题。不仅传统慈善公益组织会通过互联网办理相关工作,而且因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业态,更为慈善公益扩容提供了条件,慈善公益在新业态下发生重大变化。以腾讯为代表新业态,推出了许多“互联网+公益”项目。有了腾讯乐捐与路人甲,出了微信运动与MOOC,还有众多小切口广连接的互联网公益项目正在不断推陈出新,跨界、众包构建着一个协同众创的新生态。“互联网+产业”背景下的公益3.0,无疑正在快速变革并颠覆公益时代^[2]。

(二) 传统行业新业态冲击下的问题

首先,传统实体商业机构倒闭带来的员工失业及连锁债务问题。网络购物对传统商业流通企业的致命冲击,也同时影响了社会稳定。在整体经济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传统实体商场的关门倒闭已经成为现实。虽然债务问题的解决是市场主体个体问题,但在经济体内部复杂多样的情况下,连锁债务的隐患不容忽视。

其次,传统商业机构倒闭带来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在信用交易的今天,预付消费普遍存在。预付卡有利于商家拓展业务,也给消费者带来便利。但在新业态冲击传统商业机构的情况下,消费者权益受损不可避免。课题组设置了“您是否在商场、美容院、汽车维修等实体企业购买过预付卡”及“您是否

遭遇过预付卡尚有金额,企业关门(跑路)而利益受损的事?”两个问题。统计结果显示,68.5%的公众表示曾经购买过实体店的预付卡,遭遇过企业跑路、利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占到了受访者总数的48.2%。

再次,网络慈善公益不够规范带来的混乱。问卷显示,有57.23%的受访者曾经参与过网络慈善公益活动,但也有58.82%的受访者表示对目前网络公益活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在质疑,认为有些混乱。“罗一笑事件”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上述三个方面及类似网约车和出租车冲突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主要表现在抱团集会、请求政府保护其权利的过程中,可能带来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形。

三、伴随着新业态而来的网络涉黄法律问题

(一) 网络涉黄是一个普遍现象

网络涉黄是指视频网站、网络直播平台、社交软件、网盘等网络运营服务商及用户利用以上工具传播、贩卖淫秽色情信息的行为。“2016年互联网第一案”“快播涉黄案”于2016年1月7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最终被告单位深圳市快播公司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处罚金,而其公司主要负责人也因该罪,判处有期徒刑等刑罚。

问卷显示,上网时被迫(网络自带)遭遇黄色视频、信息的情形高达93.55%左右。另外,网络涉黄还引发性犯罪和其他犯罪行为,对性疾病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并导致全社会的道德紊乱与沦丧。

(二) 网络涉黄的表现

第一,网络涉黄传播面广,接受者众多,青少年群体为主。2015年浙江丽水“11·16”网络传播淫秽物品案中,“交友乱聊群”“黄视频”等QQ(微信)群涉嫌传播淫秽物品,共传播淫秽视频23000余部、淫秽图片4000余张、淫秽视频下载链接500余条。上述QQ(微信)群内成员多达2800余人,涉及全国10多个省市。这些案件还涉及多家网盘服务企业^[3]。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以10—39岁群体为主。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10—39岁群体占整体网民的73.0%。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

网民占比最高,达30.0%;10—19岁、30—39岁群体占比分别为19.6%、23.5%^[4]。可以这么说,网络涉黄的最大人群是青少年。

第二,网络涉黄行为人的隐蔽性。在因特网构成的虚拟空间中,参与者的身份虚拟化,任何人都可以带着假面具将自己推上网。因此,行为人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到某省、某市甚至某国进行;行为人对结果发生的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作案时间短,长则几分钟,短则几秒钟;违法行为不留痕迹,没有特定的表现场所和客观表现形态,不易识别,不易被人发现,不易侦破,犯罪系数高。这种行为手段的隐蔽性给网络管理和执法带来了巨大困难。

第三,涉案情节严重,数额巨大。2016年浙江绍兴“5·26”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中,以李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淘宝网店以及微信、QQ等方式,以1至30元不等价格贩卖多类云盘账号,云盘内含有大量淫秽色情视频文件,容量高达2T—50T。该犯罪团伙上、下线超100人,遍布全国27个省(区、市),非法获利共计至少600余万元^[5]。

第四,网络涉黄方式多样性,网络色情传播变成了娱乐性活动。网络涉黄主要通过网络直播间、微领域以及其他网站等进行。

四、随新业态、自媒体时代而来的网络谣言法律问题

网络谣言既有针对公民个人的诽谤也有针对公共事件的捏造,其传播具有速度快、影响广、难控制、危害大等特点。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小而败坏个人名誉,给受害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大而影响社会稳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甚至会动摇国家政权。网络谣言的生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事件或信息本身因素决定的。网络谣言所涉事件或信息的下述特点:一是所涉事件的敏感性。与明星、政治人物有关的敏感事件,通过捏造事实不仅能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又能满足很多人的好奇心;二是所涉消息的重要性。事件越重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越是紧密,越容易滋生谣言。因此,谣言往往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以后,

造谣者利用人们的急切心理,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进一步发挥,夸大延伸,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三是所涉事件叙事的模糊性。当某些民众关注的焦点事件,未及时向社会公开或缺乏主流权威信息,民众的信息需求难以满足时,就容易被网络谣言所诱导;四是所涉事件结果的不确定性,如“7·23温州动车事故”的死亡人数。五是解读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解读,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却是有意而为的。

第二,人为因素。谣言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猎奇心理、盲从心理、宣泄心理,变革转型时期之整体浮躁心理体现的负面情绪弥漫、弱势心态作祟、信任危机蔓延、名利争夺失当等。

第三,技术因素。具体表现为网络的开放性、网络的匿名性、建立和注册网站简捷性、网络信息的互动性

第四,制度因素。具体表现为政府对网络谣言的防范意识薄弱、疏通引导滞后、防治策略单一、监测力度不够以及公民意识和科学知识的欠缺。

五、网络游戏新业态产业带来的法律问题

(一)网络游戏是互联网产业的重要经济支柱

网络游戏是指由软件程序和信数据构成,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提供的游戏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大体上可分为休闲益智、对战、角色扮演和功能性等四类。不同内容及类别的游戏,其盈利模式也有各自的特色,目前网络游戏的收费主要有道具收费、时间收费和客户端收费三种。

网络游戏发展至今不仅成为大部分网民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我国互联网产业的重要经济支柱。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3.91亿,占整体网民的55.1%,其中手机网络游戏用户规模为3.02亿,较去年底增长2311万,占手机网民的46.1%。而在经济发展方面,2015年中国网络游戏行业包括客户端游戏、网页游戏和移动游戏的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1345.8亿元,同比增长23.9%^[6]。

(二)网络游戏引发刑事犯罪

第一,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据统计,我国网民规模已突破6亿,其中,16岁以下的少年网民数量约占两成,即1.2亿左右。青少年上网时

间主要集中于游戏、社交、看影视剧等。

网络游戏消费成为青少年犯罪目的。由于网络游戏会在游戏的过程中设置一系列的收费模式进行盈利,由此网络游戏需要玩家花费一定金钱支撑游戏的继续。对未成年人而言,其家用零花钱是不足以支撑网络游戏花费的,由此出现了青少年为支付网络游戏费而进行的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

网络游戏中的暴力及色情文化传播成为青少年犯罪的重要诱因。在中国有高达95%的网络游戏宣传暴力思想。青少年在游戏过程中产生的“共同意识”可能对网络暴力游戏产生不可遏制的依赖感。这种“共同意识”是一种不受法律与道德的约束,将个人暴力欲望发挥到极致的一种影响,不仅仅涉及到玩家在虚拟世界中肆意的杀戮,甚至还包含使用各种残暴的武器,获得血腥的场面等。这样的游戏刺激着未成年人的视觉及听觉,从行为暴力、语言暴力等角度引诱青少年模仿。而涉黄、涉赌不仅满足了青少年的猎奇心理,而且较易引诱青少年模仿这些行为。

第二,网络游戏对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影响。本文以“网络游戏”为主题对我国现有的司法案例进行了梳理与统计,共涉及判决1298份,其中主要涉及三大类犯罪行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210件)、侵犯财产罪(535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417件)。其中“私服”“外挂”等行为涉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成为盗窃罪的对象,网络游戏服务成为新的诈骗模式,网络游戏成为赌博的新模式(186件),网络游戏成为毒品交易的结算平台,利用网络游戏进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也不少(110件)。

(三) 网络游戏带来的民事纠纷

在涉及网络游戏的2800件民事案件中,2261件案件属于婚姻家庭的纠纷,711件知识产权纠纷涉及网络游戏。

第一,“沉迷于网络游戏”成为离婚的重要理由。在涉及网络游戏的2261件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提出离婚的主要理由中,沉迷网游高达97%。沉迷网络游戏的一方通常不仅仅没有时间陪伴或者关爱家人,而且因没有正常的工作无法承担抚养家庭的经济责任。

第二,著作权是网络游戏中受到侵害最大的知

识产权类型。在涉及网络游戏的711件知识产权纠纷中,与著作权相关的案件占到74%。原因在于游戏本身的情节、画面、角色、装备、关卡设置等游戏元素均涉及著作权,另外,还有相关的文字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等。网络游戏随着平台功能的增大,对作品的传播也产生重大影响。

六、新业态影响社会稳定的成因及其应对之策

(一) 新业态影响社会稳定问题发生的成因

第一,拜金主义是新业态影响社会稳定问题出现的经济根源。对金钱的追求,导致有些人每时每刻地想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利润,“赚钱”成为一切活动的目的。当其渗入到了文化领域后,一些文化活动被简单地商品化;一些文化工作者没有社会责任感,“钱”成了文化作品的目的;一些媒体为了所谓的市场占有率,一味迎合低级、庸俗的趣味,甚至纵容错误的东西招摇过市^[7]。譬如网络涉黄问题。由于点击量与浏览量的增加是网络平台最主要的盈利模式,因此,一些企业过分追逐利润,提升人气和访问量,对相关客户或者主播的违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在这种双方共同逐利模式的驱使下,为涉黄信息提供了“温床”。网络涉黄信息接触的便捷性与低成本性,也是利益选择的一个表现。如登陆色情网站,只须注册成会员,相关费用直接从手机费里扣费。此外,网络涉黄信息屡禁不止的又一原因是部分主播的“网红梦”。

第二,观念落后是新业态影响社会稳定问题出现的思想根源。表现为:

政府管理理念落后。网约车与出租车冲突带来了政府立法、管理的跟进。但从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的网约车管理规章中不难发现,将网约车作为传统出租车管理仍是政府的基本思路。

性教育保守。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下,“性”一直是令人谈之色变的话题。青少年性教育的主要渠道是学校与家庭。然而学校与家庭在此问题上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这种欲盖弥彰的教育反而令青少年产生极大的好奇心,青少年往往自己通过网络渠道去了解与学习,因为网络信息的复杂性,导致青少年难以甄别。调查显示,仅有56%的大学生曾接受过性教

育,但内容主要是生理卫生知识^[8]。

技术中立观点为网络涉黄执法等带来困扰。快播涉黄案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就是庭审中被告人王某提出的“技术本身并不可耻”“技术是中立的”等观点。这给很多人带来困惑,因为在技术中立观念下,即使涉黄也不应该受到处罚。这种观念会导致相关的人与企业做出错误的选择。

第三,现有法律体系不够完善,不能适应新业态的发展。虽然国务院早在1996年就发布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之后又陆续发布相关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但仍然存在对相关概念界定模糊、对法律责任规定不足等问题。譬如,对色情与情色的区分,在对淫秽物品的界定中就没有包含网络直播、云盘等。因网络游戏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对青少年影响较大,我国自2004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监管网络游戏的发展。先后发布了《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等,但这些监管标准、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在具体执行中,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第四,政府网络监管存在漏洞。面对新业态带来的问题,我国政府也做了各种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网络监管效力的有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政府监管的事后性和打击范围的局部性,以及多头执法等问题。

第五,新业态行业自律的缺乏。如在网络涉黄案件的行业自律上,中国互联网行业协会也做出一些努力。2004年《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2007年《博客服务自律公约》、2012年《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中就有约定。但行业协会的自律公约不仅效力不高,也不能完全适应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而且,其主要约束的是网站、博客等领域,而对一些网络新业态,如微信、qq、云盘等微领域以及网络直播等领域没有涉及,导致网络自律具有严重的滞后性。另外,一些新业态产业不仅缺乏自律,而且主动规避监管。如网络游戏玩家和开发商,都采取了规避监管的措施。

(二) 应对新业态带来社会不稳定问题的建议

第一,重在预防,加强宣传及正确网络观念的引导,政府管理也要更新观念。譬如,网络游戏在青少年成长期间的影响同样会反映在其成年后生活中。在涉及网络游戏民事案件中,网络游戏成为

婚姻一方提出离婚的重要理由。由于被告以年轻人为主,可以推断,这些年轻人沉迷于网络并不是在其成年后才突然出现的现象,而是源于其未成年期间对于网络游戏沉迷的状态。随着网络游戏不断发展,当越来越多的在网络游戏时代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进入适婚年龄时,其难免会面临沉迷于网络游戏给家庭婚姻生活带来的影响,这并不是个案现象,而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所有人将面对的问题。因此,对于该问题解决,课题组认为应当回归到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监管及教育中,从问题的根源上解决网络游戏给未来社会生活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在正确网络观念的引导方面,应该特别注意:理清技术与法律的界限。应当明确技术是工具理性的产物,技术发挥怎样的功效却是由人支配的。一旦这种技术实施并应用于人类事务时,必然会渗透应用者及实施者的主观意志。技术的工具价值,只有在正确的人文理性、目标价值引导下,才能发挥最佳功效。否则,技术也可能为虎作伥,成为负能量的滋生场。爱因斯坦曾指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9]。”在快播的商业模式中,“技术—色情—盈利”三者之间密切互动,也是说依托技术采用这个商业模式。不管涉案当事人如何说,利用色情赚钱,这是变不了的。理清了这一点,才能使网民明白网络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的界限。加强网络新业态受众群体的网络自主精神和自律意识。

除了宣传和正确网络观念的引导,在预防方面,还要特别注意加强网络领域的预防犯罪机制。具体表现为加强网络服务商的责任和加强监管。加强网络服务商的责任首先应当规范网络服务商的行为,主要涉及网络服务商的广告行为等。网络信息服务提供的违法信息,往往成为网络犯罪得以实施的重要因素。随着网络游戏平台的发展,大量的违法广告或者信息发布将通过个人聊天交流的形式发布,如何监管网络游戏中交流平台的内容,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二,建立、完善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由于网络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我国现行主要以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为主要的法律体系已经不能适应需求。因此,有必要提高立

法层级,提高法律的效力等级。作为一种过渡,可以通过修改现有法律法规的办法先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完善,使得《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其他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一个针对互联网的完整法律体系。在时机成熟时,可以统一制定《网络信息管理法》《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法》等。

第三,对特殊人群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专门保护。青少年是所占网民比例的绝对数,决定对其保护既需要完善的立法,更需要有效的执行。网络游戏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在社会上引起了各界的重视,然而就对于网络游戏监管本身来讲,其并不适于进行单独的立法,而应当纳入现有的与未成年人有关的网络监管的立法体系中。与此同时,应该有效执行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措施。

第四,构建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大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在构建完善的政府与市场监管体系时,应该注意: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管来看,如果出现问题,相关职能部门可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追责和处罚,这样有利于促进直播平台对于直播内容的监管,杜绝靠低俗内容恶性竞争的现象。对此,相关部门应当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共同打击网络涉黄行为。另外,可以尝试建立一个网络涉黄管理的常设机关或者将此类涉黄信息交由现存的一个部门或者机关来统一监管。网站内部监管至关重要,行业协会也应当承担起监督指导的责任。

网络涉黄涉暴等现象难以遏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违法成本低。以直播涉黄为例,由于网站和主播签订文明协议的方式约束效力其实并不高,所以除了封号,平台能对主播做出追究的手段有限。这些处罚根本不能抵扣其给网络大众带来的恶劣影响。我们可以借鉴信用卡的诚信记录机制。在网络管理方面,可以实行一个网络统一化管理机制,即逐渐对网络注册实行身份证注册制,各个网站信息共享,一旦发现有人发布不实、色情暴力等信息,可将其以身份注册的所有网号进行封号,严重的话追究其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若平台没有及时删除,对网络平台给予一定时间的封存处罚,严重的话可以直接责令关闭该网络、吊销其营业执照、对相关网站负责人进行行政或者刑事处罚。

第五,构建以“政府管制、社会监督、个体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主体的多中心综合治理体系。在政府管制中:应该从加强公职人员道德建设、提升政府的媒介修养、不断完善官网功能等方面,提高政府的能力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应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增强社会透明度。提高政府对网络谣言的防范意识。政府要积极主动地及时应对,这样才能把控全局。政府应当从引导网络言论、设置言论领袖、吸纳权威专家和学者等方面,加强政府网络监管。

在社会监督中,要发挥民间社会团体的影响力,提升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加强媒体平台的社会责任意识,调动媒体的自我监督管理职能。

在个体自律中,应从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媒介素养、理性思维下功夫,并要注意提升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第六,坚持监管手段的多样化。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要采用法律规制、技术防范、构建良性的网络文化等措施,并根据网络谣言发生、蔓延的不同时期,予以规制。特别注意:

加强和完善网络管理方面法律法规的建设。鉴于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且可操作性差,所以要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使治理网络谣言有法可依。在此应注意:首先,目前我国网络立法是以等级较低的规章为主,且违背了法律优位原则,应补充和完善网络专门立法,提高法律的位阶,对一些成熟的规章要促进法律化,使其更具权威性;其次,言论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为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可将言论自由的限制作为法律保留的范围,即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只能由宪法、法律来确定,法规和规章只能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具体化规定。再次,完善网络谣言的追责制度,若有人触犯相关规定,要实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大惩处力度。最后,要完善信息管理、政府信息公开、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捏造事实、恶意抹黑政府、泄露个人隐私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加强惩处力度。

提升网络安全技术保障能力。网络管理技术是一个新兴的技术,可以监管网络信息的发布和过滤,可以有效减少不良网络信息的传播。因此,要不断创新网络管理技术,为有序的网络秩序保驾护航

航。在此要特别注意运用屏蔽技术、大数据采集分析技术、监测和跟踪技术,并实行网络实名制。也就是说,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挑战,还需要从技术手段上去解决。为应对新业态带来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事件,提高网络安全技术显得尤为迫切。“徐玉玉电信诈骗案”一经曝光得以快速告破,一方面由于执法机构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是源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跟进。

完善预警机制,提高防范和紧急控制能力。政府要重视对网络谣言的监控,建立以宣传部门为核心的,既分工负责,又协调统一的网络谣言预警机制,在网络谣言形成初期或尚未大肆传播之前便采取有效措施将事态予以控制。紧急控制主要是指网络谣言爆发期、变种期阶段应该采取的措施。

在危机事件解决之后,政府要对网络事件治理过程进行反思评估,并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

参考文献

- [1] 纪雯雯, 赖德胜. 从就业到创业——新业态对劳动关系的重塑与挑战[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6(2): 23-28.
- [2] 慈善公益网. 2015年度中国慈善公益盘点·互联网——

- 网络颠覆公益时代[EB/OL] (2016-01-08) http://www.xinhuanet.com//gongyi/2016-01/08/c_128609898.htm.
- [3]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净网2016”专项行动阶段性成效明显.[EB/OL]. (2016-08-04) [2017-10-01] <http://www.shdf.gov.cn/shdf/contents/767/302123.html>.
- [4]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18-01-31) [2018-08-0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1258144487675180&wfr=spider&for=pc>.
- [5] 张红兵. 全国扫黄打非办挂牌督办10起云盘涉黄案件[EB/OL]. (2016-05-17) [2016-09-24] http://www.legaldaily.com.cn/legal_case/content/2016-05/17/content_6629660.htm?node=33812.
- [6] 中国互联网协会. 2016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EB/OL]. (2016-09-07) [2016-10-08] <http://www.isc.org.cn/wzgg/listinfo-34244.html>.
- [7] 史少博.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金主义[J]. 兰州学刊, 2010(11): 7-10.
- [8] 李颖, 王怡. 仅有56%大学生曾接受过性教育[EB/OL]. (2016-09-27) [2016-10-10] http://h.wokeji.com/society/shehui/201609/t20160927_2875018.shtml.
- [9] 吕本富. 技术和法律的轨道不是平行线——在“快播”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J]. 中国信息安全, 2006(2): 70-71.

Influence of New Forms of Business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Suggested Precautions

Liu Danbing Huang Jingru Dai Shuiping

Abstract: With new forms of business originated from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making people's life more convenient, they also negatively influence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Through this research,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economic reason for such negative influence is mammonism (the pursuit of material wealth), the ideological reason is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people's ideology, the institutional reason is the imperfection of legal system,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enforcement, it is caused by loopholes in governmental internet supervision and lack of self-discipline in the market. Therefore, governmental supervision should emphasize on not only taking precautions but also refreshing ideology. A legal system that is coherent with the current era of interne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consummated. Specific protection should be enforced for particular groups of people, especially for teenagers. Finally,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and the extent of legal prosecution should both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Key words: Ridesharing;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Internet Rumors; Online Gaming

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风险及法律防控

张 敏 李 倩

摘 要: 2017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 AI技术和应用逐步实现突破和落地。人工智能应用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同时, 也带来一系列安全风险。本文从人工智能应用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对社会伦理安全及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对个人生命、数据、隐私等个人安全三个层次进行了安全风险分析, 认为应当坚持“人工智能工具论”的法律客体为原则, 从自由、限制、禁止应用三个层次对人工智能的应用进行法律规制。

关键词: 人工智能应用; 安全风险; 法律防控; 法律人格

中图分类号: D92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 (2018) 03-0101-07

1956年麦卡锡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 成为人工智能这门新兴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继21世纪开始进入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 到2010年后的大数据时代, 到2017年人脑与智能机器人的世纪围棋大战、AlphaGo三连胜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柯洁, 再到机器人取代工厂的大量员工, 到无人机运送快递、无人驾驶汽车上路, 人工智能的应用逐步走进并深入影响人类的工作和生活。基于科学技术的优劣双面性, 人工智能应用给社会带来更多便利的同时也相应带来安全风险和隐患, 智能水平提升带来颠覆人类安全的潜在风险、智能机器人应用于传统制造业乃至现代服务业打造的智能工厂带来的失业性社会风险、情感机器人应用对社会伦理安全带来的风险,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所需人类大量数据带来的隐私性风险, 人工智能应用导致的风险引发了人类社会的严重关注和热烈讨论。

一、人工智能的核心特征

人工智能又称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分支, 又是与控制论、心理学、

优生学、自动化乃至哲学密切相关的综合性的学科。其开发主要有三种路径: 符号主义学派、连接主义学派、行为主义学派^[1]。由于“智能”本身含义就不明确, 因此关于人工智能尚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麦卡锡最早对人工智能的定义是“机器可以像人以智能作出行为一样拥有机器智能”^[2]。随着技术发展, 不同学者对此作出不同的定义, 但核心在于模拟“人类智能”, 智能指人类所特有的现象和能力, 而其他生物不具备的特征。人类智能的表现形式为学习知识、感知现象、理解本质、思维模式, 因此可以这样定义智能: 智能是人通过观察、理解、思维等来认识事物并通过决策和行为来改变世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上的定义亦体现了这一核心, 人工智能即模拟、延伸人的智能、感知环境和学习知识来解决问题的系统^①。虽然定义的描述方式不同, 但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就是模仿人类记忆、感知和学习等活动, 达到像人类智能一样对外界反应作出判断并解决问题的目标, 总的来说是对人类智能的扩展和延伸。

作者简介: 张敏, 女, 陕西咸阳人,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教授。从事商法研究; 李倩, 女, 山东济南人,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硕士生。从事商法研究。

人工智能之所以叫“智能”是因为深度学习的能力,能够像人类一样识别图像、文字、语言等信息,并通过其算法作出自己的反应。卷积神经网络是模拟人类脑神经网络而创造的“机器”大脑,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可以像人的视觉,敏锐地观察世界。如今深度学习能力在自动驾驶汽车上的应用能够使汽车更加精准的识别面临的障碍、行人,从而保证驾驶安全;在医学中的应用能够使机器比医生在诊断病情上更加准确。

人工智能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学习,这一数据思维源于算法但不依赖于算法,能够随机应变,因此具备一定的创造性思维模式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人工智能不管如何拥有自主决定、推理、运算、创造,但终究不是人脑,也不是人,因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拥有复杂的感情和自由意志(Free Will)。自由意志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是指人们依照其拥有的条件去决定是否做一件事。显然,人工智能根据人们对其特定的设置而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主决策和行为,不可能像人一样可以意识到自我,也不可能像人类一样可以自由选择职业。

人工智能按照智能水平高低可以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Weak-AI)又称初级人工智能,是指人工智能按照输入的特定程序对外界作出反应,进而可以模仿人类的行为,如下棋、语音识别、面部识别等,但是不能作出推理和真正解决问题,也不拥有自我改变和自主意识。强人工智能是指在弱智能基础上的跨越式进步,不是指运算、模仿等能力更加强大的弱人工智能,而是像人一样可以拥有自主意识,成为世界上的主体的智能^[3]。强人工智能一是可以像人一样思维,二是超越人的思维模式有独特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如李建中教授认为机器只是看起来有智慧,但是不会像人拥有自主意识一样可以真正的推理和解决问题^[4]。邓志东教授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仍处于感知智能阶段,其视觉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方面只是对外界的感知,远远达不到创造性的智能水平^[5]。当前人工智能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但都是基于程序设定和深度学习的初级智能,所作出的智

能行为依靠大数据,不能够根据情境作出像人一样的智能反应和行为。相当于大脑的强人工智能尚未开发完成,而超越人类大脑的超人工智能还不确定完成时间。

人工智能技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与行业的深度融合,以此来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及生活方式。当前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推动的产业化阶段认定的发展方向是:制造业、农业、物流、金融、商务、家居、教育、机器人、运载工具、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6]。

二、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风险分析

安全,从现代汉语的字面上理解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从社会学角度讲,安全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在马斯洛提出的人类五个层次的需求中,安全需求处于生理需求之上的第二个层次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有对秩序稳定和社会保护的依赖,也有对法律稳定、界限明晰的需求,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不恐惧、不焦躁、不混乱,所处的环境是可以让人依赖的^[7]。安全价值是法的价值中重要内容,一些学者主张将安全提升至法律最高价值之列,以托马斯·霍布斯和杰里米·边沁为代表的法学家早已对安全的概念和价值进行过分析。霍布斯将人民的安全作为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标准和尺度。边沁认为法律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控制社会安全,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博登海默在论述法律的性质和作用时把安全同秩序和正义作了区别和联系。他认为,安全在法律价值中被界定为实质价值,是指实体上真切的感受到安全,没有侵略和侵害,也没有财产的掠夺和不确定的动荡,在生活中不受公害和变故的频繁影响,在健康中不受疾病的困扰而不得治,在生产和工作中不因为年老和失业而失去生活来源,这些都构成了安全的要素^[8]。人工智能应用的风险,主要存在于相当于人脑的强人工智能或超越于人脑的超人工智能时代,但随着弱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也将不断引发人类、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安全问题。

(一) 人类安全风险

1. 智能自主武器的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战争和自主武器以来,对其风险的担忧不亚于对核武器的担忧。军事机器人自投入战场以来在战争中的杀伤力也是逐步提升,且已到达第三代。在美国对外的战争中,人工智能机器人战士杀害了上千名对手的人类士兵,但同时出现了误杀、误伤上百名平民的情况^[9]。也有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中出现战地机器人失控而对美方指挥官瞄准、杀害的苗头^[10]。

另外,智能武器的发展既有可能导致“人工智能恐怖主义”走向极端。军用机器人发展越趋向智能化,其独立自主环境探测能力增强。与普通士兵相比其成本更低,杀伤力更大,且伤亡更小。机器人作战更加冷血,不会有恻隐之心,因此引发一场战争更加容易,也有可能被恐怖组织所利用,形成全球恐怖活动的更高一轮恐慌和破坏。即使是中立的技术,被恐怖组织所利用,会造成更危险的后果,就有可能出现反对论所说的人类灭亡。正如霍金说:“人工智能的全方位发展可能招致人类的灭亡。如最大化使用智能性自主武器^[11]。”

2. 人工智能应用“失控”的风险

对人工智能失控的担忧根本原因在于所谓“奇点”的到来。人工智能先驱雷·库兹韦尔在他的书中大胆预测,十年后人类大脑可以相互传递信息,二十年后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植入大脑而形成人机融合体,而三十年后人工智能就会超越人类智能出现可怕的奇点。等到智能水平发展足够高时,我们不能预测人是人工智能辅助的人类,还是有大脑的机器人^[12]。中国Mindputer实验室制造出世界首个“人工脑连接体”(True-Brain)的到来使驱雷·库兹韦尔的预言多了几分可能,人工脑指的是对大脑神经结构进行结构性、网络状分析,使机器能够模拟大脑的活动过程,实现人工脑对生物脑活动状态的追踪,到那时与人脑的结构和功能就极其相似,此时出现的就是类脑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奇点时刻^②。正如霍金认为的,人工智能失控实质是对智能发展水平超过人类而成为和人一样的主体,他可以决定自己的复制权和其他需求,而人类失去对其

系统的控制,此时人类可能就会被伤害和边缘化,也有可能被毁灭,甚至颠覆人类。

(二) 社会安全风险

1. 社会性失业风险

人工智能工作的效率远远高出人类,尤其是在一些重复性、辅助性、制造业等低技术要求的工作领域,人工智能不需要休息也不会抱怨,效率高且精准性也比人类要高的多,此类行业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性最大。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如果劳动者由人工智能取代,失业问题将极其严峻。对于容易被取代而失业的这部分人来说,较快掌握更多机器人所取代不了的技术也是不现实的,因此社会的就业稳定性将大大降低,不安定因素升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也对中国人工智能自动化工作即将取代人类约一半的工作内容作出预测,并认为这一可能性在中国极有可能出现^[13]。中国智能化带来的失业已经开始上演,银行的裁员^③和阿里巴巴启用人工智能员工和客服来取代人类客服、快递员等工作岗位已经有所显现。

人工智能应用取代一些行业既是必然趋势,是当代经济发展中不可阻止和逆转的事实,即使人们会提升自身能力创造其他的就业岗位,但这一过程的速度与人工智能应用发展速度相比显然是缓慢的,个人对社会生产资料分配的需求将在一定时间内得不到满足,失业一旦成为规模必然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犯罪率或群体性事件有可能上升,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的重大隐患。

2. 社会伦理安全挑战

虽然人类与机器的根本区别在于自由意志和人类情感,但机器突破情感限制而拥有情感并不是不可能的,现有研究已有可以感知到人类情绪的陪伴机器人,可以在人类情绪失落时进行安慰。人工智能领域有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获得情感,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更是具备情感和意志的人类大脑。人类社会是群体性社会,是由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维系起来的社会,人类需要家人、朋友等的陪伴,情感的交流互通,这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和人类社会的一般伦理规范。人类的婚姻家庭、工作环境等,都可能会因为机器人拥有感情而使人类孤立,由群居变为独居,社会

结构会发生重大颠覆。可能会发生人和机器人相爱,人面对机器而选择逃避更加复杂、需要付出努力维系的人的关系。具备意志和情感的人工智能将会造成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和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对人类社会的伦理安全提出重大挑战。

(三) 个人安全风险

1. 人身损害的安全风险

与其他纯工具性的技术所不同的是,人工智能应用有独立于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一定程度脱离人的控制作出智能化决定,及人工智能设计者也不能完全确保人工智能的绝对安全。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应用于教育的“小胖”机器人发生了砸展柜并伤人的事件,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机器人伸手击打工作人员造成死亡的事件,2018年3月美国亚利桑那州优步公司的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撞死一名过路行人,成为全球首例自动驾驶汽车撞击行人致死案件,另外用于外科手术的机器人造成大量病人感染、烧伤等伤害、死亡案件。将人工智能应用在制造、交通、医疗、教育等重要领域的过程中会发生侵害人身、财产安全的事故和危险,成为不可忽视的安全风险,无疑构成法律上的侵权。

之所以会出现人工智能应用的侵权问题,一是由于人工智能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二是技术和应用处于萌芽阶段,产业发展只关注创新、市场和经济效益,安全因素未能充分考量^④;三是有关人工智能应用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责任体系等较应用水平来讲相对滞后和缺失,安全监测和行业监管不明确,应用处于混乱和原始的状态,因此应用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威胁成为首当其冲应当考虑的安全问题。

然而人工智能应用的自主性、独立性、拟人性使侵害责任划分面临责任主体、归责原则等的复杂性。以自动驾驶汽车致人死亡案件为例,交通法中侵权责任的划分首先是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追究驾驶员的责任,但是当汽车处于自动驾驶模式时驾驶员对汽车是没有操作的,驾驶员此时对汽车安全行使的注意义务就转移到自动驾驶系统上,按照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是以行为人的行为为基础追究责任

的,这种情况下就无法追究驾驶员的过错责任。正如美国优步汽车撞死行人的案件中,司机没有驾驶不承担侵权责任,而自动驾驶系统也不是责任主体,因而对行人的侵权责任无人承担,这对被侵权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⑤。该案例引起各方对无人驾驶汽车安全性的顾虑,如何衡量其安全性,如何设立无人驾驶汽车的通用安全标准,如何处理司机与无人驾驶的角色分工,如何划分各方侵权责任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亟需法律给予规范。

2. 数据信息安全与隐私权风险

关于隐私、个人数据保护等问题的讨论自互联网快速发展以来就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但不同于之前的是,风险的防控目的已经由防止不合理的攫取信息谋取不正当利益转为协调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和保护个人隐私的权益之间的取舍,这是由人工智能发展的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数据的收集和挖掘是智能水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既要为人工智能发展建立海量数据的大数据资源,但又要强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为数据风险和智能发展提出较为中立的态度^⑥。美国科技网站 Techcrunch 专栏作家 Natasha Lomas 评论称,人工智能对数据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比互联网、大数据等的需求都要大,因为机器学习依赖于海量数据的驱动才能发挥功能提高智能水平^[4]。如智能聊天工具就是通过对用户手机中的信息、通讯、聊天习惯、购物等许多信息的获取的分析,才能在和人类交谈的过程中更加了解人类,达到图灵测试的效果,而这样就使个人在人工智能应用面前变为“透明人”。

人工智能应用的深度学习技术是在数据基础上发展的,数据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前提和基础。人工智能时代下个人信息和数据的威胁主要来自两点,一是智能系统漏洞和黑客攻击本身带来的数据泄露的潜在风险,二是由于目前个人一味追求互联网、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而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低下,人工智能企业为了追求利益而对个人信息以明示或默示的形式加以收集、利用、倒卖,从而使个人在精准营销的便利中落入精准诈骗的圈套,最终

给个人人身、财产等都带来了巨大隐患。

人工智能在指纹识别、面部识别、语音识别以及通过各种应用对个人隐私进行学习的过程中,精细地记录着个人生活,掌握个人隐私,让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更加方便,需要相应的法律和标准对个人隐私给予更有力的保护。当前对隐私的保护模式采取的是“同意收集”的模式,即对隐私信息的管制包括对使用者明示或未明示同意的收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很容易推导出公民不愿意泄露的隐私,例如从公共数据中推导出私人信息,从个人信息中推导出和个人有关的其他人员(如朋友、亲人、同事)信息(在线行为、人际关系等)。这类信息超出了最初个人同意披露的个人信息范围。

三、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风险的法律防控

法学对风险社会问题的研究的重点是法律制度与法律秩序,在安全风险的管理中,哪怕是一个细枝末节的危险因子或者可能性较小的灾难势头,都应当由法律规则和法律秩序来规范和预防^{[15]20}。因此,法律明确人工智能应用范围和程度是预防和解决安全问题的重要防控途径。

(一) 法律原则: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定位

人工智能“拟人性”的行为特征,使人们怀疑可以自主决定的人工智能应用是否会取代人类,挑战人类主体地位。同时人工智能在应用过程中的类人性也对现行法律关系造成挑战,法学领域对其法律人格进行了讨论,目的是为了在人工智能参与下的社会关系,明确人和机器的权利、义务关系和责任体系。人工智能是否可以获得法律人格或者说是法律主体资格,意味着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成为法律上的“人”。当前法学领域关于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讨论呈现出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相反的观点:

第一种是对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持否定态度,主要有王利明、吴汉东教授的客体控制说和郑戈的工具说。吴汉东教授认为从法理学主客体二分法来说,人工智能不是有生命的自然人也非有独立意志的法人,是受法律主体控制的机器人,不足以取得独立的主体地位^{[15]5};王利明教授从人工智能产生的

属性即代替人类从事一定行为,是作为客体而出现的,不能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现行的法律体制和规则可以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没必要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16];郑戈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工具,造成伤害以后承担责任的还是人,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是多余的^[17]。

第二种是对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持支持态度,主要有电子人说、有限人格说和电子代理人。将人工智能视为电子人在实践中初见端倪,欧盟、韩国、爱沙尼亚对人工智能“电子人”或“代理人”已经表现出了立法动向^[18]。郭少飞则从实践、法史以及自主能力的本质属性认为人工智能符合“电子人”的要求^⑦。袁曾认为人工智能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智慧工具,应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具备法律人格,但是与自然人和法人人格不同的是,人工智能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因此应该采用有限人格。电子代理人实则是将人工智能看作了人的“代理人”,因为代理人本质上也是具有法律人格的人。有学者以“自主意识”为标准,认为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会由原来的保守“工具论”最终实现“拟制论”的转变^[19]。

以上各位学者支持或否定的态度是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自主意识”以及法律主客体要素等进行分析,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从人工智能本质及安全角度来看,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应用法律人格的态度应当更加保守和谨慎,科技和时代的发展推动着法律的变革,但并非新兴事物的产生都必然引起传统法律价值和法律框架体系的变化,尤其是与人类越来越相似的人工智能,更应当采取理性的态度去对待。美国著名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认为,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有无不是科技发展程度决定的,而是法律是否赋予它主体资格^[20]。从人工智能本质属性出发,任何科技进步和发明都是由人类为主导创造并服务人类的工具,自产生之日便不具有和人平等的法律属性。人工智能只是帮助人类的工具,不具有自然人的独立意志,不能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21]。之所以会产生法律人格的观点无非是工具能够像人类一样有智慧,但仍不能改变它作为工具的属性。基于以上分析以

及安全为核心的法律价值,笔者对人工智能应用法律人格采取否定的态度,即仍将人工智能应用视为人类智能延伸的工具,坚持人工智能“工具论”的法律客体原则。

(二) 法律规制:人工智能应用的负面清单

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应当按照其对于安全的影响划分为自由应用领域、限制应用领域和禁止应用领域,采用负面清单制度明确限制应用领域和禁止应用领域,并分别采用许可制及严格禁止的方式予以规范。

1. 自由应用领域的自由生产制度

人工智能应用整体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技术的越来越成熟在很多领域的应用是符合安全和发展双重要求的,因此在产业升级背景和社会化应用中可以自由应用,除法律明确限制应用和禁止应用的领域之外,均应以自由生产为原则,允许企业自由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并自由生产。

2. 限制应用领域的审批制度

自主意识是人和机器最大的差别,人工智能目前虽然已经可以具有独立意识,可以做出独立的行为,但仍不具备人类的情绪和感情。但是人工心理和人工情感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热门研究领域,世界上研究带有情感的机器人最先进的国家就是日本^[22]。在应用领域儿童和老人陪伴机器人可以赋予一定情感,这不会危及人的安全,也不会引起法律、伦理方面的挑战。然而像电影《人工智能》中出现的人工智能孩子、人工智能性伴侣等都是像人一样拥有感情和情绪,他们的应用不仅引起了伦理风险,还会在收养、婚姻制度等方面引发风险。当然电影中的都是科幻色彩,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使机器富有情感不是没有可能,但在应用范围中应当予以严格的限制。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情感和自主意识应当为技术禁区,因为自主意识作为机器和人最大的区别,禁止人工智能拥有自主意识是保证人作为这个世界唯一能够意识到“我”的独立存在的个体,是保证人自身安全的最重要的屏障。王治东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如果有了“我”的概念和意识,不仅是对人的模拟,而且具有了人的核心内核。在这个层

面而言,人工智能就在个体上可以成为另一个物种的“人”^[23]。而人工智能一旦有了“我”的自我意识,就会视人类为异类,这时将会对人类生存造成实质的威胁。但具备情感和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孤独人陪伴、自闭儿童治疗等方面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坚持人工智能“工具论”的法律原则之下,对于人工智能情感和自主意识技术应用的领域,应确定为限制应用领域,并通过审批制度予以法律监管。

同时,限制应用的领域要使人工智能的自主化程度和智能水平处于人类可控制的范围。人工智能应用作为人类的工具必然有超过人的强大的能力,但随着其深度学习能力加深,智能是否会超过人类智能仍是未知,因此要确保人类对其应用程度的把控。如哪些事情可以由智能系统自行决定,哪些又必须靠人来决策,对于限制应用的领域,只有符合安全标准并得到安全许可才能投入商业应用^[24]。

3. 禁止应用领域的严格禁止

正如克隆技术在成功克隆出一只羊,又克隆出一只狗、一只猪,尽管技术已经成熟,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克隆人,克隆人不仅面临复杂的道德伦理困境,还会面临人的生存问题的挑战,因此,目前全世界法律均禁止克隆人。但是这一技术不是绝对的被禁止,应用在克隆器官方面在医疗领域却是一大进步,对人类健康和生命也是有利的。相比较而言,人工智能更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对于全人类造成危险并颠覆人类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确定为禁止应用领域并严格禁止。首先被确定为禁止应用的应是智能自主武器的应用,其他可能会被毁灭甚至颠覆人类的人脑技术也应限制于研究领域,明确禁止这一技术的生产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其应用的安全风险是不可避免。法律对于技术调控的核心在于规范技术的应用,在鼓励技术发展、转化之余,更应当站在安全的视角,对技术应用加以安全风险防范,使技术应用达到最大限度的安全,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工智能时代追求高速、自由发展应当充分考虑到安全这一人类的基本需求,并立足当下分析存在的安全风险,明确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建

立多层次的人工智能发展规范和模式, 走向实现健康、安全、稳定的人工智能新时代。

注释

- ①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 2018. 1.
- ②华春雷. 人工脑连接体: 类脑人工智能的奇点时刻来临. 华春雷科学网博客.
- ③向家莹. 五大银行集体裁员撤点 竞速“智能化转型”. 经济参考报. 2018. 4. 9. 银行柜员的工作和部分银行网点已经被裁撤掉, 主要的几大银行如工行、农行、建行等纷纷裁员, 预计每家银行接近有上万人失业, 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网点和柜台、以及智能客服。中国银行的年报提出了智能化网点超过百分之八十覆盖率的目标。
- ④央广网. 高交会官方回应机器人伤人事件: 员工操作不当所致. 2016. 11. 19, 世界机器人大会秘书长、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徐晓兰表示, 我国服务机器人的应用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是试用阶段, 但很多企业忙于或是急于做市场推广, 更多的是注重它的功能和应用, 而对安全方面的设计恰恰是它的弱点。这次事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警示, 提醒我们要更加注重服务机器人的安全设计。
- ⑤曹建峰. 全球首例自动驾驶致死案背后, “谁来担责”的法理探讨. 腾讯研究院.
- ⑥2017年7月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
- ⑦郭少飞. “电子人”法律主体论[J]. 东方法学. 2018: 10. 他认为人工智能可以作为电子人的依据在于: 实践中人工智能主体已有成例或官方建议; 历史上, 自然人、动物或无生命体法律主体的演化表明, 存在充足的法律主体制度空间容纳“电子人”; 法理上, 现有法律主体根植之本体、能力与道德要素, “电子人”皆备。由外部视之, 人工智能现有及潜在的经济、社会、文化、伦理影响以及对哲学范式的冲击, 促使既有观念、模式、体系开始转换, “电子人”的法外基础已然或正在生成并强化。

参考文献

- [1]格雷亨姆. 人工智能入门[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8: 1.
- [2]马少平, 朱小燕. 人工智能[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
- [3]翟振明, 彭晓芸. “强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世界——人工智能的技术飞跃与应用伦理前瞻[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6(7): 22-33.
- [4]李建中. 科技丰碑[M]. 北京: 中国科技技术出版社, 2009: 493.
- [5]祝叶华. “弱人工智能+”时代来了[J]. 科技导报, 2016(7): 67-69.
- [6]鄂大伟. 中国人工智能未来十大发展应用方向[J]. 中国工业报, 2018(3): 22.
- [7]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 许金声,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44.
- [8]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232-320.
- [9]杨帆.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伦理问题研究[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15.
- [10]马尧. 亚太军情观察——未来军用机器人会“造反吗”? [EB/OL]. (2018-03-21) http://sh.qihoo.com/pc/9d68ed16e483f3557?sign=360_e39369d1.
- [11]霍金. 人工智能的威胁就像核武器——世界将发生10大变化[J]. 花炮科技与市场, 2017(4): 27-28.
- [12]刘耀会. 关于人工智能与社会伦理的探讨. 机器人技术与应用[J]. 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2017(5): 44-48.
- [13]鲍达民. 中国近半岗位或被人工智能取代[J]. 中国邮政, 2017(5): 7.
- [14]刘春杰. 谷歌的人工智能战略仍难越过隐私这道坎[J]. 计算机与网络, 216(21): 19.
- [15]吴汉东. 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5): 128-136.
- [16]王利明. 人工智能时代对民法学的新挑战[J]. 东方法学, 2018(3): 4-9.
- [17]郑戈. 人工智能与法律的未来[J]. 探索与争鸣, 2017(10): 78-84.
- [18]姚万勤. 人工智能影响现行法律制度前瞻[J]. 人民法院报, 2017(2): 54.
- [19]孙占利. 智能机器人法律人格问题论析[J]. 东方法学, 2018(3): 10-17.

- [20] 张玉洁. 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人权利及其风险规制 (1) : 38-43.
[J]. 东方法学, 2017 (6) : 56-66.
- [21] 田小军, 徐思彦, 何帆. 文化产业+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前沿法律政策[J].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2017: 20.
- [22] 王志良. 人工心理与人工情感[J]. 智能系统学报, 2006 (1) : 38-43.
- [23] 王治东. 人工智能风险性刍议[J]. 哲学分析, 2017 (5) : 31-39.
- [24] 杜严勇. 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及其解决进路[J]. 哲学动态, 2016 (9) : 99-104.

Security Risks and Lawfu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 Application

Zhang Min Li Qian

Abstract: Known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year 2017 has witnessed a step-by-step breakthrough and application across various fiel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companied with a series of security risks. This article made an analysis of security risks at three levels including the threat of AI application to human security, social ethics security and personal security covering person's life ,data, privacy and consequently reached a conclusion that AI application should be given a lawful regulation ranking from free application to limited application to ban on the basis of lawful object of regarding AI as a tool.

Key words: AI Application; Security Risks; Lawfu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egal Personality

汲取大学精神力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张岂之

尽管世道沧桑，今是昨非，但在抗战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从家乡江苏南通远赴陕南城固读中学的往事，却仍然历历在目。

那是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陷入敌手，我还是一个少年，只好被送到大后方去继续学业，遂于1939年8月考入迁至陕南秦巴盆地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中初三，亦即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高中部，时已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刚刚由古路坝迁至城固东城墙外的老爷庙。附中虽非高等教育，但它也是西北联大的一部分，同样遭受战争磨难，同样千里迁徙，深受西北联大精神的感染。

附中地处城东汉江畔，虽不过几十间茅草屋，几排旧桌椅，极其简陋清苦，但却有了一片可以安静读书的地方。老师们风尘仆仆地登上讲台——小土阶，津津有味地讲起课来。大清早，当晨雾尚未从江面消失，小操场上满是从战区来的少男少女们，有的朗读英语，有的背诵古文。他们的衣服和体形极不相称，可是每个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心。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还有读书的机会，这已是很大的幸福，生活苦点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在汉江边晨读，在油灯下自习，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课余闲暇便会钻进街上的一间间书店，抱着一本书贪婪地吸允其中的营养。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都是令人迷恋的，这种读书的狂热，也冲淡了思乡之苦，不免苦中作乐。

有一次考试之前，校长宣布发给每人一根土制蜡烛温书用，顿时，欢呼声、掌声、笑声四起。那几天，大家燃起蜡烛，照亮了教室，也照亮了学子的心田，多少年过去，那束烛光仍然令

我难忘。在我的记忆中，此前此后，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亮”。那时，每天夜间我们都要掂量一下，看烛燃去了几分。当烛只剩下短短的根，我们便珍惜地把它包起来，作为光明的种子，藏在书包里。后来，当我离开这座小城，跑到嘉陵江边一所高中读书，从此便和油灯、土烛告别了。可是在宽敞的教室里，明亮的电灯却打动不了我的心。在我心的深处，我还惦记着那束烛光，可是烛的根已不知丢在哪里。三四十年以后，回了一趟城固，踏访旧地，虽已面目全非，但仍不失为一段美好的记忆。从1952年来到古城西安的西北大学教书，60多个春秋弹指一挥间。老子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扎根西北始于西北联大，我们应当珍惜，从中吸取精神力量，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由此，我走进了南开，走进了北大，走进了清华，结识了北师大和北平大学校友——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走进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也走进了西北联大的后继学校西北大学。1985年3月31日和1985年4月9日：一个是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成立大会之日；一个是我任西北大学校长之日。在这八九天时间中会有很多时间冲突，但是我的决定是，即使二者有冲突，我也必须首先出席校友会成立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推举原北平大学校长、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常委、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徐诵明先生为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我至今还记得开国大典播音员齐越校友，诵读贺信时那慷慨激昂的一幕。在此前后，西北大学又推动中共中央组织部批文为46名“脱党”校友连续计算党龄、补发一批校

作者简介：张岂之，男，江苏南通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史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侯外庐学派领军人物，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等。

友的毕业证、组织校友回校座谈、重写校史，多视角开展西北联大研究，复于2012年发起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西北联大渐为人知，据说仅从2012年到2015年在网络上的访问即达1750万人次。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研究，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著作讲述西北联大的故事。讲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讲它的大学精神。

概括起来，西北联大精神就是“团结御侮，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兴学强国”的创业精神，“公诚勤朴，矢志报国”的奉献精神，其核心是爱国奉献和兴学强国，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这就是它的精神，最根本的精神。西南联大的“南渡北返”与西北联大的“扎根西北”，都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学精神的“最高表现”。对此，通过漫长历史风雨的洗练，才能看得清楚，也就是说，我们越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西北联大教育实践的成果会越来越加珍惜。

我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言论，主张多写人文普及读物。其实，这对学者来说，是个考验，这需要对所研究的问题有很深刻的研究、丰厚的积淀，否则是写不出来的。姚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科学史出发，提出西北大学两源说和建校百年的文献证据，向学校提出举办西北联大论坛的建议，并坚持不懈地从事西北联大研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和陕西省出版基金资助，相继完成《西北联大史料汇编》《国殇播迁：西北联大通史》（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档案史料选编》（国家档案局资助项目）《西北联大简史》和《西北联大教育思想》（陕西省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等多部

著作。因此，由姚远完成《衔命东来：话说西北联大》是很有基础的。

我很认同他关于“历史需要诉说，需要讲故事”“西北联大叙事方式需要转型”的说法。同时，也很赞同这本书的谋篇构思和逻辑结构。其中“怒发冲冠只为学人的徐诵明常委”“《西安临大校刊》报道杨秀峰在太行山打游击”“一封来自延安抗大的信”“毛泽东的两任保健医生姜泗长与黄树则”“龚全珍在西大”，都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史实，其中“第一个到达死亡之海罗布泊北部和首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千里无人区的黄文弼教授”“安息于页梁山的殷培璞”，读来尤其使人感动。另外，在新增的“西北联大与汉中”一节中讲述的：“魏寿昆、雷祚雯、张伯声三教授深山勘矿”“西北大学学生首次调查城固物价”“《雷雨》的公演”“陆懋德赋诗汉中古迹”“为汉中解放而壮烈牺牲的傅鹤峰教授”等故事，大大提升了西北联大教化一方、服务社会的独特贡献，也为地方纪念、保护和利用办学遗址提供了翔实有趣的历史依据。

以上所说与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都是相联系的，从历史故事更能体会今天现实的需要。

今日大学的责任不外乎教书育人、学术创新、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四大职能，而通过《衔命东来：话说西北联大》这样的力作，展现我们的大学之道，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正是实现这些职能的重要抓手。让我们重新燃起汉江畔茅屋教室里的那束烛光，讲好西北联大故事，传承光大优秀文化，奔向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传承优秀教育文化、体现西北联大之魂

傅恒志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炮火连天、颠沛流离中度过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寇逐渐南进，我才两三岁；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1938年6月6日，日本侵略者攻占家乡河南开封，我不过八九岁。国民党政府则对外不抵抗，对内镇压革命力量，致使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嚣张，开始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一时间，国无宁日，时局动荡，为了躲避战乱，许许多多河南人背井离乡，逃难西安。

我的父亲——参加过北伐的行武出身的工商业者，也领着全家老小流亡西安。父亲在西安大街上开了一家取名“华强”的电料行，他希望通过实业救国的道路，实现“华强”的理想，除经营小店外，还和几个朋友联合在铜川、陇县一带勘探、开采煤矿。那时的社会，充满尔虞我诈，国民党军警特务早就觊觎着这个外乡人的店铺。他们唆使一个特务，诬告父亲“贩毒”，敲诈勒索，使傅家几乎倾家荡产，再加上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使他的事业举步维艰，最后以失败告终。

我同家人受尽流离之苦，亲眼目睹了父亲的事业由兴到亡的全部过程，年轻的心中充满了对国民党特务的仇恨。有一次，一位从延安来的姨妈，讲了很多延安的故事，更使我这个懵懂少年明白了许多抗日救国和共产党为人民谋解放的许多道理。在学校每日倾囊参加抗日募捐，得到学校所发的一个大奖章。

1946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取私立焦作工学院矿冶工程系，学习矿山机械专业，后因战事阻断交通，一年后转学到国立西北工学院。在焦作工学院学习期间开始接触和阅读了进步书刊，了解到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浅显道理。在西北工

学院，结识了一些有进步思想的同学，投入学生运动，秘密组织了“马恩列学习小组”，学习了《国家与革命》《大众哲学》之类的书籍，还悄悄翻印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从这时起，对于中国的前途命运，对于共产党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同时也懂得了，没有社会的变革，就无法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解放前夕，第一批加入了还处于地下状态的青年团组织，并担任班上第一任团支书，临解放时又协助和参与军管会对学校的接收。1950年从国立西北工学院毕业留校任教，从事铸造学的教学与研究，扎根祖国的大西北，这一干就是68年。

我最初就读的焦作工学院，1938年7月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含国立北洋工学院与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在城固古路坝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其中焦作工学院为我国最早的矿冶大学，也是当时唯一的私立工科院校，前身为英国福公司于清宣统元年（1909）创办的焦作路矿学堂；北平大学以法国拿破仑帝国大学的大学区制为蓝本建成，其工学院前身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农工商部创办的高等实业学堂，是京师高等工程教育的源头之一；北洋工学院前身为我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曾在1935年招收我国第一批矿冶工程研究生；东北大学工学院以德国柏林大学为蓝本建成，以东北现代工业的缩影著称，也是当时设备最为先进的工程教育基地。这表明国立西北工学院为战时我国大后方唯一的综合性工科独立学院，以及科系设置最为齐全的工学院。其所设航空工程系全国仅有3所高校（还有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其所设纺织工程系及稍后所设工业管理系均

作者简介：傅恒志，男，河南开封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材料及冶金学著名专家，西北工业大学原校长。1946年考入私立焦作工学院，一年后转入国立西北工学院，1950年毕业。

为全国唯一。我毕业于此，教书于此，感到非常荣光。而研究、宣传西北联大，传播其办学理念，彰显其家国情怀，显然也是传承优秀高等教育文化以及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抓手。

姚远同志就此写了《衔命东来：话说西北联大》，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感觉史料翔实，故事感人，通篇充满昂扬、奋进的积极格调，将我们的思路一下子带入了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之中。其中，刘锡瑛、潘承孝辗转月余奔临大；日机轰炸中赶往西安继续学业的叶培大；水利大师、土木工程系名誉教授李仪祉在去世前一天向学校请假；魏寿昆、雷祚雯、张伯声三教授深山勘矿；“衣服无边疆”的教授生活；曾炯教授英年早逝；抗战“三坝”与坝上长夜等，读来都非常令人感动。这使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与师昌绪、李恒德、史绍熙、高景德等先生在京开会时对西工七星灯火的回忆。

师昌绪先生回忆：当时的西北工学院，一年级在七星寺，这是离古路坝不远的地方。学生把七星寺叫鬼门关，当时学校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每年都有近1/2的学生留级或补考。师先生说，他和高景德住在一个宿舍。师昌绪是开夜车的，吃了晚饭就去教室看书学习，一直到夜里两三点钟回宿舍，而高景德习惯于开早车，凌晨两点就起床去教室学习。所以，师昌绪回到宿舍时，高景德已经出

去学习。学生基本分两拨，一拨是学到夜里两三点钟，另一拨是半夜两三点学到早上。所以他们两个人，几个星期、几个月见不着一面。师先生说，当时各个班都是这个样子。那时没有电灯，都是蜡烛和煤油灯，由于开夜车和开早车的人都衔接起来了，所以教室里的灯一直亮着，夜里从远处看，灯光长夜不息，所以叫“坝上长夜、七星灯火”。这灯火，映照的是师生们科教兴国的伟大精神，反映的是全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救国兴邦的坚强意志，是中华民族崛起复兴的伟大火种！

今天，“西北联大”已经成为当年的办学地城固的三大名片之一，保护和利用西北联大办学遗址之社会声浪迭起，西安迈科集团拟投巨资建设“古路坝国际研学小镇”。然而，正像西工大校友总会秘书长张英群同志所说，遗址上建筑的恢复也好，名人雕像的树立也好，小镇的规划建设也好，这些硬件建设只是“骨”与“肉”，或者只是一堆钢铁水泥，要赋予它生命，让它活起来，就得讲好故事，就得揭示它的“魂”，就得讲述它的“精神”。因此，姚远同志《衔命东来：话说西北联大》的出版正当其时，希望有更多体现西北联大之魂的力作问世。让我们一起重燃古路坝灯火，讲好西北联大故事，传承优秀高等教育文化，在兴学强国、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征稿启事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西北工业大学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正式学报类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新思潮、军民融合研究、区域发展研究、名家访谈等。

本刊为季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刊,热忱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惠赐佳作。关于投稿,具体事项如下:

一、来稿要求

1. 来稿须为学术论文,结构完整,包括题名、作者信息、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英文题名、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
2. 作者信息包括:姓名、性别、籍贯(**省**市)、职称、所在单位及职务、主要研究方向等。
3. 获得基金资助的稿件,请注明立项单位、项目名称、时间、编号。
4. 参考文献格式请参考本刊已刊发文章。
5. 请勿一稿多投,来稿文责自负,本刊对采用稿件有权作文字删改,如不愿改动,请事先声明。
6. 本刊对稿件的审理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理办法,将在1个月内回复初审结果。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
7. 优稿优酬,嘉奖名篇。

二、投稿事宜

1. 来稿请发至shekexuebao@nwpu.edu.cn。
2. 本刊地址:西北工业大学老图书馆221室 邮编:710072,电话:029-88493140。

三、其他约定

本刊已加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超星域出版平台”等数据库,并授权网络合作方使用本刊稿件。不愿通过网络媒体发布者,请在来稿中注明。